

鹿城史志

LU CHENG SHI ZHI

2022 | 秋冬卷 (总第 18 期)

内部资料 免费赠阅

资料来源“鹿城档案地方志网”

温州市鹿城区档案馆

温州市鹿城区委党史研究室 主办

温州市鹿城区地方志研究室

《鹿城史志》

2022 | 秋冬卷（总第 18 期）

主 任 朱如明

副 主 任 王剑峰 卞苏贵

委 员 李洪湖 谢一方 戴爱华 褚宏健

主 编 王剑峰

副 主 编 蔡 榆（特邀）

编 辑 蔡 榆 孙任翔 王剑峰 褚宏健

地 址：温州市鹿城区宽带路 18 号 5 楼

邮 编：325000

电 话：0577-88220111

邮 箱：857900031@qq.com

纪念专辑	谢灵运温州的诗学遗产	陈增杰	01
	国际汉学家视野中的中国山水诗始祖	章方松	10
东瓯鹿鸣	唐温州刺史郑镒考略	朱如明	19
	“百工之乡”千年传承	金柏东	31
	东山书院：永嘉学派开创与传承之地	全定旺	40
	二程文化在温州传播及“两创”对策研究 ——以鹿城区山福镇驿头古村为例	程庆国	45
峥嵘岁月	我为军博画元帅像	陈天龙	52
	搬家杂忆	沈智毅	57
	申温线客轮的记忆	姜方良	61
	“柴火”变奏曲	王 曙	65
	“温州市实验小学”的前世今生	陈芊芊	68
	上世纪 80 年代，温州兴起公关热	明 人	72
古城寻珍	东瓯山水发清辉	方长山	82

	王十朋曾在江心备考	王超俊	86
	“南亭”引发的旧事	郑小良	92
	妙果寺千佛塔	张 晓	97
	歧海逸事三则	金恩海	102
百里人家	清末民初文士郑姜门	沈洪保	108
	刘瓛之的那些温籍门生	蔡 榆	114
	符丕盛教授的赤子之心	施菲菲	127
	金学兰先生事略	林正华	133
华盖漫笔	塘河：诗之河	陈 俊	136
	南塘百年“番人馆”	徐贤林	140
	朱自清在温州	包连续	146
	蒲扇，摇有清风消酷暑	王勤福	151
信息专递	鹿城党史著作及资料简介	李岳松	154

谢灵运温州的诗学遗产

陈增杰

编者按：今年是南朝诗人谢灵运到永嘉郡（今温州）出任郡守的一千六百周年。在不到一年的任期内，他喜爱这里的奇丽山水并寄情其中、恣意遨游，足迹遍及永嘉郡境内诸县，写下二十多首不朽诗篇，从而奠定他中国山水诗鼻祖的地位，亦使温州成为“中国山水诗摇篮”。在永嘉郡任上，他积极提倡植桑、兴修水利，命学士讲书，发展农业、手工业和教育事业，促进温州社会进步和发展。谢灵运是温州历史上重要的人物，本专辑特推出系列纪念文章。

谢灵运于晋宋武帝永初三年（422），因朝廷党派斗争被贬任永嘉（今温州）郡守。这年七月他离开京城建康（南京）赴郡，约八月十二日抵达永嘉就任。第二年九月“称疾去职”离温。《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有“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逾旬朔，民间听讼，不复关怀”等载，《南史》卷十九本传略同。须要指出，所谓“民间听讼，不复关怀”记述，语带偏颇，似不为属实。我们从他在温所作《斋中读书》“虚馆绝争讼，空庭来鸟雀”可见政清民和，无为而治。另有《白石岩下经行田》“小邑居易贫，灾年民无生。知浅惧不周，爰深忧在情”、《北亭与吏民别》“常呼城旁道，更歌忧逸民……贫者阙所赠，风寒护尔身”等诗中，也可

见他黽勉尽职、关心名瘼。弘治《温州府志》卷八《名宦·谢灵运》云：“为永嘉守，常以德惠及民……有《行田》《种桑》《与吏民别》等诗。今有谢公亭、梦草堂、谢岩、谢步及康乐坊之名，皆民所不能忘者。”他还被宋代苏轼引为地方官楷模，苏在《寄题兴州晁太守新开古东池》诗中云“自言官长如灵运，能使江山似永嘉”，举以称美晁太守。王闳运《湘绮楼说诗》卷六，有“《命学士讲书》《斋中读书》二诗，皆谢公治郡之绩。观其胸次，似循吏文人，固异俗吏”等文字，都可佐证。然谢灵运治郡如何，本文不多赘言，主要叙述他在温州如何完成中国诗学的重大变革，以及留给温州哪些诗学遗产。

一、晋宋诗风重大转变是谢灵运在温州完成的

谢灵运居职温州，耽放丘壑，游踪遍及永嘉、乐清、瑞安、平阳四县。他步出西射堂（在郡城松台山麓），起登池上楼（旧郡治后西堂），践攀绿嶂山（在瓯江北），策杖岭门（在平阳）；继控东山（华盖山）而瞰溟海，蹑足石鼓（在西郊上戍浦）而望乡关；游赤石进帆海（今梧埏一带），往仙岩探梅潭（梅雨潭）；索幽垌郊上石室（在城东大罗山），放舟楠溪过白岸（永嘉白岸亭）；截流孤屿（江心屿）空水澄鲜，徙倚南亭（在城南）远峰隐现；白石（在乐清）岩下径行田，瞿溪山（在瓯海）上听法鼓，履迹远及雁荡山南麓之筋竹涧和青田石门洞。登临、冥会，他创作了众多精彩篇章。据今所知，现存以温州为题材的作品计二十四首（已佚《白云曲》《春草吟》不计在内），其中山水之咏二十一首，差不多占其全部山水作品的一半。其中如《晚出西射堂》《登永嘉绿嶂山》《登池上楼》等诗，都是千百年传诵不废的名章胜咏。

灵运居郡斋写的《斋中读书》说：“昔余游京华，未尝废丘壑。矧乃归山川，心迹双寂寞。”政治上遭排斥，转而放情山水以宣郁惋，他也因此逗引诗情勃发的创作契机。永嘉的奇山秀水又为他提供了创作题材。所谓“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详后文），用自然清新的山水诗取代枯燥

乏味的玄言诗，就是指晋宋诗风这一重大转变。明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七云：“汉魏诗兴寄深远，渊明诗真率自然。至于山林丘壑、烟云泉石之趣，实自灵运发之，而玄晖殆为继响。”清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卷五云：“汉魏间诗人之作，亦与山水了不相及。迨元嘉间，谢灵运出，始创为刻画山水之词，务穷幽极渺，抉山谷水泉之情状。”他的这些寻壑经丘、遣兴纪游之咏，有意识地首先将自然风景引入诗境，将五言古诗的境域，从玄理转移到山川景物方面，突破藩篱，扩大了诗歌的题材领域，的确给人面目一新。中国诗歌史上创作诗风的这一重大转变，是谢灵运在温州完成的。

吴汝纶《龙泉园志跋》说：“古今好山水者众矣，而谢康乐、柳柳州名独著，岂非以文采照烂，足与山水相发哉！”要而言之，有谢灵运然后有山水诗，而灵运之山水篇章，又聿自出守永嘉，得诸永嘉“名山水”之助。这就是谢灵运、永嘉、山水诗三者相互映发、密不可分之辩证关系。

永嘉之行，开启了谢灵运的山水诗之旅。赴郡途中所作《过始宁墅》《七里瀨》等六首，开了一个端，只能说是序曲。在温一年所赋，量多质高，是他山水篇章的首要部分和主旋律，并就此奠定总体风格。去郡后他隐居故里及再仕、出游所咏，则为创作的继续发展和成果扩大。十分明显，居职温州一年，在谢灵运诗歌创作上是一个承前启后不同寻常的重要时期，从此开辟中国山水诗的创作途径，奠定了他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崇高地位，也赋就温州作为山水名城和山水诗发源地的荣誉和地位。

二、谢灵运留给温州的诗学遗产

一千六百年前谢公出守永嘉，此为吾温人之所厚幸也。他留给温州十分丰富、极具价值的诗学文化遗产，影响巨大而深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塑造永嘉山水“灵秀”的形象

且看谢灵运笔下清幽秀朗的永嘉山水风貌：

连障叠巘崿，青翠杳深沉。晓霜枫叶丹，夕曛岚气阴。

（《晚出西射堂》）

澹激结寒波，檀栾润霜质。洞秀水屡迷，林回岩逾密。

（《登永嘉绿嶂山》）

时竟夕澄霁，云归日西驰。密林含馥清，远峰隐半现。

（《游南亭》）

乱流趋正绝，孤屿媚中川。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

（《登江中孤屿》）

这些将瓯中山川泉林刻画到形神俱出的优美诗句，塑造了永嘉山水“灵秀”的文学形象，给人以美的熏陶和享受，也给后人留下深刻印象，永嘉“名山水”自此彰显于世。清代诗论家沈德潜《芳庄诗序》云：“余尝观古人诗，得江山之助者，诗之品格每肖其所处之地。永嘉山水明秀，谢康乐诗肖之；夔州山水险绝，杜少陵诗肖之；永州山水幽峭，柳仪曹诗肖之。彼专于其地故也。”又《说诗晬语》卷下论“游山诗，永嘉山水主灵秀，谢康乐称之；蜀中山水主险隘，杜工部称之；永州山水主幽峭，柳仪曹称之”。沈氏这一品论可称精辟，且广被诗话界所认同和接受。确实，发露一个地方山川风景的真蕴，以灵心睿思和文采，歌咏她独有的清奇秀美，至成经典，灵运可谓筚路山林，具首创之功。其后，杜甫模写“险隘”蜀中山川，柳宗元模写“幽峭”湘南山川，又皆继踵前修，别辟境界，发扬光大了这一传统。

2. 赋就山水名城的荣誉和山水诗发源地的地位

由于谢灵运的登览歌咏，偏处海隅被视为逐臣“投荒”之地的永嘉郡，一跃而成为山水名城著闻宇内。唐开元中，诗人孟浩然从千里之外跋涉来温访友，船行永嘉江（瓯江）将抵达时，急切问“卧闻海潮至，起视江月斜。借问同舟客，何时到永嘉？”（《宿永嘉江寄山阴崔少府国辅》）见出诗人对这座谢公曾“坐啸”的山水城慕名向往；在温州他还留下“众山遥对酒，孤屿共题诗”（《永嘉上浦馆逢张八子容》）这样“胸襟远旷”（明周敬语）的名句。而大诗人李白、杜甫，虽未亲莅温州，然谙闻谢公题咏而心

慕往之，往往赋诸篇章。李白《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云：“眷然思永嘉，不惮海路赊。挂席历海峤，回瞻赤城霞。赤城渐微没，孤屿前峣兀。”

《与周刚清溪玉镜潭宴别》云：“康乐上官去，永嘉游石门。江亭有孤屿，千载迹犹存。”杜甫《送裴二虬尉永嘉》云：“孤屿亭何处，天涯水气中。故人官就此，绝境兴谁同？隐吏逢梅福，游山忆谢公。”晚唐诗人陈陶《赠温州韩使君》云：“康乐风流五百年……鄱陵诗句满山川。”诗僧贯休《古意九首》之七写道：“常思谢康乐，文章有神力……永嘉为郡后，山水添鲜碧。何当学羽翰，一去观遗迹。”前文引及的苏轼诗“自言官长如灵运，能使江山似永嘉”，举谢灵运啸吟的永嘉山川，用来称美兴州晁太守。

灵运在温的各处游迹和吟咏亭阁，也大都留传遂成名胜，不断赢得后人的缅怀瞻仰。如池上楼、谢池、春草池、谢村、东山、谢客岩、五马亭、康乐坊、南亭、北亭、孤屿、仙岩、白石岩、瞿溪山、石鼓山、石室山、岭门山，等等。如位于城区积谷山的谢客岩，后代诗人吟诵颇多。如北宋“元丰太学九先生”之刘安上《舒州西门送客亭》有“却忆谢公岩下路，水风凉处战檀栾”。“檀栾”一词，即出自谢诗“檀栾润霜质”。许景衡有《谢公岩》诗，称“五言多好句，千载独斯人。风月楼长好，池塘草自春”。四灵之徐玑《初夏游谢客岩》，有“州民多到此，犹自忆髯公”，灵运美髯故称其髯公。宋季遗民诗人林景熙《登谢客岩》，有“永怀谢康乐，坐啸山水城。旷代得真契，登览有馀情”句。

3. 温州之咏，奠定谢灵运山水诗的基调和总体风格

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评说五言诗的发展源流，有一段著名论述：“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以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庄》《老》指玄言诗。山水，指山水诗。清黄叔琳评“谢客为之倡”。黄侃《诗品讲疏》：“康乐以奇才博学，大变诗体……夫极貌写物，有赖于深思；穷力追新，亦质于博学。将欲排除肤语，洗荡庸音。”谢灵运是倡导完成晋宋诗风这一流变的关键人物，文中说的“俪采”（对偶文采）“极貌写物”（真切地模写景物）“情”“辞”相发，以及深思琢磨、“追新”争奇作风，

实际概括了灵运山水诗即“大谢体”的基本特色。而温州之诸作，已经奠定灵运山水诗的基调和总体风格。具体以论，谢诗的创造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景、情、理融合。

谢诗固善于取象状貌，但他的山水诗不单就写景，而是能融情寓意，有所寄托，于山水润色之中“时时浹洽理趣”，达到情景理意的融合。白居易《读谢灵运诗》云：“岂惟玩景物，亦欲摅心素。往往即事中，未能忘兴谕。”黄子云《野鸿诗的》言：“康乐于汉魏外别开蹊径，抒情缀景，畅达理旨，三者兼长。”都说得是。

《石室山》发端写道：“清旦索幽异，放舟城垆郊。莓莓兰渚急，藐藐苔岭高。”然后一路咏来，结末说：“灵域久韬隐，如与心赏交。合欢不容言，摘芳弄寒条。”意谓：兹山秀美如仙境（灵域），而韬藏久不为世知；今我幸得赏览，共相慕悦而获缔交。其喜乐难以言表，至摘芳弄条，情不能已。言与山灵结为知己，物我融洽无间，如此著笔，命意绝高。后李白《独坐敬亭山》所咏“相看两不厌，惟有敬亭山”；陈傅良《黄氏老山楼》所咏“与山成二老，相对两苍颜”，都发扬了谢诗寓托的意蕴，可谓神理相通，妙得嗣响。

《登江中孤屿》他赞美“孤屿媚中川”之后感慨地说：“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言美景隐藏，无有人赏识，为之兴叹。《登石门最高顶》云：“连岩觉路塞，密竹使径迷。来人忘新术，去子惑故蹊。”（术，道路）《游赤石进帆海》云：“首夏犹清和，芳草亦未歇。水宿淹晨暮，阴霞屡兴没。周览倦瀛壖，况乃陵穷发。”亦都为览景寄情寓理，景情理相生，饶有韵味。《登上戍石鼓山》一首，王夫之更是称叹不已，评曰：“情不虚情，情皆可景；景非滞景，景总含情。神理流于两间，天地供其一目。”

(2)用典和刻琢作风。

谢诗有二类，一类“吐言天拔，出于自然”，如“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之咏；但更多的则为熔铸琢炼之句。吴乔《围炉诗话》卷一谓造句炼字，“汉人至渊明皆不出此，康乐诗矜贵

之极，遂有琢句。”至引入经语、佛道语，亦灵运首开其风。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卷十七曰：王敬美云：“曹子建后作者多能入史语，不能入经语，谢康乐出而《易》辞《庄》语无不用。”然则用经语固以康乐为宗也。同书卷二九云：“以《庄》《易》等语入诗，始谢康乐。”明安磐《颐山诗话》称其“森蔚璀璨，繁密错缛，一字一句，极其深思。”许学夷言其“自然者十之一，而雕刻者十之九”。他的一些诗句“深于造思，巧于裁字”，典重稳老，用字有来处，造句不率易，如方东树所言“暂见似白道，而实皆用典”。

比如，“乱流趋正绝”出自《尔雅·释水》：“正绝流曰乱。”郭璞注：“直横渡也。”郝懿行义疏：“正训直，绝犹截也。”正绝，谓直截。乱流正绝，截流横渡之意。趋者疾行。意思说：飞快地截断江流横渡过去。它是将《尔雅》的释义文拆开改造移用，插入“趋”字构成五言诗句，显得古奥雅饬，耐人诵味。举此一例，可见作者炼句的深妙。

他如《登上戍石鼓山》，有“旅人心长久，忧忧自相接”，用《楚辞·九章·哀郢》语。又“白芷竞新萼，绿蘋齐初叶”，用《楚辞·招魂》语。《过白岸亭》“空翠难强名，渔钩易为曲”，用《老子》语。又“交交止栩黄，呦呦食苹鹿”，用《诗经》语。如是等等，俱为论者所称道。灵运才高学博，故能妙加组裁，运用裕如，所谓“造句极巧，而出之不觉，但见其浑成。”

(3)以对属为工，巧铸俪句。

六朝骈俪之风，始于陆机（士衡），“大谢整处倣陆，逸处本陶”，兼擅两家之长，往往以排偶制胜，创造出许多佳联隽句，播在人口。赵翼《瓠北诗话》卷十二云：“汉魏以来，尚多散行，不尚对偶。自谢灵运辈始以对属为工，已为律诗开端。”其属对之工者，除前文所列举者外，又如“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登池上楼》）“扬帆采石华，挂席拾海月”（《游赤石进帆海》）“岩下云方合，花上露犹泫”（《从筋竹涧越岭溪行》）“憩石挹飞泉，攀林蹇落英”（《初去郡》）等，此种偶俪作风，已引启唐人近体之前芳。

脍炙人口的警句，也是一位作者创作成功的重要标志。论者谓诗多佳

句，起自谢灵运山水之咏。南朝梁钟嵘《诗品》卷上称其“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会。”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七谓：“五言自士衡（陆机）至灵运，体尽俳偶，语尽雕刻，不能尽举。然士衡语虽雕刻，而佳句尚少，至灵运始多佳句矣。”而被称为“万古千秋五字新”的不朽名句“池塘生春草”，即诞自温州城内之池上楼。孤屿所咏“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有人以比小谢“馀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句，“谁为较胜”？明邓云霄《冷邸小言》判曰：“‘成绮、如练’，还只当一幅好画；灵运乃江天真景，非人力也。”灵运居温所赋二十多首诗中，隽句警联络绎纷呈，前文各节引述俱可举证，兹不复赘。

4. 对永嘉诗风的启发培育之功

康乐公“坐啸山水城”，蕴酿神秀、冥会精思的歌咏传统和其作风、手法成功地传留下来，且成为“瓯风”核心部分，可以说奠定了温州地区诗歌的基础，沾溉历代吟人。至南宋，永嘉诗风鼎盛，蔚为大观，时江湖派巨擘刘克庄与永嘉诗人深有交往，称言“永嘉多诗人”而誉为“风雅之国”。楼钥称陈傅良诗律精深，登览吟讽，“王（羲之）谢（灵运）韵度，尚可想也。”牟巘谓：“永嘉自谢康乐后，山川神秀，皆发于诗，流风浸远，近代作者乃推陈止斋氏。”近代名家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二六亦云：“自谢康乐山水名作，半出永嘉，永嘉遂为古今诗人渊藪。”可见谢公流风馥韵，沾被广远。

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五云：“谢公功力学问天分，皆可谓登峰造极。”“如康乐乃是学者之诗，无一字无来处率意自撰也，所谓精深。”谢诗溶液经籍、驱使故事的方法和语必己出的作风，对宋代温州学人如周行己、刘安上、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都深具影响，他们皆承继了灵运“学者之诗”“文人之诗”的传统，怀抱本原，根柢学问，专意独创，皆由胸中发出，不借客气假象。如薛季宣诗“奥衍生涩”、力避凡俗，陈傅良不用常律、“自成宫徵”，叶适“务在新奇”、脱出町畦，皆远绍谢公，而卓然成家。

明陆时雍《唐诗镜》卷三《杜审言》曰：“谢灵运始生字法，诚欲探

境穷微，追情入妙，然非本来灵妙，别具炉锤，未易登其堂奥也。唐时雕琢大盛于垂拱、神龙之间，而穷于贾岛诸人之辈。”“永嘉四灵”之宗崇贾岛诸人，奉行苦思琢磨之风，论其渊源，固聿自谢公。灵运所作，不率易下语，每一篇皆殚精深思苦练而成，四灵之苦吟功夫亦深得于此。四灵契友薛师石在师秀卒后悼怀说：“无复东岩招谢客。”（《寄题赵紫芝墓》）东岩，即永嘉郡城积谷山麓谢客岩，传为灵运“池塘春草”梦中得句之处。可见谢公是往日他们琢思清吟参悟借镜的古贤先哲。灵运有《登江中孤屿》作，徐照《江心寺》赞云：“却疑成片石，曾坐谢公身。”深表敬慕仰怀。

灵运多创佳句的作风，亦为四灵派诗人所承继。四灵辈常以“好句”相砺，刻意追琢磨莹而出以新俊，颇多秀联隽语。象徐照“芦花新有雁，莎叶尚鸣蝉”（《舟中》）；徐玠“寒烟添竹色，疏雪乱梅花”（《孤坐呈客》）；翁卷“轻烟分近郭，积雪盖遥山”（《冬日登富览亭》）；赵师秀“野水寒初退，平林绿半敷”（《谢耕道犁春图》），这些写景超妙、“磨砢”所得的名隽，可以看作为灵运“扬帆采石华，挂席拾海月”“白芷竞新萼，绿葍齐初叶”诸咏一脉相承的绮丽馀波。

谢灵运的山水诗在体物写貌和经营布置方面，独具技法章法，特色鲜明，世称“大谢体”。自宋以来，温籍诗人登临吟咏之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谢诗的熏陶影响。对此，钱志熙教授《谢客去后的永嘉山水——谢灵运山水诗风及其在温州诗风中的传承》有精辟的论述，列举翁卷、赵师秀、李孝光、陈高、何白等人山水之什，写法上明显体现了“大谢体”的特点。

在纪念谢公出守温州一千六百周年，写竟此文，为赋短章，用表敬仰：

春草池塘赋句新，中川孤屿发高吟。
名城山水发祥地，谢客风流曜古今。

国际汉学家视野中的中国山水诗始祖

章方松

一、饶宗颐、戴密微、侯思孟与三十年前的谢灵运研讨会

温州是谢灵运山水诗创作的境域，不仅历史上诸多诗人慕名而来，现当代也吸引了众多海内外汉学家。1991年，温州在雁荡山举行谢灵运国际学术讨论会（全称为“中国旅游文学研讨会第五届年会暨谢灵运国际学术讨论会”），到会代表共一百四十多人，部分来自美国、法国和中国香港等地。其中如香港著名学人饶宗颐先生、温籍香港中文大学杨勇先生，以及应饶宗颐之邀而来的著名汉学家、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汉学家侯思孟教授。

饶宗颐（1917-2018）是蜚声国际的汉学大师，与侯思孟的导师戴密微堪称至交。杨勇则是从温州走出的知名学人，在《世说新语》及谢灵运研究方面均有重要贡献，他早年作《谢灵运年谱》（原载《饶宗颐教授南游赠言集》），在海外有一定影响力。在这次纪念谢灵运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饶宗颐作了专题讲座，讲述山水文学起源与谢灵运研究、山水诗源起的道理等。他认为“灵运不单是诗人，还是一位了不起的学人”，并对刘勰“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提出独到见地（见维熙臧教授主编《中国山水的艺术精神》。学林出版社1994年1月出版，第1至4页）。与会的

其他学者也相继发表对谢灵运研究的观点，如侯思孟等。

1. 侯思孟：读着谢灵运诗歌实地寻访温州山水

侯思孟 (Donald Holzman) 教授，1926 年出生于美国芝加哥，著名汉学家，曾以研究阮籍五言诗获得耶鲁大学中国文学博士学位。1957 年受教于法国汉学家戴密微门下，以《嵇康的生平和思想》(La vie et pensee de Hi K'ang) 为题，获得第二个博士学位：巴黎大学中文博士学位。他虽是美国人，但他是研究中国中古文学的学者。此次来温州与会，也是缘于老师饶宗颐。在学术上，他研究的是中国六朝文学，著作有《诗与政治：阮籍的生平与作品》《嵇康的生平与思想》等，而谢灵运也是他所研究的六朝文学之一。在研讨会上，侯思孟作了《山水在中国思想史上的作用》的报告，其中着重指出：欧洲直到十九世纪，随着浪漫派出现，人们才真正醒悟过去去领略大自然美景。为什么欧洲人背离自然去陶冶心灵，而中国人却极早就已去观照自然、观照山水呢？



作者(左)与侯思孟(中)1991年在大罗山合影, 右为张桂生

中着重指出：欧洲直到十九世纪，随着浪漫派出现，人们才真正醒悟过去去领略大自然美景。为什么欧洲人背离自然去陶冶心灵，而中国人却极早就已去观照自然、观照山水呢？

谢灵运作为山水诗派宗师，同时也是四世纪“玄言诗”传人。他和玄言诗人一样，在观赏山川的美景时能达到心旷神怡的精神境界（维熙臧教授主编《中国山水的艺术精神》，学林出版社 1994 年 1 月出版，第 259 至 262 页）。当年侯思孟与参会人员一起，游览雁荡山、楠溪江、江心屿等温州名胜。每到一处，他总是认真观赏，并对景赏诗，感受谢灵运一千多年前在温州所写的山水诗篇，这带给他无上的乐趣。

侯思孟也是饶宗颐的弟子，两人常有唱酬，在饶宗颐的《白山集》中，就有《侯思孟约郊游，以失眠未赴，报之以诗》：

嘉约违攀跻，咫尺等楚越。嵇生朝慵起，艳赋爱绮发。向来识佛面，未曾计日月。心知逗晓晴，雨到中宵歇，小病无足虑，顿悟笑所阙。雪后变冬温，蛰虫催春别。飞鸿看有时，佳兴在冥蔑。

2. 戴密微：谢灵运把山水诗升华到一种高雅别致、富丽精工的水平

侯思孟的法国导师戴密微（1894—1979），不仅是研究谢灵运的汉学家，更是谢灵运的崇拜者。他还是举世公认的佛学研究者，曾通过对敦煌手稿的研究，不仅看出佛教在中国文化影响下所发生的变化，且能从相反的方向判断来自国外的宗教对本地文学的影响。他有《中国古诗论文选》《汉学研究论文选》《王梵志诗全集》等著作问世。



1961年1月，饶宗颐先生与法国汉学家汪德迈（1928—2021）游览欧洲，以谢灵运诗韵得诗三十六首，结为《白山集》。其中用谢灵运在温州所写诗入韵的有十一首。与饶宗颐先生共同推崇谢灵运的戴密微，为之题辞：

儿时闲梦此重温，山色终非旧日痕。
爱听清湍传逸响，得从峻调会灵源。

戴密微曾有语“如重学汉学，当选汉学研究”，他对谢灵运有着深刻的研究，并说：“谢灵运把山水诗升华到一种高雅别致、富丽精工的水平。这在他的任何一位前驱者作品里都是见不到的。谢灵运是位贵族艺术家和哲学家，出自晋朝最富裕最有权势的士族豪门。但他无法适应那个时代的社会环境，以致一生坎坷，结局悲惨。”（戴密微《中国文学艺术中的山岳》，钱林森编，《牧女与蚕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6月，第90页）。

而寻访谢灵运诗歌中的上虞、温州等地山水，是戴密微教授一大心愿，可惜未能成行。

饶宗颐与戴密微友情深厚，他深知这位老友对谢灵运的崇拜，以及因此而来对温州山水的钦慕，曾将研讨谢灵运性情与诗文的文章，专呈戴密微。1985年，饶宗颐行旅浙东前往雁荡山途中，想起已经故去多年的老朋友戴密微，写下《临海道中，怀故法国戴密微教授，用大谢庐陵王墓下韵》等文字。此诗以谢灵运《庐陵王墓下》为韵，回忆戴密微生前心仪谢灵运，“晚岁倾心康乐，恨足迹之未及永嘉”（饶宗颐：《戴密微教授八十寿序》，见《饶宗颐辞赋骈文笺注》暨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8月出版，第76页）。由此饶宗颐惋惜感叹：“余顷自杭州来雁荡，所经多是谢诗山水之乡，感君此事，用志腹痛之戚。”在行旅谢灵运诗境山水之间，他深切缅怀这位共同敬仰谢灵运的外国汉学家，诚心令人可敬。

二、小尾郊一、顾彬、史耐德 日德美汉学家眼里的谢灵运

1. 小尾郊一：开辟谢灵运山水诗审美研究新视角

小尾郊一（1913-2004）是一位对中国文学和自然审美，具有独创性研究的日本学者，尤其对谢灵运山水诗的研究颇有心得。其中又特别是对谢灵运《游南亭》诗句“我志谁与亮，赏心惟良知”作为诗歌创作审美契机，深化谢灵运山水诗作为“赏心”的审视，开辟谢灵运山水诗审美研究新视角，有重要的美学意义。他说——

“谢灵运把鉴赏自然之心称为‘赏心’，管见以为，在谢灵运之前，并没有听说有这么个词”；



后排左二为小尾郊一

“只有具备这种赏心的人才能真正感受自然之美”；

“如果说谢灵运自觉意识到了鉴赏自然之心（即赏心），并进而打开世人对于赏心的眼界，那也绝非过言”；

“自然风物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有受到触发的人类感情在其中添入了兴趣，它才是美的；可见只有具备赏心，才能感受到自然的美。”；

“赏心的萌芽不久由于魏晋之间老庄的流行与接触自然山水的频繁而被培植起来，一直发展到谢灵运的对于赏心的自觉意识。换句话说 这意味着写景诗从抒情诗中独立了出来”……

这些对于谢灵运山水诗的独到评论，被小尾郊一录入《中国文学中所表现的自然与自然观》（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 11 月出版，第 164 至 167 页），这是高度概括与解读谢灵运山水诗的美学理念，为人们欣赏谢灵运山水诗，提供一个情境互动、心景互融的审美思维方法。

除了《中国文学中所表现的自然与自然观》，小尾郊一还有《谢灵运》《谢灵运的山水诗》等专门论述（宋红编译《日韩谢灵运研究译文集》《谢灵运研究丛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年 7 月出版）。

2. 顾彬：谢灵运诗中的自然是归于内心的精神象征

顾彬，即沃尔夫冈·顾彬（Wolfgang Kubin），1945 年生于德国，是著名的汉学家，著有《中国诗歌史》等。他对于以大自然作为人类审美对象，对中国历史上文人的自然审美观，有较深的研究心得。在《中国文人的自然观》一书中，他对谢灵运的山水诗进行深刻地阐述。

顾彬从谢灵运于公元 423 年离任永嘉郡守还乡、写下《初去郡》这首诗，来作为谢灵运自然审美的精神意境来解读。他认为这是谢灵运“把自然当作官场对立物观点的一个极好例证。在位为官意味着与



自我的不和谐，意味着客观与愿望的分离。官场上找不到真正的生活，真正的生活只存在于自然之中。因为诗人从前有过这样的生活，所以存在于不和谐之中的精神不应转向现在，而应转向过去。把自然作为精神庇护之所的观点，引出了一种不同于魏晋时代的观念：自然不是来自自然、又表现自然的哀伤之物，而是归于内心的精神象征”。这作为自身“内心的精神象征”，为解读谢灵运山水诗，是又一个新的审视角度。

在阐述谢灵运《游南亭》一诗时，顾彬分析“尽管诗人对时令从春到夏的转换感到惊异，且也想到了人生易老，但面对大自然的喜悦还是占了上风。因此精神与自然得以平衡”“欣赏自然之美的纯净的自然观”等。在深化日本汉学家小尾郊一“我志谁与亮，赏心惟良知”的“赏心”认识时，顾彬提出谢灵运“在他与自然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关系”。由此，可证“谢灵运在自己的诗中展示了一种新的自然感受，即客观地评价自然美，使之不受主观（观察自然的诗人）情绪的影响。他有意识地把这种新的评价，与过去相区别”（德国顾彬《中国文人的自然观》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1月出版，141页至147页）。

3. 史耐德：谢灵运是山水诗与佛教思想结合之奠基者

史耐德是美国知名汉学家，他不仅喜爱山水，也特别推崇信仰佛教的谢灵运。史耐德在对中国山水诗与禅宗的论述中指出，“中国山水诗传统早期的大师，山水诗与佛教思想结合之奠基者，应该就是谢灵运。谢灵运天生喜爱大山大水，不只常出访山水胜处，而且作诗歌以志之。六朝之宋少帝即位后，谢灵运出任浙江南部近海的永嘉太守一职，后又在会稽与友人作山泽之游，游遍今日绍兴以南、以西的会稽山一带。他爱游玩的佛寺也多坐落山水佳处”。史耐德还在《在中国的“野”》（“Wild' in



China”），郑重指出谢灵运这位着迷狂野大自然的诗人：

“对中国南部林木茂密、陡峭的山特别着迷（这些山峰高达四千至六千尺），他会花很长的时间来爬山、游山，包括有一次劈山径探索之旅长达一个月”（钟玲著《中国禅与美国》，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第143页）。显然，史耐德将谢灵运山水诗作为六朝佛教发展史，来解读其山水诗佛教意识的内涵，有着可取的一面。他认为虽然那时达摩还没到中国，禅宗在中国还没有传法，但谢灵运是信仰佛教，广交僧人，甚至资助佛教推广。

三、田晓菲、萧池 海外中国学者对谢灵运的认识

1. 田晓菲：谢灵运总是处在一个中间站

田晓菲是一位对中古文学研究有造诣的年轻学者，现任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中国文学教授。在《神游》一书中，她对谢灵运有着独到的解读：

“谢灵运的诗可以被描述为炼狱的诗。诗人永远在寻寻觅觅，有时他以为自己能够在山水中辨识出来意义，在图案里找到精神的安宁与解脱。谢灵运的游历用佛教语言来说乃是‘中有之旅’；一个永远在路上的旅游者，永远困于具有过渡性的中间地带，不断寻求新的栖身之地和下一轮投生”

（田晓菲《神游——早期中古时代与十九世纪的行旅写作》三联书局2022年三月版，第23页）。

此外，田晓菲还引用她的丈夫、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对谢灵运的评点：在前往永嘉的途中，谢灵运枉道始宁，在那里写下了著名的《过始宁墅》。如宇文所安说：无论他去哪里，都不过是“过”而已。（Stephen Owen, “The Librarian in Exile,” p. 219.），他在家园作短暂停留之后仍会继续前行。这样的认知，概括了诗人生命最后十年的生活和作品。“他总是处在一个中间站，这不仅构成了谢灵运在时间与空间上的自我定位，也构成他诗作中的心灵地貌”（田晓菲《神游——早期中古时代与十九世

纪的行旅写作》三联书局 2022 年三月版，第 125 页）。她并以谢灵运《登池上楼》一诗，点评“谢灵运与陶渊明一样，喜欢在诗作中为自己的生活方式做出解释与辩护”（同上 126 页）。

诚然，田晓菲通过谢灵运山水诗所表述生命时空的终极性概括，颇有哲思性，也为读者解读谢灵运提供一个哲学的思考方法。

2. 萧驰：对谢灵运诗境与温州山水进行实地考察

2010 年 5 月，我曾与著名中古文学研究学者、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中国文学教授萧驰，讨论谢灵运山水诗的温州地域文化问题。萧驰为深入研究谢灵运山水诗的人文地理意涵，曾特地走访考察谢灵运活动的江南一带，实地考察谢灵运的山水诗境与自然实境，并对自然境遇与诗文景观进行比较和评判。在他《诗与它的山河——中古山水美感的生长》《大谢‘山水’探秘》文中，详细记录了谢灵运山水诗与温州山水实地景域，且进行一字字，一句句，一联联的地理环境考辨，将地名与诗境一一对应分析、考辨验证。

比如对“蹑屐梅潭上，冰雪冷心悬”（《舟向仙岩寻三皇井仙迹》）诗中“冷”字，进行触觉、温度、听觉，到心理感受的通感分析。经他的“提示”，当我们再站在梅雨潭瀑布前，确实有了与古人相似的“冷”字通感之妙（萧驰《诗与它的山河——中古山水美感的生长》三联书局 2019 年 11 月，北京第三版，第 101 页）。

此外，在《佛法与诗境》一书里，萧驰还对谢灵运与佛教及诗境的呈现进行分析，这是英语学界最早以佛教背景讨论中国山水诗发生的研究论文。他以谢灵运数位名僧好友如慧远、昙隆之间的关系，及谢灵运有关佛学的论著，证明这位诗人的大乘佛教信仰（萧驰《佛法与诗境》台北联经书局，2021 年 10 月初版第二刷，第 17 页）。而每读萧驰的书，对这位考证严谨的学人，均会产生由衷的感佩。

四、结语

2006年冬，笔者以《谢灵运山水诗与永嘉山水及现代人文审美意义》一文，参与香港九所大学合办、为饶宗颐先生举行九十华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期间，我曾邀饶宗颐先生再来看看温州山水。他欣然微笑：“温州山水好！到处是谢公的诗境山水。”又在广州潮州，我与汪德迈先生相聚，讲到温州山水和谢灵运山水诗时，汪德迈表示有机会定要亲临以感受谢灵运山水诗中的自然山水，可惜在他去世前也未能成行；而在上海，也曾与瑞典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马悦然先生谈起过中古文化，他说“我也很喜欢谢灵运，也喜欢他的清丽山水诗”，诸如等等。

综上所述，笔者意在借谢灵运在温州写下山水诗一千六百周年为契机，以国际学术为视野，提供众多海外汉学家对谢灵运研究的多维方法，以期引起广大读者更好地深入理解和感悟这位伟大的山水诗人，他在佛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心灵世界。海内外有这么多的学人敬仰、思念着他笔下山水诗境域的真实温州山水，作为温州人，我们更应该珍惜这份福报，多去了解谢灵运及其山水诗。

而如今，凡有学者研究中国山水诗的，总绕不过谢灵运。诚然，研究谢灵运也是绕不过温州山水的。让我们感恩这位伟大的山水诗人，一千六百年来为温州山水走向世界，作出历史性的人文传播和文化效应。



汪德迈 2006 在广州留影

唐温州刺史郑镒考略

朱如明

温州郑氏一支，以唐温州刺史郑镒为始迁祖。郑氏系唐末温州望族之一，南宋永嘉学派先驱之一的郑伯熊，便是郑镒八世孙。据永嘉塘垵村（古称棠川，现属永嘉县沙头镇）郑氏《重修棠川派宗谱》（清光绪五年）之《叙》云：

“我祖自政三镒公任永嘉刺史，遂家焉。”

同《谱》记载：

“始祖郑永平为温州刺史，世居郡城棠阴里。”

永嘉表山《郑氏宗谱·政三镒公墓铭》：

“永嘉刺史郑公葬在永嘉孝义乡二十都西山瓯浦之原……公讳镒，字永平，……治《春秋》，以进士选乾符元年（874）甲午廷试，中式二十名，对直年策。乙未（875），除文渊阁舍人。三年丙申（876），

授永嘉刺史。自下车以来，清正廉能，刚毅果敢，立政令以教民，说伦常以范俗。四年丁酉（877），防巢之乱，以柳木为栅，保障郡邑，军民赖以奠安。为政三年，教化大行。朝廷闻公贤能，称为循吏……上疏乞归田里，恬养于家。适公族姪虔显亦授永嘉刺史……显谋于公曰：此郡可以安居，公曰然，遂筑室于郡城之八字桥。”

从相关《郑氏宗谱》大致得到以下几方面的信息：

郑镒，福建人，乾符元年（874）进士，乾符二年（875）任文渊阁舍人，乾符三年（876）任温州刺史，乾符四年（877），为防范黄巢之乱，用柳木修建温州子城。在温州任刺史三年，政绩斐然，不久辞职定居于温州郡城。

对此提出几个大家比较关心的几个问题：

郑镒真的修过温州子城吗？是否任过温州刺史，如有则于哪年任职？是进士出身还是有其他身份？到底是哪里人？是否在温州刺史任上辞职的吗？是否还有其他任职经历？

本文就上述几个问题进行探讨，以请教于方家。

比钱氏子城还早的修建者

弘治《温州府志·宦职》（卷八）载：

“郑镒，乾符四年（877）筑子城，以柳木为栅”。

乾隆《温州府志·职官》（卷十七）沿袭旧载。

从简略的文字表述中可以看出，在梁开平初钱元瓘之前，郑镒已修过子城，姑称为“郑氏子城”。郑镒修建的子城还比较粗糙，与其说是子城，



乾隆《温州府志》

还不如说是用柳木围出一圈栅栏，但毕竟已经有了子城的雏形。从时间上推算，“郑氏子城”比后梁开平元年（907年）的“钱氏子城”要早30年，或许“钱氏子城”是在“郑氏子城”基础上修建的。上述内容如果得到进一步证实，那就意味着温州子城的修建史就要改写，其意义重大。

史学界一般以乾符五年为界，之前叫“王仙芝起义”，之后叫“黄巢起义”。乾符二年（875），王仙芝在长垣（今河南长垣东北）起兵，黄巢在冤句（今山东菏泽市西南）起兵，响应王仙芝。乾符四年（877）二月，黄巢率军攻陷郢州（今山东省郢城县），杀节度使薛崇。乾符五年（878），王仙芝在黄梅（今湖北省黄梅县）兵败被杀，余部奔亳州（今安徽省亳州市）投靠黄巢，推黄巢为黄王，自称“冲天大将军”。

《谱》文“四年丁酉，防巢之乱……”中的“四年丁酉”即公元877年，正是唐僖宗时的王仙芝起义。《郑氏宗谱》的记述与史实基本一致，但“防巢之乱”不严谨。不过唐末农民起义频发，地方武装割据相互攻伐，导致天下纷乱，为了加强防御，未雨绸缪，增筑子城，是有必要和可能的。

曾任温州刺史

谱牒属于史学的范畴，是我国历史典籍和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和方志、正史共同构成了史学大厦。谱牒中的历史信息，有些时候是可以弥补正史、方志之不足。这三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但谱牒记载往往历史跨度较大，子孙后代几经迁徙，一些关于祖先的生平事迹大都通过口口相传重新归集，或几经变迁散失断档重新联谱，错漏在所难免，需要与方志、正史互相印证，找出依据。

《郑氏宗谱》均提及郑镒曾任温州刺史，弘治《温州府志》、乾隆《温州府志》亦有相应的记载，其任职在郑虔昱之后。胡珠生先生据《郑氏宗谱》和弘治《温州府志·仙释·叶后己传》（卷十四），对郑虔昱专门做了校注，将其位次改在郑镒之后，指出郑虔昱任温州刺史晚郑镒两三年。

我们先看看乾符三年温州刺史到底是谁？

僖宗乾符二年（875年）三月，浙西狼山镇遏使王郢等六十九人因作战而立有战功，镇海节度使赵隐却不给衣粮，王郢等人上诉论理无果，于是叛乱，招近万人攻陷苏州、常州，转而剽掠浙东和浙西和福建。《资治通鉴·唐纪六十八》（卷二百五十二）载：

乾符三年（876年）九月，王郢因温州刺史鲁寔请降，寔屡为之论奏，敕郢诣阙。郢拥兵迁延，半年不至，固求望海镇使；朝廷不许，以郢为右率府率，仍令左神策军补以重职，其先所掠之财，并令给与。乾符四年（877）丁酉春，正月，王郢诱寔入舟中，执之，将士从寔者皆奔溃。

由此可见，乾符三年九月至乾符四年（877）正月，温州刺史还是鲁寔。那么，郑镒于乾符三年（876）任温州刺史没有史实依据，最多也只能是鲁

寔的继任者，在乾符四年（877）正月鲁寔被王郢诱执之后。

但郑镒哪年离任？从《郑氏宗谱》提到的“为政三年”看，至少到880年。据《资治通鉴·唐纪七十》（卷二百五十四）僖宗中和元年（881）载，“永嘉贼朱褒陷温州”。《资治通鉴·唐纪七十九》（卷二百六十三）唐昭宗天复二年（902）载，“五月，庚戌，温州刺史朱褒卒，兄敖自称刺史。”结合两处记载可以看出，中和元年（881）九月之后，温州实际就已经控制在朱氏兄弟手中且达22年之久，那么郑镒任温州刺史任期，应该是877年二月上任，880年至881年九月之间离任，不会超过4年。

是文官还是武将

谱文“以进士选乾符元年（874）甲午廷试……三年丙申（876），授永嘉刺史”的表述，是说郑镒中进士第三年就授温州刺史。根据唐朝的官制，正常情况下中进士三年能官至刺史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唐朝考中进士后，不一定授官，即使授官，品阶也不高，一般状元、榜眼，授官为从八品下：如大理评事、诸曹参军、各部考功主事、中县丞、京县尉等，普通进士能授官也是从九品上。而唐朝之上州刺史为从三品，中、下州刺史皆正四品下。根据《唐代进士录》[5]记载，唐咸通十五年（同年十一月改元乾符元年）的进士取额30名，其中包括状元归仁泽在内有姓名记载的共7名，没有找到郑镒有关进士的记载。这7人中有初任职务记录的4人，分别为县尉、从事、判官、校书郎，级别为从八品下至从九品上。所以，按郑氏宗谱的说法，中进士三年即任温州刺史，的确存疑，或许郑镒任温州刺史不是通过科举，而是另有其他特殊途径。

郑镒在任温州刺史之前应该有其他任职经历，或者有其他特殊贡献。据《资治通鉴》（第二百五十一卷）咸通十年（869）记载：

“勋初起，下邳土豪郑镒聚众三千，自备资粮器

械以应之，勋以为将，谓之义军。五月，沂州遣军围下邳，勋命镒救之，镒帅所部来降”。

可见，按司马光正统的眼光来看，郑镒出身不是士人，而是土豪。因为他于咸通九年（868）跟随庞勋起义，能自带三千人马，自备钱粮军械，不是土豪还真干不了这么大的事。

据《旧唐书·本纪第十九上·懿宗》：

“懿宗十年（咸通十年为869年）六月，贼将郑镒急攻寿州，诏南面招讨使马举救之，贼解围而去。”

虽然两部史书记录的时间有出入，但史实基本清楚。至此，我们统一采用《资治通鉴》的说法，基本上可以把郑镒起家的时间再推前6年，即868年就跟随庞勋起义。次年即咸通十年（869）五月，徐州营都招讨使康承训率官军进围下邳，庞勋急命郑镒前往救援，但此时郑镒见唐军兵盛，起义军屡败，就率所部降唐。可见，郑镒不是文官，而是参加庞勋起义的武将，其真正的家乡是徐州下邳，而不是《郑氏宗谱》所说的福建。

庞勋起义前后历经一年零两个月，是唐末一次大规模农民反抗斗争，是对唐朝统治的又一次沉重打击。为接踵而至的王仙芝、黄巢起义作出了积极的准备。史论：“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是对庞勋起义在唐末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史上的重要地位的中肯评论。庞勋之乱被平定后，庞勋手下将领多人降唐，身份转换为官军将领，皆继续握有兵权，故后来多成为唐末藩镇。与郑镒类似的就有不少：

诸葛爽：原为庞勋叛军部下小校，降唐后，任汝州防御使，累迁夏绥银节度使，检校尚书右仆射。黄巢攻陷长安后投降，任命为河阳节度使。不久复归朝廷，进位检校司徒，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并打败魏博节度使韩简。光启二年，病死军中。

朱玫：原为庞勋手下镇守沛县的裨将，见庞勋势衰，举城投降，为唐军效力攻打庞勋，后为邠宁节度使，另立襄王为帝，光启二年（886）末被杀。

路审中：原为徐州节度使崔彦曾部下，庞勋攻下徐州后，投了庞勋。唐军攻至徐州城下时，开城向唐军投降。后为杭州刺史，被董昌驱逐，转据鄂州。光启二年，为安陆帅周通所攻，遂遁去。

丁从实：庞勋部将，降唐后，唐末为周宝部下常州刺史，镇海军乱，他迎周宝至常州，后为钱鏐派杜棱所破，光启三年（887年）丁奔海陵投杨行密，至广陵被杨行密所杀。

汤群：庞勋部将，降唐后，任岚州刺史时勾结沙陀，调怀州刺史，被郑从谠攻杀。

据《旧唐书·本纪第十九下·僖宗》：

“乾符四年三月，以草贼大寇河南、山南，诏曰：‘近者庞勋拒命，王郢挺灾，结聚至多，猖狂颇甚，寻则身膏原野，家受诛夷。亦有方从叛乱，能自徊翔，移吉凶于反掌之间，变祸福于立谈之际。则诸葛爽今为刺史，朱实见存将军，弘霸郎受职于禁营，宋再雄策名于淮海，莫不身名光显，家族辉荣……如乡材有干勇才略，而能率合义徒，驱除草寇者，本处以闻，亦与重赏。如郑镒、汤群之辈，已为刺史，朝廷故不食言。敕到，宜令诸道明行宣谕，令知朕意。’”

说明当时的唐僖宗对起义和割据，采取以招抚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诏书列举了对受降后诸葛爽当了刺史，朱实做了将军，弘霸郎在禁军任职，宋再雄在淮海做官，没有一人不是声名光耀显赫，家族辉煌荣宠。……各地人才中勇敢干练而富于才略的人能够率领义士们驱除草寇，

本地方的官府知道了，也给予重赏。如郑镒、汤群这类人，已经做了刺史，朝廷仍旧不食言。从这个诏书的语境看，可能郑镒、汤群等人当了刺史是既成事实，然后官方予以承认。再结合前文，作为鲁寔的继任者，郑镒任温州刺史，官方的认定时间就是乾符四年（877）。



新唐书

比温州刺史官阶更高

据弘治《八闽通志》（卷之三十）载：

“（都团练观察处置使）郑镒广明初任”

《乾隆福州府志》：

“郑镒，广明元年（880）任都团练观察处置使兼福州刺史”。

可见郑镒是880年离任温州刺史，与《郑氏宗谱》提到的“为政三年”基本相符。在温州刺史离任后，郑镒并没有直接退隐定居郡城，而是升任

为福建观察使兼福州刺史。这应该是他官场最高光的时刻，也属受命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资治通鉴·唐纪七十二》（卷二百五十六）载：

“中和四年甲辰十二月初，黄巢转掠福建，建州人陈岩聚众数千保乡里，号九龙军，福建观察使郑谥奏为团练副使。”

乾符五年（878），黄巢起义军一路南下，从浙江江山开辟仙霞古道攻入福建。在浦城兵分二路，一路攻闽北，建州刺使李乾佑闻风而逃，新任刺史李彦圣仓促应战中被杀，巢军一路直下南平。二路军向闽西进军，在建宁城东被当地人陈岩组建的“九龙军”打败，转攻将乐、沙县，折回崇安，再下南平。两路巢军在南平会合，再沿闽江而下围攻福州。十二月十三日，黄巢义军攻下福州，唐朝福建观察使韦岫战败弃城而逃。也就是说，至广明元年（880）郑谥受命时，福建已有两年空缺观察使，而福州也被黄巢起义军占据着。郑谥面对声势正盛的黄巢义军，觉得自己根本无力收复福州，于是把目标投向了陈岩统帅的民间武装“九龙军”，他请陈岩率部帮助收复福州。机缘巧合，此时黄巢也急于想扩大战果，从闽南挥师广东，福州城只留少数兵马驻守。因此陈岩大军还未到福州城，守城巢军便弃城而去，陈岩的“九龙军”兵不血刃便收复了福州。鉴于陈岩收复福州有功，广明元年（880）十二月初，郑谥奏请朝廷任命陈岩为团练副使，作为自己的副手。后来陈岩又击败了泉州刺史李连，陈岩兼任泉州刺史。



淳熙《三山志》



乾隆《福州府志》

扩修福州子城

郑镒是一个修城达人，他不仅在温州筑了子城，而且在福州也修过子城。晋太康三年晋安郡首任太守严高建郡城，后代因城扩大，故称为子城。与温州区别是，福州先有子城，后扩大范围建外城；而温州是先有外城，后建子城。据淳熙《三山志·地理类四·子城》（卷四），“中和中，观察使郑镒始修广其东南隅”，唐僖宗中和年间（881-885），时任福建观察使兼福州刺史的郑镒，曾扩修福州子城东南隅城墙，其范围“北起小山阜，南至虎节门，东起康泰门，西至宜兴门，东南至安定门，西南至清泰门”。这子城奠定福州城池的雏形，自晋至南朝都仍其旧；唐五代至宋、明的城池也以此为中心。可见，郑镒任温州刺史时修子城，任福建观察使兼福州刺史也修福州子城，这也许与带过兵打过仗，知道城防的重要性，又身处乱世没有安全感有关吧！

被陈岩取代

到了中和四年底，即884年12月，郑镒的福建观察使兼福州刺史职

务被陈岩取代。《资治通鉴·唐纪七十二》（卷二百五十六）：“镒畏岩之逼，表岩自代，壬寅，以岩为福建观察使”。弘治《八闽通志·卷之三十》有“陈岩，中和末逐观察使郑镒自称观察使”；

《新唐书·王潮传》：

“初，黄巢将窃有福州，王师不能下，建人陈岩率众拔之。又逐观察使郑镒，自领州，诏即授刺史。”

对于郑镒被陈岩取代，史学界存在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郑镒主动上表辞职让陈岩取代，另一种就是被陈岩驱逐。司马光倾向于“表岩自代”。据《唐实录》云：

“七月泉州刺史陈岩逐福建观察使郑镒自知使务。”
又曰：“十二月壬寅，以岩为福建观察使。”

为此，司马光在《通鉴考异·唐纪十七》（卷二十五）：

“十二月郑镒表陈岩为福建观察使”其下专门作注：“岩既逐镒，则镒不在福州，岩安能逼之荐己？”，“按：《刘恕闽录》‘黄巢陷闽粤，岩聚众千余人号九龙军，福建观察使郑镒奏为团练副使。左厢都虞侯李连，骄慢不法，纵其徒为郡人患。岩将按诛之，连奔溪洞中，合众攻福州，岩击破之。镒表岩自代，拜观察使。’今从之”。

对于两种说法，不管是被逐还是主动辞职，郑镒于中和四年（885）十二月离任福建观察使兼福州刺史是明确的。在群雄并起、军阀割据的唐

末，拥有强大的武装便拥有强大的话语权，郑镒看到此时陈岩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已经远远超过自己，被取代是迟早的事，向朝廷表请陈岩代替自己也是形势所迫，审时度势的结果。此后再无查到郑镒在福建的资料，也许郑镒是这时离开官场，回到温州定居。郑氏后人认为其祖先从福建迁入，却不知道福建对郑镒来说，是其仕途中的一站，这既是他仕途的最高点，又是他必须离开的是非之地。有人为他遗憾，但对他本人来说，选择激流勇退，又何尝不是身处乱世得以安身立命的明智选择！

参考文献：

- 1、弘治《温州府志》[明]王瓚 蔡芳编纂 胡珠生校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6 年 3 月出版。
- 2、《资治通鉴》[宋]司马光 编著 [元]胡三省 音注,中华书局 1956 年 6 月出版
- 3、《温州历史年表》沈克成著,北京电子出版物出版中心 2006 年出版
- 4、《唐代进士录》陶易编著,安徽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3 月出版。
- 5、《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撰 [清]李慈铭校,浙江书局清同治 11 年 [1872] 刻本
- 6、弘治《八闽通志》[明]黄仲昭等纂 [明]弘治四年(1491)刻本 四十册八十七卷
- 7、淳熙《三山志》[宋]陈傅良撰写 梁克家署名,[清]唐翰题跋抄本
- 8、《通鉴考异》[宋]司马光撰 [宋]嘉靖 23 年-24 年孔天胤刻本
- 9、乾隆《福州府志》[清]徐景熹 [清]乾隆 21 年 [1756] 补刻本

“百工之乡”千年传承

金柏东

在《周礼·考工记》中，手工业者被称为“百工”。温州环山面海、气候温和，历史上一直以手工业著称。从新石器晚期萌芽，温州百工历经唐宋明清四个黄金发展时期，形成陶瓷、造船、造纸、漆器、织染、印刷及瓯塑、瓯绣、油伞、草席、鞋革等当时全国领先的工艺。这种由手工制作、有独特风格的传统技艺，如今被称作“工艺美术”。目前温州仍活跃着十大类别、120多个品种的工艺美术类别，部分已形成产业群，部分被列入“非遗”名录。尤其是鹿城、乐清等地，更是一片鲜活百工沃土。继乐清“全国木雕艺术之乡”这张国字号金名片外，鹿城区去年10月也获得“全国刺绣艺术之乡”称号。本文试以地理、气候、移民及永嘉学术等条件，梳理温州百工形成、发展等历史脉络，以求在“弘扬永嘉之学，振兴温州百工”、打造新百工之城过程中有所启迪。

一、温州为何能聚集百工

温州城区信河街、五马街、仓桥街、百里坊一带，曾是手工业者聚集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周边有手工业作坊近三千家，从业人员一万七千多名，行业以五金铜锡、竹木制作、皮革、纸伞伞料等为主。他们审材成器，是

居民生活中离不开的能工巧匠，也就是“百工”。

在汉代补缺《周礼》的文字《考工记》中，“百工”属当时全国六门工艺之一。“审曲面势，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是对“百工”较早的定义，包涵诸多特征：根据原材料曲折方圆和性能等进行加工，使之成为百姓可用的器具。而所谓“五材”，据郑玄注“此五材，金、木、皮、玉、土”。《左传·襄公二七年》也有“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之句，可见这五种材料对当时百姓生活的重要性。后随着材料的增加，百工内涵也随之扩展，他们是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新兴行业的从业者，是心灵手巧的实践者，是传承革新的力行者。那么温州为何会成为百工聚集之地？业内人士表示其中有很多因素，但主要在于地理、气候及移民和社会等原因。



农具铺 蔡榆摄

气候是影响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一。温州地处温峤岭以南，温和的气候为农耕和手工业者提供较好条件，故早在南朝，已是“东南之沃壤，一郡之巨会”；又因非主要之兵家要塞，故在改朝换代等社会动荡时期相

对稳定，经济人口得以持续发展，吸引了历代移民定居。百工技艺的载体是人，温州是移民之乡。从西晋到清初，温州有过多“次”的移民史。如西晋衣冠南渡，北方贵族南下；唐末、五代十国时期，为避战乱，全国以及八闽之地大量移民迁入；到宋代，因乾道二年（1166）水患，温州人口“存者十一”，当局紧急申请福建移民补籍；建炎南渡，赵构温州避难，也带来不少南下人口。此后明初推行卫所制度，使得全国卫戍移民大批进入温州；另洪武三年（1370），因水患、蝗虫等造成灾荒，民众在政府主导下向全国移民，也有不少进入温州境内。清代初期，社会动乱也导致大量移民进入温州。

历代迁居温州的族群，不少“挟货”而来，他们有的擅长“铸铁”，有的长于“建山塘”，有的带来造纸、印刷技艺。如后晋天福二年（937），吴氏家族从福建南屏迁居瑞安陶山、桐溪等地，带来屏纸生产技艺，从而形成产业，带动周边民众从事生产。此外，温州宋代青白瓷、黑瓷，明代青花瓷的烧制工艺、活字印刷技术（五代时，王氏族群从河南迁居福建安溪，在明天启年间该族群王思勋五兄弟迁徙到温州平阳，带来活字印刷技术，后在瑞安东源形成产业）均由外迁人员引进。

尤其在宋室南渡后，温州人口激增到百万之众。地少土薄的温州，正如宋本《方輿胜览》所载“温居涂泥之鹵，土薄难植”。因此在以农耕为主的年代，较之广袤平原，温州并没有多大优势。人多地薄，故居民只能凭借灵巧双手和智慧头脑，在原材料加工方面不遗余力，“民勤于力而力以力胜。故地不宜桑而织纴工，不宜漆而器用备”。

移民中的能工巧匠，把各地手艺、技能和文化带到温州，被认同、接纳后形成合力。随着从业人员增多，逐渐形成分工细致化、工艺精美化、形式多样化的趋势，从而开创闻名全国的手工业，温州也因此被誉为“百工之乡”。

二、历代百工发展情况

汇聚的历代“温州人”，用高超技艺从事造纸、印刷、漆器、纺织、造船、制瓷和雕塑等行业，他们制作的用具器物全国闻名，乃至不少被列为贡品。

如东汉时期瓯窑创烧的青瓷，因色彩雅致可爱，被晋代文学家写入作品，誉为“缥瓷”；如唐代地理志书《太平寰宇记》载有“永嘉土贡竹丝灯”等句，这种竹丝灯制作艺人，曾在我市慈湖、沙门、南堡一带聚居，到近现代，家家户户还都曾以此为副业。此外，丝绸、鬲纸、皮革等，也因制作精良被列为贡品。

温州并不产漆，但在宋代，温州漆器制作却号称全国第一。当时生产漆器的原料，大多由徽州、严州等地商人贩运而来，由温州工匠加工生产。宋元温州城区漆器作坊众多，大都集中在城区信河街、五马街、仓桥街、百里坊一带，有戗金、描金、堆漆、鹞色、绿色、牙色、卷素、撒光、嵌螺、针刻、剔犀、锦犀、飘霞等几十种不同工艺。其中以堆漆、描金最见特色，嵌螺最为精巧。温州漆器在当时的都城开封、临安都设有“专卖店”，不少产品还销往海外。从目前出土的漆器铭文中，常见有“温州”字样，可见当时“温州”两字已成品质保证。漆器堪称当时温州百工中的一张金名片。

温州独有的民间艺术瓯塑，历史或可上溯到宋代乃至更早的漆艺（漆器中的堆漆工艺）。到清末，温州堆漆艺人谢新宝，将漆灰（大漆）改成油灰，以瓦灰来替代原用的香灰，再进行塑形。这种将传统泥塑与漆艺相结合的独特工艺，被称作油泥塑，后名为瓯塑。后瓯塑又经多次材料改革，在塑形工艺、油泥色彩等方面均有长足改进，作品颜色多样、立体感较强，被称作“东方立体油画”“彩色浮雕”等，代表作被布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南海、外交部等国家级重要场所。

此外，宋代温州造船技术也非常先进，曾一度“岁造船以六百只为额”，成为国内造船定额最多的地区之一。及明代以降，温绸生产技术成为周边城市翘楚，工艺传播各地。清代温州纺织、十字绣、制革、制瓷、伞扇、泥塑、

竹编、木雕、彩灯、彩石镶嵌、金属工艺等产业形成规模，产销分工明确，活动疆域不断扩大。

而近代开埠以来，随着新生手工艺不断涌现，传统手工艺不断创新，手艺人队伍日渐壮大。因此，手工艺工会如铁匠工会、木匠工会、铜匠工会、纺织匠工会、理发匠行会等组织纷纷成立，以保护工匠合法权益。直到如今，温州仍是我国著名的手工业城市，曾获“中国民间工艺美术之都”“中国民间艺术之乡”等称号。

三、永嘉之学起引导和促进作用

温州百工走向繁荣，除上述天时地利人和因素外，南宋形成的永嘉之学，也起到引导和促进作用。

在此之前的西汉河间献王刘德（东汉光武帝刘秀之孙），将先秦佚名作品《考工记》补缺儒家经典《周礼》，与国家行政、礼典、教育等并列成六类职官中的“冬官”，可见先哲对百工的推崇。但随着汉武帝（西汉第七位皇帝，前141-前87在位）罢黜百家政策的推行，儒家思想备受推崇。当时的学者以“闻道”为最高境界，因此在他们“重道轻器”经世思想指挥下，朝廷科考取士以策论为主，科学技术、工艺制造等不被列入考试范畴。

所谓“道与器”，属易学和哲学范畴。“道”是无形的，即乾坤阴阳变易法则；器则是“有形有象、可以致用之物”。道与器一直是历代学者思想体系中关注的重要点之一。

南宋以温州人薛季宣、陈傅良、叶适为主要代表的永嘉之学兴起，成为当时较为重要的学术流派。永嘉之学提出“道器并重”，倡导“崇义养利，主张发展工商业、改善民生”等实际性工作。陈傅良就有“所贵于儒者，谓其能通世务，以其所学见之事功”之言，而这种注重事功、实用的思想，在当时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永嘉之学在温州乃至浙东甚至全国，有了较大影响，其事功思想，为温州形成“百工之乡”提供了理论支撑，也引领

温州走向发展工商业之路。因此南宋温州城内，较北宋温州知州杨蟠所言“一片繁华海上头”更为繁华——作坊店铺密布，百业齐全，不少行业如陶瓷、漆器、丝绸、造纸、印刷等已规模化生产。其中尤以丝织业发展迅猛，民办、官办作坊中，大量生产缣丝、瓯绸、溪绢、绉纱等。

永嘉之学到晚清，被温州大儒孙诒让继承和发扬。他强调“经世致用”思想、强调“百工”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些都表现在孙氏花费数十年著述而成的《周礼正义》及《墨子间诂》等书里。

孙诒让结合晚清洋务运动的西方经验，在《周礼正义》中所列“提倡科学、奖励发明、兴办制造、开采矿山”等条目，充分表明他的“重器”理念。他对“历史上长期受冷落，但被后世看作兼重道器、沟通义利重要著作”的《墨子》一书加以注释，对墨子的造物观念加以阐述。

墨子名翟，生活在春秋末战国初，他虽然立身于“士”，居“士农工商”之首，但他较为同情“农与工肆”。墨子阐述的“造物”理论，如工的巧拙理念、百工制器要有一定流程规范等；在《节用》一章里，墨子强调“强本节用”，也就是要重视生产、提倡节俭。

孙诒让对两部名作的注释，孜孜以求的正是被传统士大夫忽视、贬低的工艺制造，反复阐明“百工”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他不仅继承且弘扬了永嘉前辈的思想特征，还身体力行，用墨家苦志力行的实践精神，来兴办教育并进行各种实业活动。

四、晚近百工产业活跃

随着晚清国门被迫打开，“实业兴国”成朝廷自救策略。清廷在1907年将“商部”更改为“工商部”，以加强对“工”的扶植。同时为促进各行业良性竞争，举行或参与国内外劝业会、博览会。而这时机器生产尚未正式兴起，因此清廷展品以各地手工业品为主。朝野对博览会的认识，也从最早的炫奇、赛珍，上升到交流、邦交、商贸的层次，手工艺迎来新

的发展时期。温州产品也是各类展会上的常客，如1905年的美国圣路易世博会、1910年清廷在南京举行的南洋劝业会、1915年美国巴拿马博览会、1926年的费城博览会及1929年西湖博览会上，温州的黄杨木雕、锡器、刺绣、石雕、镜框、栏杆、台绸、纸伞、龙须席等广受欢迎，成了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当时均形成不错的产业群。

其中黄杨木雕盛产于温州城区及乐清两地，是我省黄杨木雕主要产区。为更好发展，清末民初，葛雨亭、叶阜如、朱子常等十多位知名艺人联合开设了“永乐雕塑工局”，使黄杨木雕远销海内外。随着产业壮大，此后还成立有雕塑职业工会等行业组织。除黄杨木雕外，温州刺绣，草席、纸伞等，也挑起百工之乡出口创汇的重任。

温州传统刺绣是历史悠久的实用工艺类别，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上海、苏州等地绣法，作品中常见绣花片、挂屏及佛教用品（如殿堂悬挂的布幔等）。清咸丰三年（1853），温州始设专业绣铺且盛极一时。温州开埠后，刺绣产品进入欧美和南洋市场。1916年，温州设立刺绣局，生产出口绣品，创造可观的经济效益。在随后的五六年间，温州类似绣铺达二十余家，分布在城区府前街、五马街、打锣桥一带，从业人员达五六百人，年产值约四万银元。

刺绣中的十字绣（挑花），是近现代温州从事人数较多的家庭作业之一。十字绣从明末清初开始盛行，城乡妇女在羽纱布上绣出花鸟、龙凤、走兽及吉祥字等，用来装饰衣领、鞋头、枕套、肚兜等用品。而在1915年巴拿马博览会上，国内商人发现欧美国花边等绣品需求市场巨大，反馈给当局后，令“一律仿制”。1922年，温州人黄启文父子创办绮文女工社制作挑花布，并与外商艾黎波合作，开设了六家十字花台布批发局，专营出口南洋及欧洲市场。

温州出品的十字挑花台布、花边等，受到外国消费者欢迎。1926年，港台及外商到温订货，将这个市场推上高潮。到1930年，温州花边等绣品生产遍地开花，如乐清就有七家花边局，年产量一万两千多码（英美

制长度单位，1码等于3英尺，合0.9144米）。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温州成立花边管理委员会，即温州地区花边厂前身，职工七十余人，外加工人员过万。到1958年，温州不仅有地区花边厂，还有温州市花边厂，乐清县花边厂等，专职员工千余人，外加工人员达三十多万，生产的绣品种类众多，有床上用品，家具装饰品、童装和手帕等日用品。花边生产辐射温州各县，产品畅销九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后技术人员在十字绣基础上，又开发出“万缕丝”彩边绣、拉丝、拼花等绣法，提高了十字绣的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后于2007年被列入第二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十字绣产品或是当时涉及人员最多的行业之一，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还常见于温州城乡家庭作业中，几乎是那个时代温州出口量最大的工艺品之一。

与十字绣等手工作业的产品一样，龙须席也曾是家庭重要收入来源、温州出口创汇的主要产业。温州龙须席质量优胜，康熙年间被列为贡品。清代知名词人纳兰容若就有“八尺龙须玉笋寒”诗句，其中“龙须玉笋”即温州龙须席。1919年，温州人郑恻尘创办草席厂，后发明我国第一台软席织造机。而在之前的1917年，瑞安李毓蒙已成功发明我国第一台弹棉机，于是我市部分传统工艺，开始走上机械生产之路。

五、期待谱写百工新篇章

从新中国成立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温州工艺美术重新焕发青春时期，其审美、设计等方面均完成了现代转型，在坚持传统中走向创新。近数十年来，随着工业化进程加深，机器生产的廉价制品渗透百姓生活，很多民间手工艺慢慢淡出实用行列，温州街头众多手工业作坊也在逐渐转型或消失。

为保护传统工艺，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温州早在1960年代，就成立了全市工艺美术协会，1964年还成立了温州工艺美术学校。新千年后，

温州又有不少研究所、县（市、区）工艺美术协会相继成立，如瓯绣研究所、瑞安工艺美术协会等。这些机构通过各种途径宣传、研究、创作和培养后继人才。2003年，瓯塑教育“从娃娃抓起”，进入温州市区部分小学美术课堂。而最近几年，瓯塑、黄杨木雕、瓯窑等又进入高校校园，改变了传统师承方式，对大量培养专业人才作出探索和努力。

如今温州城乡仍活跃着十大类别、120多个品类的百工手艺。这些技艺分布广泛，已形成多个展示平台和产业园区。如温州城区设有工艺美术大师楼等代表性建筑和馆舍；乐清是“中国民间艺术之乡”“中国黄杨木雕之都”，当地拥有“艺雕小镇”、个人木雕艺术馆等，木雕产业活跃；瑞安等地的蓝夹缬制作、木活字印刷等工艺也有一定的规模；此外，“中国工艺礼品生产基地”也落户瑞安湖岭，年产值曾超六亿元。永嘉县则是远近闻名的“中国教玩具之都”，是全国重要的教玩具产销基地。平阳则有非遗文创街、漆艺佛像制作等规模街区和产业；泰顺的石雕、木雕、竹雕、车木玩具等，也已形成活跃群体产业。另外，如龙港礼品城、苍南碗窑瓷韵创意街均闻名遐迩。

据统计，温州现有799个“非遗”项目，其中传统美术119项，传统技艺240项。进入联合国科教组织认定“非遗”项目的，有细纹刻纸、木活字印刷两项；瓯塑、瓯绣、黄杨木雕、彩石镶嵌、发绣等12个品种被列入国家级“非遗”项目；十字花、竹丝镶嵌、温州石雕等21个品种技艺被列入省级“非遗”项目。至于工艺美术大师人数，温州拥有大师级工匠241名，其中国家级11名，省级75名。这在全国地市级中名列前茅。正是温州百工千匠以灵巧双手、智慧头脑，筑起温州这片全国百工“主阵地”之一。他们造就的寓美于器、寓道于器的人文之美，千百年来，早已植根温州及浙江人民的生活，化为血液、糅成基因。

东山书院：永嘉学派开创与传承之地

全定旺



永嘉（今温州）对于中国文化有两大贡献，一为山水诗，一为永嘉学派。南朝宋永初三年（422）谢灵运赴任永嘉太守，开山水诗之先河。北宋皇祐年间（1049-1053），王开祖设塾讲学于永嘉城东华盖山，华盖山又名东山，故后世称王开祖讲学之所曰东山书院。东山书院初无书院之名，仅为王开祖讲学的固定场所。据《温州府志》所载，宋淳祐十二年（1252）至明代，永嘉书院、鹿城书院为温州府主要书院，皆标榜永嘉之学。明代温州士人追本溯源，尊王开祖为永嘉学派创始者，故称其讲学之所为东山书院，并加以修复扩建。

清雍正年间，东山书院移建于城东南积谷山麓，不称其为积谷山书院，而仍沿用东山书院之名，可见其学脉传承。“山之胜，甲一郡，而书院坐收之”，新址效仿朱子择山水最佳处而建书院。积谷山为谢灵运遗迹，他曾凿池于积谷山下，留下“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的名句。书院傍山筑舍，依石为门，前绘谢灵运像，内祀王开祖。可见，东山书院开永嘉之学脉，又与山水诗之文脉有渊源。



永嘉学派之发源

《儒志编》为王开祖（字景山，号儒志）于东山书院讲学语录，当时周敦颐、二程等理学元老之学说犹未大盛，讲学者各尊所闻，虽贤如司马光，犹不免有《疑孟》之作，而开祖独毅然奋起，以讲明圣道为事。王开祖于东山所讲明之“道学”，为孔孟儒学，当时所讲皆《六经》、孔孟之道，被问及为学之主意时，他说道：“由孟子以来，道学不明，吾欲述尧舜之道，论文武之治，杜淫邪之路，辟皇极之门。”此正所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也。然，在开祖述尧舜之道而讲明道学，目的并不仅仅在于学问自身，亦在于将学问转换为现实上有效的政治价值，以开辟出外王经世之事业，而复归于“文武之治”的辑熙雍穆。除了重视孔孟之道学，

王开祖亦十分强调践行。他说：“举天下知孔子之言而不行孔子之道，是
不知孔子之道也。”其影响所致，南宋永嘉学者尤重视事功。所以，清代
学者全祖望、黄宗羲等人在《宋元学案》评论永嘉学者说：“其学主礼乐
制度，以求见之事功。”

王开祖东山讲学开创永嘉学术之风气，其后继学者亦创办许多书院，
如浮沚书院、仙岩书院、会文书院等，书院培养的门人群体使永嘉学派的
传承也具有相当的稳定性。王开祖之后，永嘉学术又得郑伯熊、薛季宣、
陈傅良继之，至叶适、蔡幼学、曹叔远等人而极盛，始与朱熹的理学、陆
九渊的心学，并列为“南宋三大学派”。

朱陆之学的目的在于成就圣人品格，即以个体道德之最终完善为其
价值取向，个人主体性的本质是道德的，主体精神所展现的领域也同样是
以道德为主的。永嘉学派诸人，所重视的则是通过典章制度的研究，并使
之切合于当世实用，以此来开辟现实事功，是所谓永嘉之学的“以经制言
事功”，故黄宗羲有言：“永嘉之学，教人做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
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

清代讲学活动之再兴

乾隆二十四年（1759），东山书院迎来“全盛时期”，前后达一百多年。
书院相继重修，增置涂田，筹措膏火之资，重新延请名师主持讲席。东山
书院掌教由官府聘请名儒担任，不少由府学教授兼任。温州府学教授陆汝
钦、王执玉都曾掌教东山书院。全盛时期，清代著名学者孙扩图、张振夔、
孙锵鸣、王棻等曾主讲东山书院。东山书院培养出很多学者名人，如清嘉庆、
道光年间，永嘉陈舜咨、张梦璜，瑞安林从炯，泰顺董旂都是此中的佼佼者。

曾任主讲的孙锵鸣（1817-1901），孙诒让叔父，亦是晚清温州地区
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清朝重臣李鸿章、沈葆楨曾在孙锵鸣手下进士及
第，他因此被誉为“天下翰林皆后辈，朝中将相两门生”。其主东山书院，

约在同治五年（1866）以后，凡逾三载。

晚清以降，内忧外患，士人们纷纷主张经世致用，向来追求事功的永嘉学派因之再度复兴。孙锵鸣及瑞安孙氏家族，便是有感于“自元明都燕，取士法陋，温复僻荒，至皇朝荒益甚”，而致力于复兴永嘉之学以启迪后进。孙氏家族的藏书楼玉海楼是江南四大藏书楼之一，存各类书刊近十万卷，孙锵鸣等借此整理刊刻了大量先贤著作，为后人研究永嘉学派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此举亦是孙氏家族能够再兴永嘉学派之重要原因。

孙锵鸣为学以益民为宗旨，并在书院中致力于实学教育。他时常劝诫他的学生要鉴古今、明得失，博约观取，才能明察古今政理得失成败之因，才能使坐而言者起而行。他在执着于地方特有的历史文化之同时，又在学习西方的问题上超越了旧式文人的视野，他曾向西方学习植牛痘，并率先在温州推广。

慎社、瓯社之兴起

1920年，在梅冷生倡议下慎社成立，初期以积谷山侧东山书院为聚会之所，后迁至鼓楼。其基本活动形式与传统士人结社无甚差别，均是在“雅集”之后汇刊旧体诗文，同时也接纳另行投赠的诗文。首期《慎社》内容、体例完全仿照柳亚子所主办的南社刊物，分文、诗、词三类。

慎社于诗词之外，仍有经世关怀。鉴于时政之乱象源于“学”之荒废，而主张由“学”及“政”，遂言“由此著为词章，发为经济，乃为有用之学。”

慎社第三次社集加入了当时的瓯海道尹林鹄翔。根据梅冷生的描述，“林鹄翔于视政之暇，笃好文学，且工于填词”，梅冷生等人向林献策，建议再创立一个词社。林鹄翔以当时漏海米之罚款为经费，重修积谷山下的东山书院，并设立“永嘉词人祠堂”。仿照杭州西溪两浙词人祠堂形式，立有永嘉历代游宦、寓贤、方外、闺阁等词人的木主。永嘉词人祠堂建成后，即在此设立词社，取名“瓯社”，林鹄翔任社长，其成员都是慎社中人，

分别是郑猷、王渡、夏承焘、龚均、梅冷生等 15 人，奉林鹑翔为师。社员中，夏承焘后来成为一代词学宗师。1927 年废除道制，社友星散，“瓯社”也随之告终。

瓯社以“瓯”字为名，显示出鲜明的地域特色。瓯社不再以家族或姻亲关系为纽带，而是温州当地学人因对词学的兴趣聚集而成的社团，词社的核心人物及部分骨干都是外籍人士，如林鹑翔来自于吴兴，王渡来自余杭。这也显示了东山书院等传统书院在近代逐渐被慎社、瓯社等近代结社活动所取代，然而其经世精神却仍留存于其间。

资料来源“鹿城档案地方志网”

二程文化在温州传播及“两创”对策研究

——以鹿城区山福镇驿头古村为例

程庆国

本文以宋代“二程文化”为基点，以温州市鹿城区山福镇驿头古村即驿头驿阳村山根村（温州“二程后裔”主要聚居村）为实例，初步梳理研究二程理学与二程家学（官学+家学）在温州地区传播历史，以及新时代“两创”发展对策研究。

一、温州驿头古村独特“人文集萃形象”

1、悠久历史文化及靓丽山水生态环境

驿头古村，人杰地灵、底蕴深厚，为历史文化名村。地名几经变更，原先为平山、和平、山根、岙底等四个行政村，今为驿头驿阳、驿头山根两村，总称驿头（本文统称“驿头古村”），该村为程后裔。

2、人文精神功业德行及海内外独特影响力

驿头古村，历史文化名人辈出，呈现独特“人文集萃形象”，享誉海内外。

（1）程灏：驿头始祖 - 讲学兴教 倡明道学

程灏（1161-1255），字大中，号怀洛，系驿头古村程氏始祖，原籍河南洛阳人。他是北宋“洛学”开创者“二程”（即程颢、程颐）之程颐（世称伊川先生）四世孙。他于南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任温州儒学“学正”，

承伊川“洛学”正脉，以“讲学兴教，倡明道学”为己任，而后全家定居温州，子孙繁衍，至今支裔已传三十世，代有德才兼备的贤俊之士，交誉于乡里。程灏，当年由真德秀推荐来温州“传道讲学”，留下第八子程统（即驿头二世祖）定居温州。

（2）程宗洛：驿头三世祖－学识渊博通家学

程宗洛（？-1283），字继儒，系驿头古村程氏三世祖。爱读书、好恬静、通“家学”、晓地理，通《易》。他心系理学，绝意仕途。南宋景定五年，游历廿六都驿阳，观山水之胜，乐风俗之美，遂定居驿头，为驿头程氏肇基之祖。

（3）程韬：驿头十一世祖－谦和乐助义举

程韬（1415-1488），字秉蕴，号松庵，驿头古村程氏十一世祖（程颐第十五世孙）。性谦和，好乐助。明成化十六年，程氏兄弟的“尚义之举”，名扬京城。明成化十九年（1483），宪宗帝下诏嘉其兄弟义举，遣温州知府项澄、永嘉知县刘逊，敕旌门以表程韬。事迹详载《胜迹·旌门》及《旌表程奕尚义碑记》，后者现为温州市级文保单位。

（4）程奕：捐粮义举圣旨嘉奖

程奕（1420-1490），字秉殷，号梅庵，驿头人。世传为宋儒伊川先生程颐的十五世孙。幼时明敏，“世传家书（二程理学）”多能记忆，即长，勤俭持家，广置田园数百顷，成为西溪一带富家之一。明成化十六年（1480），程奕与其兄程韬，响应朝廷“广积粮、备荒年”的号召，向永嘉官府捐谷1800斛。明成化十九年（1483），宪宗帝下诏嘉其俩义举，遣温州知府项澄、永嘉知县刘逊立石以表程奕。

（5）程智：学问高深，志业山林

程智（1474-1538），字惟道，号半闲，系程奕之第五子，幼敏捷，性孝悌，“诸子百家”无所不究，善诗书。同永嘉场（现温州龙湾区）明嘉靖内阁首辅张璁系同窗好友。程智的高深学问，以及志业于山林的人生志向，深得张璁赞赏，称他“负异才，隐居不仕”。张璁经常驾扁舟至驿山访程智，

切磋学问，在驿头村留下不少人文佳话。后来，张骢长子张逊志，娶了程智次女为媳，张、程二家成了姻亲。张骢在此留下了一些诗歌和为程氏家族所写的谱序，颇为赞许程氏家族积德行善之义举。程智著作颇富，原著有《半闲诗文集》，可惜已佚。今传世有《程氏墓道坊》书迹等。《程氏宗谱序》（张璠 撰）录有程智《诫子训》：“下之事上也尽孝，上之率下也尽慈，喜相庆，患相恤，病相扶，贫相助，待宗族而睦，交友朋而信，世世守之而不失。”

（6）程登云：辛亥革命英雄楷模

程登云（1867-1926），字子卿，号培桢，程氏第二十四世孙，系浙籍辛亥革命元老之一。自幼习武，武功卓越，性格豪爽，清光绪年间（1875-1908）庠生。因痛恨晚清腐败，遂积极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辛亥革命，任同盟会浙江支部第十分事务所评议员等职，以其驿头故居“外新屋”，作为辛亥革命期间革命党人的秘密活动地点。他是一位武材，《程氏家谱·廿四世登云公赞》描述他：“生而颖异，状貌非常。卓有大志，韬略名扬。弓穿七札，石举百钧。声蜚寰序，名列胶庠。有为有守，不柔不刚。天公善佑，眉寿偕藏。族之翘楚，乡之贤良。”志向远大，具有文韬武略，为人处世推崇传统“忠孝礼义”。在驿头程登云故居中堂上方，挂着马英久先生亲笔题写的“硕德貽徽”匾额。

（7）程让平：世界和合发展之使者

程让平先生，1942年出生，是驿头古村程氏二十七世孙。让·平，1942年出生于加蓬奥果韦省翁布埃市，“让”是法国神父起的教名，亲友们加上其家族姓氏而叫他“程让平”。1965年，他留学法国，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其外交生涯始于1972年，2004年当选第59届联合国大会主席。2008年当选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让·平先生的父亲程志平先生，从小就对程让平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尤其是程氏家学家训教育。受其父亲影响，程让平为人谦恭，温和而开朗，从政精干，务实而清廉，其形象“沉稳、智慧、勤奋、不温不火”。程让平深爱中华文化。

程让平先生的父亲程志平先生（1914-1985），驿头人，19岁离乡到法国谋生，1933年到非洲谋生，后为加蓬首富，曾两度担任州议会议长。程志平去世前交待程让平，要求让平一定要替他回去看看温州驿头的家乡，看看家乡的亲人。1987年，程让平曾特意回乡寻根；1994年又携妻子赴驿头认祖；2000年，程让平应外交部长唐家璇之邀再访中国，又回到驿头探亲。

二、驿头“人文集萃形象”文化根脉探源

1、“二程”家谱家学之历史印记

张璠，在大明嘉靖五年撰写的《程氏宗谱序》，证明“驿头古村（驿山）的程氏始祖（程灏，字大中），是伊川之四世孙”。峰山（即驿头古村）之有程氏，其源最远。自宋伊川公之四世孙大中公司铎于瓯，其子孙遂家焉。迄今凡十三世，忠厚相承，诗书继美，为永嘉著姓。

2、河洛渊源的温州传承历史路径

驿头程氏，为北宋著名理学家二程后裔，始祖程灏，号怀洛，是程颐的四世孙。程灏，宝庆二年（1226），由真德秀推荐，任温州学正，在温州“传道讲学”数载，留下第八子“程统”定居温州，至三世程宗洛，字继儒，公性恬静，爱读书，通《易》，时值宋朝灭亡，他绝意仕途，定居驿头，是为驿头程氏肇基之祖。驿头程氏传至现在，已经三十代，将近八百年的历史。

3、义理家风义举历史印记

驿头程氏传至十一世程韬、程奕兄弟，承继二程义理家风，明钟清撰《旌表程奕尚义碑记》云：“程为邑之著姓，世传为伊洛之裔，去郡城不百里许，其积善尚义之声闻于人者旧矣。”明成化十六年，兄弟俩为国捐稻谷一千八百斛，他们这一义举，感动朝廷，明宪宗皇帝于成化十九年（1483年）颁圣旨嘉奖，敕建“旌表程韬尚义之门”以奖励程韬，又立“旌表程奕尚

义之石”以奖励程奕。该义举至今，在溪山一带流传为美谈。

4、义理家学家训传承历史溯源

(1)《程氏家训（晋·程延）》：吾之子嗣，一莫不孝二亲、二莫弃本逐末背毁师长、三莫盗贼累耻先灵、四畏四知为人仁义、五远五刑莫犯刑戮、六政宽以调民、七躬事廉俭敦厚自裕。八、勤习经艺引文自饬、九用九思立德、十无忘好善。凡此“十事行之”，是吾胤也。

程延，字孝长，东阿人，晋咸宁中（275-280）续修程氏宗谱，并立家。

(2)《驿头·程氏祖训》：孝道宜敦；悌道宜尽；忠道宜尽；信道宜久；仁道宜厚；义道宜坚；礼道宜全；智道宜达。

5、驿头程氏族谱“辈分”序列之文脉传承（载之《驿头程氏宗谱》）

驿头，从始祖至今，族谱里的辈分排序，形成一组诗文类长句罗列：“大统宗绍，希志元仕，祖之秉惟，允孟一国，士应崇朝，永昌启增，铭成正广，贤良忠孝。”可见“二程文化”在“辈分”字里行间的体现。

6、驿头古村，从始祖到近代，孩童教育场所的变迁：

元朝，驿头程氏七世程元珍立“尚菴”私塾，延书教子；明朝有“时思堂”“善庆堂”等私塾；清朝有“槐菴”“云菴”等私塾。

三、温州“二程文化”传播之中华文明文化根脉探源

1、“二程文化”在中华大地之传播脉络

根据李敬峰在《二程后学研究》（李敬峰著 P119）中指出，学派谱系与思想旨趣，在“二程”之后形成规模的衍生“学派”，主要有：

(1) 道南学派。

(2) 湖湘学派。

(3) 永嘉学派（+ 木钟学案等）：元丰九先生→郑伯熊；袁溉→薛季宣→陈傅良→叶适。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周行己、许景衡、刘安节、刘安上、蒋元中、沈躬行、戴述、赵霄、张辉等九人，赴中原汴京“太学”

学习，研究“伊洛之学（即二程理学）”，史称“元丰九先生”。“太学”，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大学，始设于汉武帝元朔五年，是汉代设在京师的全国最高教育机构。

（4）涪陵学派。

（5）兼山学派。

（6）金代郝氏学派。

2、“二程文化”在温州本土之传播发展

根据程海勇先生研究认为，温州理学传播的总体脉络大致可分三个时间段：（一）元丰时期；（二）南渡之后；（三）木钟时期。其中，元丰时期，以刘安节、刘安上、周行己、许景衡为代表；南渡之后的绍兴时期，以虞仲琳、张九成代表；嘉定前后，以陈埴、叶味道为代表。

根据李敬峰等研究（《二程门人》，李敬峰著，P6）从宋代至明代，直接有“二程理学”（程朱理学）师承文脉密切关联的温州籍（古永嘉）学人及历史文化名人，有影响力的主要有：（1）鲍若雨；（2）陈经正；（3）陈经邦；（4）陈经德；（5）陈经郛；（6）戴述；（7）李处廉；（8）刘安节；（9）刘安上；（10）潘闵；（11）沈躬行；（12）谢天申；（13）许景衡；（14）薛季宣——“永嘉学派”创始人；（15）周行己；（16）虞仲琳；（17）张九成；（18）陈埴（朱熹门生）；（19）叶味道（朱熹门生）；（20）黄淮（程朱理学“木钟学案”门生）。

四、“二程文化”在温州新时代“两创”传播应用对策探讨

1、在驿头古村建设温州“二程书院”：开展《二程集》《二程易传》《木钟集》等“宋韵文化（二程理学）在温州”的系统性研究，以“百花齐放”的姿态，系统研究《宋元学案》之“木钟学案”，并与位于鹿城之“永嘉学派馆”、位于龙湾之“和合书院”等相关联书院形成呼应。同时对鹿城驿头古村的所有已出土“墓志铭”，开展专项文化考古研究。助力重塑“天

理+《二程易传》+《程子四箴》”等修身养性谱系。

2、将驿头古村“中加友谊馆”纳入全国及省市“博物馆”序列，并进入国家文化“数字平台”，提升其国际影响力。

3、创新塑造“二程文化在温州”的外联通道：与河南“二程故里”、福建“朱子学”（厦门大学）等机构联姻，搭建研究平台，开展全国性乃至国际性“二程文化”学术活动，完成全国“理学”谱系构建。

4、助力“乡村振兴”：编制《驿头村“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联村规划。建设村史馆、乡村博物馆、放鹤楼（驿头山根村）等。

5、助力重塑“二程家学”（国学+家学）家道文化谱系。发挥“二程文化”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传播及“两创”作用。助推“家风家教”（如驿头古村程氏祖训见下表），助推《家庭教育促进法》落实。

参考文献：

[1]《宋明理学研究（增订本）》，张立文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3月第1版。

[2]《二程门人》，李敬峰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20年9月第1版。

[3]《二程后学研究》，李敬峰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5月第1版。

[4]《内圣外王之道——实践哲学视域内的二程》，郑臣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

[5]《人能弘道——二程语录与洛学门人研究》，申绪璐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12月第1版。

我为军博画元帅像

陈天龙

倏然间五十余年如风吹过，许多往事都随时光匆匆流逝，唯当年绘制朱德油画像与修改其余九大元帅画像是人生难忘的往事。

实现理想：考取油画系

我家世居温州，我父陈禹门是知书达理的一介文人，义勇军组织者之一，支持辛亥革命。叔父陈亦候、陈守庸皆为爱国名士。我自幼受开明家庭的文化熏陶，年少就矢志当画家。1955年，我从温州二中高中毕业，报考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现为中国美术学院）。那时交通落后，坐了十几个小时跌跌撞撞的“老爷车”，到杭城已是后半夜。好不容易找到了坐落西子湖畔“平湖秋月”斜对面的院址，已精疲神倦，加之杭州酷热难受，次日进入考场仅半小时左右，我即晕了过去，眼睁睁失去了入学机会。

回温州后，母校美术老师叶曼济先生痼疾发作告长假，诚聘我任教图画，我便答应了，以助母校解决师资空缺的燃眉之急。鉴于我教学认真，学生喜欢，时任校长张丰先生企望把我留为正式教师。我实在太酷爱艺术了，至1956年夏终于忍心不辞而别，毅然再度报考美院，最终实现梦想——入读油画系本科。

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的前身，即在中国近代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国立杭州艺专，为蔡元培创建的、我国首屈一指的美术高等学府，每届招生录取人数甚稀，当时我班仅 12 人。1957 年整风“反右”运动开展后，全院顿失正常教学秩序。而后，各种政治运动接踵而来，学习气息从校园里蒸发，我以见缝插针的方式抢时间自行苦练技艺，使“运动”“学习”两不误。1958 年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开始了，全国各地大搞“放卫星”。年轻的学生总是跑在时代的先头，那时，我们经常下乡、下厂、下工地、下部队，深入工农兵生活。我多次去新安江大坝建设工地，白天劳动，夜间画画，忘却劳累。记得有一次深夜 2 时许，我与老师胡善馥教授（20 世纪 30 年代留学法国）挎着沉沉的油画箱去画人气沸腾、干劲冲天的工地。就在这种艰苦紧张的生活中，我画出了好些颇有艺术价值的佳作，很多作品入选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专题画集，油画《在上班的列车上》在《人民日报》发表，还得到了丰厚的稿酬。

光荣使命：为朱德画像

1958 年，北京始建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农业展览馆等著名的十大建筑，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1959 年春，开学不久，我正在上课，油画系领导突然召集各年级几个专业优秀的学生到系办公室开会，宣布一个谁都意想不到的“光荣、艰巨的政治任务”，即为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绘制党与国家领导人及十大元帅油画标准像。院领导说：“……这是学校对你们的信任，你们一定要如期圆满完成这个光荣的政治任务和历史任务……”为了工作能顺利进行，院里特地腾出几间教室供我们绘制画像用。分配我的任务是画两幅朱德总司令像：一幅大的是穿中山装式的标准像，另一幅是要放在十大元帅系列里的戎装像。当时，我的心里既兴奋又紧张。

然而，在短时间内要高水平地完成两幅领袖肖像谈何容易。总政除了

提供一张黑白的标准像照片外，别无他物。画国家领导人像，必须有第一手形象资料，不能仅凭一张照片“想当然”来画。于是，单位通过总政向新华社要来一些领导人的多角度人像照和生活照。我除了凭照片认真仔细地研究朱老总的外视形象外，还找来能反映他内在性格的有关文字资料研读，以便能贴切地绘制出领袖肖像画。1961年初春，朱德来院参观时，我以激动的目光凝视他的神态表情，发现与我所画的像十分相似，我的心中洋溢着自豪与喜悦，这是后话。

20世纪50年末，我国还没有彩色照片，北京提供的皆为黑白照。描绘脸部的肤色还可以对付，但如元帅服、帽、星徽等并无实物，更不知其色如何，岂可臆造呢！院领导知情后，火速与总政沟通，北京方面即以极快的速度空运来一套元帅服和元帅帽，还有金光闪闪的肩星和三枚胸章等。大家见了，兴奋地喊出声来。之后，就急速四处物色有气质的模



1961年，陈天龙在浙江美术学院教室

特儿。找到合适的人选试穿后发现，元帅服显得小了，我们猜测，这套帅服可能是为时任国防部部长的林彪备用的。我也试穿了一下，感觉太紧身。由于仅此一套帅服，只能找一个“替身”，大家便集中一起进行服色油画习作。因各人工作时间不统一，故分批集中作画。元帅服的蓝色非常耀眼，瞬间多变，色彩极难捉摸，大家画得叫苦连天。与我一起画的如陈达青、郑圣天、金一德都是高班同学，唯汪诚一是位年轻教师。我们基本上将上课与绘制画像穿插进行，更多时间是在画像。这段日子过着战斗式的生活，

很是紧张劳苦。至6月中旬，画像总算大功告成，整个精神顿时如释重负。我跑到校对面久违的西子湖畔，呼吸的空气都觉得格外清新，无比舒坦。

紧急任务：修改九大元帅像

回到宿舍，我马上给母亲去信，告知她暑假在即，不多日就回家看望她老人家了。岂料，连母亲的回信都尚未收到，又一个紧急任务落在我的身上——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收到画像后打开一看，除了我画的朱德元帅像，其他九幅元帅像的脸色都如饮酒后泛红，要院里火速派员赴京修改。这是个大难题啊。国产的红色油画颜料与浅色尤其是白色调配必然泛红。因我平日在苦学中积了一些经验，都选用色彩性能稳定的颜料，如土红、印度红调配就没有出问题。院领导二话不说，就指定我一人即刻赴京担此重任。我只能领命，心里意识到此去工作的分量，且关系到美院的声誉。我错综复杂的内心不言而喻。

坐了几天火车，到京后，我拿着介绍信住进新街口旅馆报到。该旅馆被总政全包下了，里头汇聚了不少全国各地名家，如上海的国画家程十发、西安的油画家蔡亮等。与我同住的是我院雕塑系的一位老师。我每天早晨8点前乘公交车去博物馆上班，路经长安街，每天看到天安门、赶建中的人民大会堂与革命历史博物馆。傍晚五六点同样乘车回来。早晚都在旅馆用餐，中午在博物馆餐厅吃饭，四大盆饭加一菜一汤，数人围坐一大圆桌，有说有笑。紧张的工作之后，吃起来真是津津有味。一起工作、用餐的几位军旅名画家中，何孔德是“右派”，有的军衔则很高，他们的作品当时都颇有声望。接待我们的负责人叫李凌云，是总政官员，他总是和颜悦色，大笑起来会习惯性地用双手拍自己的屁股，也引得别人哈哈大笑。他不光关心我们的生活，连提供给我们的颜料都是英国产的，那时候一般人是无法得到的。英国红色较国产马利牌的性能稳定，它是从矿物质中提炼的，所以我敢于适量运用它来修改元帅像的肤色。

十大元帅像的画面不太大，幅面约 90cm × 70cm，但修改工作很伤脑筋，因每幅脸部技法都不同，我必须保持原味，小心翼翼地修改色彩，真是件极痛苦的“劳役”，因此，修改进程缓慢。尽管我是个快手，但也无法确保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于是，我向杭州院方要求派人增援，后来让郑圣天来京协助。终于如愿，紧张而愉快地结束了修改工作，带着博物馆的谢意，轻快返杭。

整整埋头苦干两个月，返校即开学了。由于我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也为学院争了光，1960年，美院把我列为高材生向部里推荐，我便考上了由文化部委托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举办的罗马尼亚著名画家埃乌金·博巴（Eugen Popa, 1919—1994）油画研究生班继续深造并担任班长。毕业后，我在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任教，后因公需要调回故里工作。而今，我虽已古稀，仍挥笔若狂，默默为中国油画艺术发展略尽微薄之力。



1962年，博巴与学生们，中黑衣者为陈天龙

搬家杂忆

沈智毅

在温州老一辈城里人的口述中，黛瓦粉墙、古石桥、老门台、石板路、狭窄巷，门前流水小舟，屋后榕柳常绿，是古城的标志性符号。但在我小时候，鹿城已没有多少诗意了，纱帽河无河，第一桥无桥，四顾桥有桥无河，几十座曾经的朱户门庭、北楼佳苑，徒留昔日华丽的门台，里面已是挤满七十二家房客的烟火人间，文庙、城隍、府学、县学徒留虚名早已挪作他用。笔者曾有七律《温州古城》记述——

书圣驰声五马街，挥鞭百里静江淮。
仁和南北香山药，济世东西信茂斋。
三益丝绸冰滑骨，五洲纱帽垒干柴。
松台证道尊闻语，妙果高悬护众牌。

房子，对中国人来说无疑是立身之本。头上无片瓦遮雨，脚下无寸地存身，自古以来就是穷汉的比喻。不少温州人或许有恋房癖，特殊时期非法建房成风，后来“炒房团”北上南下，攻城掠地，在京沪广杭等地，刮起一股“温风”。由于抢占了先机，让那些大名鼎鼎的“专家”都眼红。

我是正宗温州人，对房子自然也有所追求的，虽然没像有些人那样“炒”

得天昏地暗，但屈指算来，时至古稀之年，也搬了七次家。

我出生在温州市区五马街 83 号，一条窄窄的小巷，房子沿东西朝向排开，大概有 20 多户人家，清末年的老宅坐北朝南上下两层，后有两进也是两层楼，有水池、水井，有一个大道坛，沈家大概占了一半，这是我祖父积攒下来的家业。祖父还开有“沈德盛”酿酒厂，在五马街街面上买有门店，后被恶邻设套侵占。恶邻行贿法官，我家打官司还输了。祖父气得生了一场病，于 1950 年过世。挨到解放后，除住房外，全部商产都公私合营，恶邻强占的也被“合营”，也算为祖父出了一口恶气。我出生时，祖父母均已逝世。托祖父福荫，七口之家，居住面积 180 余平方米，时在温州算是中上“豪宅”了。

1958 年夏天，我父亲在制革厂干供销长年在外。一天五马公社派人通知，这里要办食堂需要马上腾空。接着便是捣灶掀锅拆门板，吓得我们忍气吞声，不敢与他们理论。

我兄弟姐妹 4 人，最大的 8 岁，最小的 1 岁。父在外，弱母稚童，幸好厂里工友伸出援手，几辆板车将家具一装，运往公社指定地点——纱帽河 X 宅的“檐间角”，用旧板一隔就算安家了。父亲出差回来已是木已成舟，唯有唉声叹气。大办食堂是一场“政治运动”，在大势面前我们不得不低头。

孰料，被逼到“檐间角”的我家，因此与隔壁 X 家结了冤。他们认为是我们占了他家的“檐间角”，天天白眼冷语。其实，彼此都是时代的受害者，这本账算在我们头上真是有点冤。

那阵子家里基本不开火，到纱帽河食堂搭伙，早上两个地瓜饼、中晚三个地瓜饼，一碗没有油腥的菜汤。偶尔食堂也会改善伙食，一周一户一碗肉丝面，妈妈将面捞出来给外公吃，将汤续水给四个孩子当营养。那时孩子头大、腹鼓，个个肚子里有蛔虫，那些蛔虫饿的穿肠的病例不少见。母亲见孩子长得没人形，就将金戒指、袁大头拿到银行兑换，买点肥肉熬油。

父亲经常出差，那些南下干部经常托父亲给山东老家捎一罐猪油、一袋地瓜粉。父亲回来说：“温州算是最好的，山东那边农村大坟小坟紧挨

着，树皮都剥光了，惨状非常恐怖。”

邻家的孩子比我们大五六岁，一次借玩家家，将我从高处直接推下。我鼻子骨折大量出血，也不敢告诉父亲，那年我6岁。我确信他是借机报痛失“檐间角”之仇。

强邻环伺，父亲觉得居住环境实在太恶劣，就通过各种关系“开后门”找房子。这时，大办食堂已显颓势，得知纱帽河吕宅屋会客厅原食堂办公处有空房，计150平方米，父亲遂将五马街的房产与之置换。1960年初，我们搬入新居，我读小学就住在这里。

记得那个五马食堂曾出过一个“名人”。几个新华印刷厂技术工人动了歪脑筋，一人制模板，一人印刷，造假粮票，叫五马食堂出纳叶朝熙销售。叶朝熙将假粮票销出去没几天，就被公安机关逮住。一论成份他最差，祖上大资本家，其他几个都是工人阶级。于是，叶朝熙被五花大绑，游街枪毙。叶是我妈妈远亲，所以记忆颇深。

小时我身体羸弱，冬天发烧浑身打摆生风痘是常态，一发烧，母亲就领着我去隔壁看医生。徐堇侯老医生把脉开方，去老香山、民生药店抓药也就7分钱，三剂药立竿见影。临走老医生总是吩咐我回家打两个鸡蛋，放三两黄酒、一两红糖，炖了吃。夏天我经常中暑，多亏隔壁放痧能手林老伯及时出手。那时经常生病，主要是没营养身体虚弱。

回忆少时，邻里特别面善的，除了为人民服务不收分文的那位徐老中医，还有那个拉板车会拔罐放痧的林老汉，那个挑水一头高一头低的周老头，那个唱京剧很溜的口吃金老头。后来这些人也都平了反，真实身份分别是历史反革命旧军人、历史反革命金融家、右派资本家……1970年，我支边去了黑龙江，返城后于1984考入温州日报社，1986年在吕宅屋22平方米的风房子里成了家……

后来，国家开始落实政策，吕家后人要回被没收的房子。于是，此屋还给吕家，五马街83号原址同样也还给我们。可是，新问题又来了，原址都住着多户人家，一时无法腾空，扯了好几年皮。最后，由于五马街改造，

历史矛盾才得以化解。

此后，我搬至人民路中侨大厦皮革宿舍，计 25 平方米。后又辗转住过公园路、学院路，温迪路那个七楼，对老年人实在不合适，上得去下不来；三年前搬到瓯海梧田。此处甚好，房子大小适中，南北西均朝塘河，绿荫深驻，烟树历历，流水环绕，南眺大罗山，北望牛山，既养眼，也适合养老。

几十年间七次乔迁，从五马街到沙帽河、人民路、公园路、学院路、温迪路、瓯海梧田泽霞街，也曾经目睹外祖父松台山麓叶德昌老宅、五马街沈家老屋、人民路公房被夷为平地。我住过的房子还有 3 处未被拆。

社会在发展，观念在变化。几十年来，我们从城市搬到郊外，房子却越搬越舒适，这都得益于城市建设品味的提升。而今，新温州高楼大厦林立，老温州古街小巷弥足珍贵。可以看出，每一次的迁居也是伴随着社会的进步。

至此，以一首七律聊表心怀——

梦忆松台郭璞令，唤醒白鹿月边耕。
鳌居孤屿江天色，龙泽江垞佛国情。
老屋拆推鸥泪落，古村明灭鸟心惊。
何期古郡清芜秽，还我东瓯北斗城。

申温线客轮的记忆

姜方良

温州港地处瓯江下游河口段。瓯江，旧名永宁江、慎江、温江、发源于浙江省庆元县百山祖。干流全长375.5公里，流域总面积17950平方公里。鹿城区境域起自双潮乡小旦至七都镇东端，航道长30多公里，江面宽300米—1500米不等。江面自西向东逐渐从1000余米至5000余米，潮起潮落。江心屿、七都依序列居港内，北岸后方山峦起伏，全港域广水深，风平浪静。港址在东晋时确立，经唐、宋、元、明历朝，发展成为中国对外通商口岸之一。清代时影响进一步扩大，民国时期历经短暂的繁荣后，逐步衰落。

温州至上海的海上客运航线，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据《温州港史》（1990年出版）记载：

“1877年4月10日，一艘300多吨的客轮，从上海驶达温州，成为近代史上温沪客运航线的开端。当年，运送旅客为794人次。”

前些年，我曾与温州造船厂退休技师金老先生聊起温州造船业与温州港的琐事。他说自己当年在上海处理完事务后乘“申温”线首航返温，见证了当时的情景。

1958年4月17日，第一艘从上海抵达温州的客轮叫“民主四号”，

首航载着上百名旅客，平平稳稳地航行在瓯江水面上。轮船将要抵达麻行码头时，船上鸣起了响亮的汽笛声，船上的旅客和全体船员都激动起来，大家从客舱里出来站在甲板上等候。轮船慢慢地靠拢码头时，欢迎的人群人山人海，岸上和船上鞭炮、锣鼓齐鸣。

19日上午，麻行码头，举行隆重的“温沪客轮通航典礼”仪式，温州市委领导到会祝贺并剪彩。从此，3000吨级新客轮“民主号”和“和平号”正式投入运营，客轮定为五天一班次。全程316海里，航行约24小时。几年后“文革时代”，申温线的客轮易名为“工农兵18号”，“工农兵19号”。如果说“文革”时代高奏的旋律是“工农兵”主题的话，那么



一号码头 蔡榆摄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申温”线的客轮，则以繁荣昌盛四字后加新字，即繁新、荣新、昌新、盛新来命名。这种易名，反映了我们海运事业经过拨乱反正，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生机。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旅客流动量增多，轮船航班改为隔天一班；随着3800吨海运客轮繁新号、荣新号、昌新号、盛新号的到来，为温州市民出行带来了莫大方便。

之前，乘船的旅客主要是单位出差的工作人员，或者是企业工厂里的供销员。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

温州的十万供销大军崛起，大部分人都喜欢乘船到上海中转，至全国各地接业务或采购材料。据说海上航运未开通之前，公路起点站在丽水。我们温州人出差只能坐“猛犸船”，由纤夫顶着逆流拉着绳索到丽水，再乘长途大客车。最早的大客车，是尾驮有煤气发生炉的那种，从丽水至金华转火车。

随着客流量的增多，轮船改为每天一班。但还是一票难求。记得那时的船票价格：二等舱，11.20元，4人舱；三等舱，8.7元，8人舱；四等舱，7.6元12人舱；五等舱，5.5元，多人大舱。若买不到船票，也会发售部分没床位的“散席”票，也称“统舱票”，每位5.5元，每人上船后可领一草席和毛毯，在走廊或五等统舱旁找个空地当铺位。

乘客上船提着大包小包不奇怪，用扁担挑着行李也不是稀罕。往上海去的温州旅游，难免会带着温州土特产、干海货、瓯柑密桔之类；返回温州的，则往往会从上海带回那个年代堪称稀有品的“的确凉”或“尼绒布料”、鞋类等物品。这些物品当年要凭计划券购买，上海产算是高档物品，甚至也算精品。

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到温州的船票更加难买。上海海运局申温线的售票处，设在上海金陵东路1号。每年年关将近，返温的温州人从全国各地流向上海中转。金陵东路1号售票厅排队购票的场景甚是壮观。在售票厅外先排队编号，有时要等好几天；等到手背上写上了编号，便可按序买到票。那时亦有票贩在倒卖船票，黑市的票价比正常的高出好几倍，甚至一张票卖几百元。

上海至温州的船上，时间过得也很快。船上有餐厅，晚上有电影，小买部有售书籍和副食品之类。我们温州老乡在全国各地跑业务，因为乘船回家，大家聚在一起了，操着不同的口音，谈各地的新闻，客舱里大家谈笑风生，甚至是欢乐。记得有一次乘荣新轮返温，有幸当上了“旅客代表”，参加船长主持的会议，协同船工搞好船上安全工作，并且要提几点意见以纠正船上服务不到位的问题。上海客运荣新轮是“服务先进船”，才有这

项活动。

上世纪八十年代，每年春运期间，上海至温州都要增开“长山”“长柳”号大轮船，加班轮中时有双体平底船瑞新轮的加入，双体船是营运于长江的客轮，因年底调援“申温”线，尽快运送温州旅客返乡。

有一年乘坐班轮“长柳号”班轮返回温州，竟然在这艘船遇全国劳动模范、“长柳”轮政委杨怀远同志，那天他在船上值班，为旅客们倒茶倒水，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三杯香茶敬亲人，亲人就是旅客们”。他边服务边朗诵，这一段段感人肺腑的短诗句，言语情深暖人心。杨怀远同志几十年用断过多少根小扁担，他用这一根根小扁担，为老弱妇幼旅客挑行李服务。

轮船总长约百多米，宽度几十米，上下四五层楼。早上起来看日出，风景无限好，站在甲板上，看到船头溅起千朵浪花，船尾吐出万条白练，海鸥在高空飞翔。

上世纪九十年代，温州民航机场建成通航，温金线火车投入营运，公路运输的快速发展。市民的出行也改乘飞机和火车，温州港海上客运也渐渐地减少。据有关资料统计，1998年6月11日金温铁路正式开通后，海运客轮“申温”线旅客流量，不到鼎盛时期的十分之一。到2000年春节期间，“申温”线首次出现“零”客运。因此，上海至温州航运海轮客运，宣布全线“退役”。后来改为游轮，在这条航线上运行了一段时期，还是很少有人乘船到上海。

“申温”线四十多年的营运，为我们温州和浙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四十多年来从没发生过一起海难事故。虽然“申温”线已停航二十多年，但这份记忆深深地烙在我们这一代人心里。

“柴火”变奏曲

王 曙

翻阅电脑文件夹，有二幅上世纪八十年代拍摄的作品，再一次吸引我的眼球，勾起诸多回忆。

1958年随父母来到温州小城，那时候，不少人家还是用柴火灶做饭，烟熏火燎，一到饭点整座城炊烟袅袅，遇上阴雨天，空气中上漂浮着一层烟雾。六十年代初期，我们家因为住在二楼，只能够用酒精炉来烧饭。这不仅仅慢而且相当地不安全，非常容易诱发火情。后来改为煤油炉，点燃二个满是小孔的铁围圈之间的灯芯，不多会便冒出蓝色的火苗，活力忒旺。缺点是不能离开人，稍微有点汤汤水水溢洒出来，浇灭火后就很难再点燃，必须要等干燥后才能再用。1963年前后，我们和大多数人家一样，用上了煤球炉，在煤球店购来煤球蛋，用旧报纸点燃后加上劈成小块的木柴做引火，点着煤球蛋。每次一开始生炉子时到处是浓烟滚滚，呛得不行，还必须用扇子不停地扇，那时舍不得买蒲扇，尽是自己动手用硬纸板钉在小木棒上的土扇子，一年下来要换N把。睿智的温州人想出聪明办法，用白铁皮做成喇叭形状的筒子，生火时，将喇叭筒大头朝下扣在煤球炉上，利用自然吸力拉风，不一会煤球炉就旺了，虽然不要人力去扇，但依然烟雾滚滚，到处弥漫着浓郁的煤烟味。煤球炉中的煤球烧完后必须用火钳夹一些煤球进去，才能继续烧饭做菜。后来，市场上开始供应煤饼，用机器压成

有七八个圆孔的煤饼比煤球好用得多，但引火还是要重复煤球时代的程序。七十年代晚期，煤饼供应有了限制，按每户人口数发煤饼票，用起来显得紧巴巴的。到了凭票供应的年代，几乎一切生活用品都凭票供应，年底排队去居委会领取所有的票证，布票，肉票，豆腐票，火柴票，煤饼票，米票，面粉票，油票，香烟票等等等等，凡能够想到的都有票，领回来的票十多大张，被单一样。于是乎，社会上就多了一个“行业”——倒卖，调换票证，不少从农村里来的妇女在城里穿街走巷，专门贩卖捌伤票证。

1981年后有一段时间，煤球店不卖成品煤饼，而是卖煤粉。整个城几乎一夜之间家家户户都用土制的“煤饼捣”在院子里，马路边用榔头敲击煤饼捣的手柄，将煤粉压实成形，然后晾干备用。这可是一项体力活，没有强壮的劳动力还真玩不转。不光要去排队用麻袋运回煤粉，还要用板车到很远的山脚下运来黄泥，这样搅拌在一起捌伤出来的煤饼才好烧，还省煤。一次干下了不能说是精疲力尽起码也是腰酸背痛。好在那时候住在大杂院，十几户人家很团结，大家相互帮忙，你晾晒的煤饼，因上班不能回来，下雨了邻居就会帮你收起来，现在一想起来总觉得心里热乎乎的。后来有人发明了用双手握在长长的手柄上，在搅拌的软和的煤泥堆上按下去，然后用手柄上的压杆一挤压煤饼就诞生了，省劲多了。那时候，只要好天气，捣煤机器不够用，借用的频率相当高。

记不得什么时候开始，煤气罐开始走进百姓家，煤气炉很快取代大多数的煤饼炉。清洁厨房在温州城里蔚然成风，随之，电磁炉，微波炉，烤炉，蒸锅等等现代化厨具纷纷走进千家万户。

煤气罐使用完后，需要自己想尽办法运到定点的煤气站去充灌，或者换已充足了的气罐，也十分地不方便与不安全。

前些年，温州很多地方改用管道天然



气，用户也越来越多，新楼盘不用说全部用天然气，连老城区又逐步更换为管道煤气了，方便至极。

从生活的一个小小侧面，我们亲身体会到生活的变化，亲眼看到社会的突飞猛进。



“温州市实验小学”的前世今生

陈芊芊

我的父亲是“温州市实验小学”的校长陈国光。

“温州市实验小学？我们查了，温州市实验小学没有叫陈国光的校长，是不是搞错了？”2014年正月初五，为逝世的父亲办理讣告刊登手续后的当天傍晚，我们接到了某报一位年轻编辑的来电。难怪这位年轻的编辑不清楚，又有多少人知道“温州市实验小学”的前世今生呢？

市区上了年纪的市民应该都还记得，“温州市实验小学”的校址，就是今天环城东路温州九中所在的地方。1963年，父亲陈国光受市教育局指派，担任“温州市实验小学”首任校长，这一任，就是八年。“温州市实验小学”那时可是省级重点小学，是当时省教育厅在杭州、宁波、温州创办的城市发展小学的示范基地之一，并由省教育厅拨款筹建（其中对温州市实验小学拨款18万元）。学校所有的教职员都是高配，如我父亲原在五马、松台、公园、巽山、近郊等辅导区担任过辅导校长兼党支部副书记；教导主任张世鹏，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是当时全市数一数二的；叶玉笙原是和平学区的区总务；杜鸣皋原是广化小学教导主任，调来担任少先队大队辅导员；教师也都是原来教高年段的调来教低段。我父亲还亲自从温州师范学校遴选了8名应届优秀毕业生（其中有后来出任副市长陈莲莲、担任瓦市小学校长17年的虞银良），组成一支精干的师资队伍。而

学生除一年级3个班自主招生外，二、三、四年级9个班均由市教育局从瓦市、新码道、墨池及公园路小学挑选优秀班级划拨而来。1963年秋季开学之际，由于校舍尚未完工，借用谢池巷一所停办学校（戏校）校舍一个学期，1964年初迁入新校舍。

开办伊始，学校积极探索一系列的教育、教学改革，以“人人有发展”为目标，坚持以“教学为中心”“课堂为主渠道”的教育理念，课堂教学则要求达到“精、准、活”，并开展校外定时定点的“少队之家”活动和举办课余各种形式的兴趣小组，尤其注重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和良好行为的养成。短短三年，形成了校风好、师风正、学风严的办学特色。说到“温州市实验小学”学生的素质，不得不提提良好的纪律，我父亲曾给我讲过两个事：一是全校师生900余人在礼堂开大会，我父亲在台上讲话，下面是一点声音也没有；二是有一次学校带学生参观一个展览会，当参观完毕出来时，一位接待员跟教师说：“来这儿参观的，数海军部队纪律最好，但你们学校学生纪律比海军部队纪律还要好！”学校要求学生集中排队要做到三个一：一、一分钟，即一分钟要把队伍整理好；二、一条线，把队伍整理得笔直像一条线；三、一声不响，即调整好队伍后没有一点声音。即便在今天的全市各个小学，能做到的恐怕也不多！

随着美誉度的提升，省内同行也陆续前来参观、交流、学习、听课。因此，温州市实验小学当时在全省范围内享有较高的知名度。

办学八年，学校共培养了一千多名毕业生，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了各行各业的骨干，如：陈怡、巫波伦、谢世平、黄河、亓宾、李世斌、柯小敏、何献敏、于伟、张新波、康剑（大校）、胡勇涛、蔡定芳、陆建光、吴涤清、潘猛补、阮方民及方敏等知名校友。真所谓“白鹿城根，华盖山麓，梧桐繁枝茂叶，凤凰展翅凌霄”！

可惜好景不长，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受到严重干扰，学校被认为是“培养修正主义苗圃”而受到批判，1971年被迫终结办学。听我父亲说，可能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当时中学校舍奇缺，

国家经济又暂时困难，其他小学校舍都较低矮，而本校校舍较适合中学办学，于是分流了学生、老师，将该校改办为温州市第九中学。不容置疑的是，“温州市实验小学”的业绩，已成为温州小教史浓墨重彩的一笔，更为后来的温州市实验小学办学模式打下基础。

我的父亲与已经分流的老师们痛惜“温州市实验小学”的停办。他曾嘱咐时已任职副市长的陈莲莲（原温州市实验小学教师兼大队辅导员），一定要恢复“温州市实验小学”的办学。陈副市长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努力为“温州市实验小学”的恢复办学提供了多方面支持和帮助。

2002年8月，当温州市实验小学重新创建时，陈副市长还组织原温州市实验小学的教师到新温州市实验小学参观。只说“创建”，不提“恢复办学”，当年全省三大示范性省重点小学之一的历史和辉煌中断了。“温州市实验小学”前世今生的融合第一次被耽搁了。

依稀时光荏苒，忽然白驹过隙。2013年，正值“温州市实验小学”五十华诞之际，“老师寄言犹在耳，母校桩基今安在？”出于对母校的热爱与对师友的怀念，“温州市实验小学”千余师生不约而同发起了“温州市实验小学”五十周年庆典之约！

2013年10月20日，一个激动人心的日子！一所小学，一所仅存在了八年、消亡了四十二年的小学，收到了来自国内外、各省市，自发前来庆祝的五百多名校友的问候！白鹿影城，座无虚席，“温州市实验小学”建校五十周年校庆《母校恋 师生情》盛大典礼在此隆重举行。时年88岁高龄的老父亲，登台发表讲话。他深情地说：“一所已经撤销了几十年的小学，在她建校五十周年之际，竟有这么多师生自发组织举行纪念活动，怎么不令人感动？说明大家对母校的热爱和留恋，原实验小学是我们大家共同的骄傲和精神家园！”特邀嘉宾、原温州市教育局局长李方华在讲话中说：“温州市教育局于2002年8月创建了新的温州市实验小学，是进一步发展改革创办实验小学的试点，也继承和吸收了过去实验小学的办学经验，在此基础上不断改革、不断创新和不断提高。为了薪火相传，文脉不断，因此，

建议将原温州市实验小学作为新温州市实验小学的前身和渊源，载入市教育志，使六十年代的小学教育改革的成果得以继承，发扬光大。”

2014年初，我的父亲以89岁的高龄与世长辞。2014年12月，《原温州市实验小学建校50周年纪念册》编撰完成。师生代表激动地将纪念册分送温州市有关部门并表达融合的要求。

2023年，是“温州市实验小学”建校六十周年的日子。如今，新温州市实验小学创办也已整二十周年。谨以此文记录一段的尘封过往以表纪念！

资料来源“鹿城档案地方志网”

上世纪 80 年代，温州兴起公关热

明 人



1987 年温州市首期公共关系讲习班结业合影

上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公关热悄悄在温州兴起。那时，青年社团正在我市蓬勃兴起，我正热衷穿梭于青年社团之间，充当一名“公关先生”之角色，也正因此，见证了“公关”这个概念从无到有，在温州大地上风行起来的全过程。

说起公关，不能不提温州公关运动第一人：郑一丰先生，是他第一个把公关这个概念引入温州，并身体力行，率先在青年社团中付之行动。郑先生是我刊授大学同学，原刊大温州辅导站站长。1986 年刊大创办浪潮文

学社时，他是文学社社长，我是《浪潮》编辑部副主编。1986年下半年，他与刊大同学陈柏龙组建温州市青年经济工作者联谊会，谷炳光、陈柏龙先后任会长，郑一丰出任公关部部长。组建社团寻常事，不新鲜，这公关部可是一个新鲜事儿，很多人从未听过名词。当郑一丰公开亮出公关部长的名片时，赢得众人瞩目，人们纷纷在打听，这公关部是干嘛的？尔后，很多青年社团跟风设立公关部，浪潮文学社公关部（简称PR）由诗人汪麟康担任，他为人热情，喜欢交际，文采出众，是最合适人选，成了与兄弟社团的沟通桥梁。外地青年考察团到市青经联取经，考察青年社团和公关工作。

如今，那一波公关热已整整过去36个年头，回首往事，现居香港的郑一丰说起当年的公关热，他有说不尽的话题。郑一丰回忆，他当时是从市面畅销的《南风窗》杂志上，第一次看到公关这名词。

那是1986年下半年，《南风窗》出了一期增刊，刊名叫“实用公共关系手册”，专门介绍了公关概念和来龙去脉、操作实务。他看了杂志后，敏锐地感觉，公关作为一种新兴的行业，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必将在大陆风行。作为年轻人，应该率先去学习和推广。于是，市青经联成立伊始，他就自告



《南风窗》杂志增刊封面

奋勇地挑起了公关部部长一职。在郑的推荐下，我从报摊上一下子买了10本《实用公共关系手册》，送给我认为值得赠送的新朋友。这期增刊的封面我记忆尤深：天蓝色封面上，一位公关小姐一身米黄色套装，得体大方，脸含微笑，如春风拂面，给人感觉很亲和。

外树形象，内求团结。是公关的宗旨，是每一个单位或企业的公关内涵。公关是国外引进的舶来品，功能如同国内的宣传、广告的职能。国外没有党政等宣传机构，他们的企业大多设有公关部，尤其是大酒店，公关部必

不可少。郑一丰挂帅公关部，他要做的就是为青经联与政府部门、企业之间建立起良好的公共关系。那时候，他跑这些外联单位时，不时地叫我们一起，我们称之为“跑公关”。市青经联在市文化宫南楼二楼长租了一会议室，用于定期举办经济沙龙活动，出版《经济沙龙》刊物，交流传递经济信息。还不时在文化宫西楼舞厅包场，举办舞会，增进会员间的友谊。当时“健力宝”饮料刚流行，参加舞会者每人赠送“健力宝”一罐。不久，市青经联联合团市委宣传部（邹跃新时任宣传部长、后任温州市人社局副局长）、温州日报“年轻人”栏目（吴伯正时任该栏目主编、现任温州日报报业集团总编辑），首次举办温州市公共关系讲习班，邀请原温州师范学院副教授王声多等思想前沿的专家学者，开讲公关课程。想不到讲习班受到年轻人的追捧，一下子就有191人报名学习。学员来自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几乎覆盖了全社会各领域，说明公关这个新鲜事物，受到这全社会的瞩目和关注。



公关班学员偕同青年社团成员到洞头,与海巡二大队官兵举行联谊活动。

这些经过公关洗礼的年轻人，后来大多成了改革开放的弄潮儿。如市青经联会长陈柏龙，当时是税务部门的一位基层干部，后来下海，引进新概念，创办了引领一时风尚的拉芳舍餐饮新业态。

我跑公关那时，有一本书我很喜欢，那就是五角钱一本的《人性的弱点》。这种小小的，薄薄的，小开本书，时称“五角丛书”，真的是五角钱一本。《人性的弱点》是美国卡耐基写的，是卡耐基思想之精华。人性的弱点是什么？就是喜欢听好话。所以，你要想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就是衷心地赞美别人，多看到别人的优点，发自内心地赞美ta，即便是批评，也要在赞美的基础上予以批评，这样对方才能够虚心接受。这书当时很流行，我先后两次买了20本，分别赠送新结识的公关朋友，分享交际秘籍。郑一丰也很喜欢这书，我俩是卡耐基理论的拥趸者，并把它理论付之于公关实践，效果很好，无往不胜。



公共关系讲习班开班前筹备会议合影



时隔35年后，公关群同学再相会

公关旋风，回旋于浙南大地，也引起全国同行的关注。1987年初，得到热心公关事业的鹿城区明星企业家金祥佐资助，郑一丰偕同赵向东、金旭峰、温州日报记者宋文光、温州科技报记者石建新，应邀参加在上海举办的全国首届公关峰会。在会上，郑一丰同与会的原中宣部副部长刘吉就公关话题做了深入交谈，相见甚欢。郑随后与上海公关协会深度合作，出任中外中小企业联合温州办事处主任，举办了温州市首届化工原料交易会等一系列合作项目。在一大批年轻的公关先行者和媒体宣传的推波助澜下，温州很多酒店设立了公关部，以应对外国开放之潮流。早在1988年，温州大学开设公关职业班，青年讲师周德文负责筹办公关职业班并任班主任

公关旋风，回旋于浙南大地，也引起全国同行的关注。1987年初，得到热心公关事业的鹿城区明星企业家金祥佐资助，郑一丰偕同赵向东、金旭峰、温州日报记者宋文光、温州科技报记者石建新，应邀参加在上海举办的全国首届公关峰会。在会上，郑一丰同与会的原中宣部副部长刘吉就公关话题做了深入交谈，相见甚欢。郑随后与上海公关协会深度合作，出任中外中小企业联合温州办事处主任，举办了温州市首届化工原料交易会等一系列合作项目。在一大批年轻的公关先行者和媒体宣传的推波助澜下，温州很多酒店设立了公关部，以应对外国开放之潮流。早在1988年，温州大学开设公关职业班，青年讲师周德文负责筹办公关职业班并任班主任

（这是温州历史上第一次系统、正规培养公关职业人才），邀请温州日报资深编辑记者杜宇、吴伯正等上课，讲授公关传播等课程。该班学员后来很多人成了温州市公关主力。时任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题写了“公关职业大有作为”，以资鼓励，《温州日报》头版发表。周德文师承著名学者、公关开拓者、时任中国科技大学应用化学系主任温元凯教授，兼任温州市公关研究所所长，从事公关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和实验。1988年，温大第一届学员徐亮，创办了温州第一家公关事务所；1988年底，赵向东（已故）创办第二家公关事务所——诚达公关事务所。公关所积极参与企业营销策划、公关形象推广，推荐产品评奖，以及面向社会的公关培训等。如今，公关已成为常设机构，政府很多部门和企业，内设公关策略和危机应对之机构和专职人员，国内外很多高等院校开设公共关系专业，及培养硕士、博士等高层次人才。

温州公关事例很多，选择能记得的几个例子。

1、灯光球场，个体户办生日派对

包建中是首期公关班学员，做五金生意，是温州第一代个体户。那年，他生日快到之前，有同学提议聚聚，给他过一个生日酒会。这时，不少提议说，我们学公关的，搞活动就要创意，我们的庆生活动要与众不同，要把生日活动当作一次拓展、建立人际关系的公关活动。这时，公关班班委会主任郑一丰建议，租用市区灯光球场（后改称体育俱乐部），那里场地大，公关班同学、亲朋好友均可参加，包场，可以跳舞，举办一次温州史无前例的个人生日派对。至于费用，不在话下，包建中有钱，为人慷慨。生日晚会那天，在球场内搭起一个简易台子，包建中从自己开的联谊五金店里拿来电线和五彩灯泡，给场地增添喜庆氛围。包建中还邀请浙江歌舞团两位正好在温的当红演员友情出演捧场，场内摆上几十张茶桌，奉上糕点饮料，几百位嘉宾几乎把内场坐得满满。来宾以公关班同学为主，一人带几人，还有朋友之朋友，亲戚之亲戚，同行之同行，凭票入场。这是公关课程里有讲到的公关策略，他们是活学活用。晚会由郑一丰和一位女同学主持。

包建中满脸春风，他说，感谢公关，感谢大家的伟大创意，感谢我们改革的时代。平时不善辞语的他，这会儿，滔滔不绝，一下子发表了长篇感言。晚会编排了丰富的演出和互动内容，完美地体现了公关特色。包建中记得，整个生日派对，花费了好几千元。当时温州房价是200多元一平米，相当于花去了半套房子。



灯光球场（后更名为体育俱乐部）卓世杰提供

2、公关实战，酒店公关日历牌

1989年，公关运动从理论的普及，进入了各行业的实践之中。那时，第一个引入公关概念的郑一丰，开始从事灯具生产，厂名先锋灯具，意寓灯具款式引领时尚之先。只是创业伊始，先上生产线，客户却全无，那时温州灯具产业兴起不久，尚无灯具市场，再加上那年的一场风波，导致了全国市场一片疲软，外地客人减少，灯具销不出去，也不知到哪儿寻找灯具客户。到报纸上做广告，费用大没这个实力姑且不论，也不一定有多大效果。郑一丰正在为此愁眉不展。他闲着没事，在翻阅《公关实务手册》时，突然一个标题映入眼帘：借船出海。对，你应该去试试“借船出海”！你不是说找不到客人？那就想办法让客人来找你。他想到外地客人来温，先必住宿。让客人住宿时就得知自己的先锋灯具，不就可招来客户？当时，温州市区的旅馆饭店，前厅大堂均无日历牌子，客人出门最关心的日历却

无处查找。你为何不制作一批日历牌，赠送给旅馆饭店，方便顾客，同时在日历牌下方打上先锋灯具和电话号码，外地客人来温，第一个就知道你的先锋灯具、这个灵感被捕捉到了后，他和伙计打定主意，当即行动。他们从电话本上收集了市区的旅馆数量后，马上到广场路定制了30来个有机塑料日历匾牌，分别赠送装订在旅馆总台后面的墙壁上，客人一办理住宿登记手续时，就可看到。这个广告公关牌各个旅馆饭店全覆盖，不给同行者跟风效法。当时市区主要也就30多家旅馆招待所，少有大酒店。牌子文字内容有：日历、星期栏是活动的，可每天换牌。下面一行文字是：先锋灯具日夜电话：29500。那时，温州电话还是5位号码。郑一丰记得，当年6月，他挂出的第一块牌子，是晏公殿巷的红旗旅馆。挂在总台的背景上，是他拿冲击钻一手安装。然后，在温州著名的望江路13层东瓯大酒店，他通过熟人介绍，在两扇电梯之间的墙壁上，装上大型日历牌包括天气预报、渡船时间。整个公关牌制作花钱不多，不用支付旅馆费用。这试探性的公关策略，效果却是出奇的好，日历牌挂出当天，就接到了好几个客户电话，要上门看货，然后客人络绎不绝。一位营销大师曾说到，没有绝望的市场，只有绝望的人。“先锋灯具”走出了死胡同，迎来了一个别人想不到的艳阳天。

3、“联友”举办“鹿城小姐”大赛

1988年5月18日，温州出现第一家公关事务所：联友公共关系事务所。公关所创办者徐亮现是温州市政协常委、温州市收藏家协会会长。他创办的公关事务所，是温州唯一一所公关事务所，如今仍在运营。说起当年的选美大赛，徐亮娓娓道来，讲述了公关人的一桩桩悠悠往事。

当徐亮步上社会时，面对众多的职业选择，他看中了刚刚兴起的公关行业。他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成立温州第一家公关事务所，拓展公关这个全新的行业。公关所位于市区花柳塘23号，是他家临街的房子，三间平房，改装成公司后，挂出“联友公关”很大的牌子，引得路人频频注目。联友搞出全社会轰动的公关事件，是在1992下半年。联友借鉴“青岛十

“十大礼仪小姐”经验，要整一场“鹿城小姐”评选大赛，民间称为选美大赛。当时，南巡讲话发表之后，中国社会掀起一股改革开放热潮。“鹿城小姐”评选得到政府支持，温州市人民政府秘书长陈桂莲担任组委会主任。大赛评选拉开序幕后，报名女性众多，社会反响强烈，有叫好评赞的，也有认为选美过于刺眼。徐亮认为，选美大赛，有利于展示鹿城形象，打响温州品牌。选美大赛由370人报名，年龄限于18-28岁。先是在街北台胞大舞台初赛，经初赛淘汰后，前50名选手进入复赛，增加泳装表演，注重个人专长表演，在公园路东南剧院进行复赛，最终评选出“鹿城小姐”。大赛引起媒体关注，本地媒体不说，省城媒体派记者前来报道，产生全国影响。首期胜出的“鹿城小姐”“联友小姐”和“十大礼仪小姐”，很多被广告公司、三资企业青睐，聘为企业和产品代言人；有的嫁入豪门，从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次年，联友筹备“温州小姐”评选时，因政策关系，组委会决定暂停“温州小姐”评选。因此，“鹿城小姐”成了温州历史上唯一的一次选美活动。



“鹿城小姐”评选设金奖、银奖，分别命名为“鹿城小姐”、“联友小姐”和“十大礼仪小姐”。

4、诚达：公关小姐征战沈阳

温州市诚达公关事务所，是由时任青经联副会长兼秘书长的赵向东创办的。赵向东是我刊大同学，他与郑一丰一样，系最早投入公关策划的弄潮儿之一。时任诚达公关所副总的徐炳松记得，30多年前，他们组织的公关小姐征战沈阳，轰动沈城，一炮打响。1989年5月，在沈阳举行的全国

鞋帽交易会，诚达公关应温州三家旅游鞋民企邀请，为其做公关策划服务。事务所在怎样扩大企业影响、招来更多客户、取得最大订货量做了全面细致的公关策划。其中最独具特色的点子是组建一支规模庞大的公关小姐队伍，远赴东北，征战沈阳。为了挑选最好的公关小姐，事务所专门登报招聘，从报名的三百多人中择优录用了35名有颜值、有素质、有才艺、综合能力强的人员。经过专业的礼仪、公关等知识培训，温州史上第一支训练有素、业务扎实的公关小姐队伍就此诞生。然后把她们一分为三，由徐炳松、王顺弟、王丹军分别带队为三家民企征战沈阳交易会。公关小姐一袭空姐装扮，穿梭在交易会的各种场所，她们就像一道美丽的风景，所到之处惊艳不断，吸引无数眼球。三支队伍时而整体作战，时而各自为战，她们不但让温州民企在此次交易会上的形象大放异彩，更为三家温州企业取得出色业绩做出很大的贡献。



公关小姐出征沈阳，为温州旅游鞋厂等三家鞋企代言，做形象宣传。

5、联谊卡，公关实战新平台

1995年，原温州经济生活报总编胡少华发起，偕同郑一丰等人，成立温州市民营经济促进会，下设厂长经理俱乐部。郑一丰提议，以俱乐部名义，创办发行一张联谊卡。这联谊卡，如同现在大家熟悉的携程卡。这在当时的温州商界，属于首创、创新之举。他们发挥前期做公关建立起来良

好的人际关系，汇集了林其勉影楼、原野鲜花店、东瓯洗染店、酒店等上百家消费场所，成为联谊卡会员单位，联谊卡印制精美会员册子，持卡者在这些店铺消费，可享受折扣优惠。每家会员单位收银台前放置联谊卡匾牌。联谊卡发行后，没卖，以会员推广为主，5000份很快告罄，一卡难求，不少青年人以持有联谊卡为荣耀和自豪。联谊卡运作费用全由郑一丰的“日宝来福”赞助。郑一丰回首往事，唏嘘不已。他说，遗憾得很，这联谊卡当时没能坚持下来，要不然如今也有可能做成一个很大的赢利平台，一个可人人分享的很大蛋糕。

我在热衷于公关活动时，充当报社的通讯员，积极撰写公关方面的稿件，为公关运动鼓与呼。早在1986年，我写了篇“乐趣尽在酬酢间”，表达了自己参与社交活动的乐趣和心得，发表在当时刚创办的《鹿城晚报》上。应该是“公关”一词最早出现的温州媒体。



1991年，温州侨乡报刊刊发拙作《温州兴起企业公关广告》。

《鹿城晚报》后昙花一现，这

篇小文也成了历史见证。1987年10月，我采写的“一个个青年社团在悄然兴起”，反映了80年代后期社会团体的活跃，公关运动蓬勃于社会。这个报道在温州日报“年轻人”专栏头条刊登，在年轻读者中引起很大反响。在为温州侨乡报撰写的“公关新闻”时，我采访了当时在瓯昌饭店任公关部经理的王丹军先生。瓯昌饭店是温州早期由外资投资的涉外饭店，王丹军原是温州大学青年教师，在改革开放潮中下海，出任瓯昌饭店公关部经理。他跟我交流探讨了公关事业的大趋势，即有理论高度，又有实战体会，可谓为方兴未艾的公关运动做了阶段性总结。文章见报后，编辑部收到很多读者来信，表达了对这新鲜事物的赞赏和肯定。

东瓯山水发清辉

方长山

靖康二年（1127）北宋灭亡，同年五月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在南京（河南商丘）即皇帝位，改元建炎。高宗上位伊始，就面临着战和逃的抉择，尽管口头上支持李纲、宗泽等主战派的抗金建议，但是柔软的性格使之偏向于黄潜善、汪伯彦等主和派的建议，积极筹划南逃。前太学生陈东、平民欧阳澈上书抗金，被以“鼓动闹事”“诋毁大臣”的罪名处死。同时高宗遣使求和，但是金国决意灭宋，针对高宗“逃到哪里追到哪里”。年底十一月，高宗只好乘船南逃扬州。

金军在南下之路，受到持续的抵抗，消耗了一年左右光景。建炎三年（1129）二月初二，金军攻陷天长军（安徽天长县）。高宗闻讯，甚至来不及告知他人就自个狂奔南逃，短短十一天，从扬州渡江至镇江，经吕城（今属江苏丹阳）、常州、平江（今苏州）、吴江、秀州（嘉兴）、崇德，十三日抵达杭州。再次遣使哀请求降，愿去皇帝尊号，但被金国拒绝，加上扈从统制苗傅、威州刺史刘正彦兵变，^①四月份高宗再次离杭，经常州、镇江，至江宁府（升为建康府）。九月谍报金国由海道南下江浙，高宗再逃，从建康经平江府，再次哀请求和被拒。十一月抵达临安（杭州），渡浙江到越州（绍兴）、钱清镇、越州、明州（宁波），乘船到定海（今镇海），抵昌国县（今定海县）。建炎四年（1130）正月二十日抵达温州，停泊瓯江口青澳门（今

属洞头)，次日停靠温州港口，二十三日泊乐清馆头，接着移泊瓯江南岸。

二十六日，宋高宗上岸暂驻乐湾（今属龙湾金岙）水陆院，这时才稍微喘口气。传说夜宿寺内，受扰蛙鸣，土地公公系绳蛙颈不叫，现今寺内外还常能发现不会鸣叫的“白颈蛙”。^②传说固不可信，倒也符合宋高宗一行风声鹤唳的紧张心情。赵构为康王时被遣赴金国当人质，金国误作普通人而遣还，不久得知为真康王，就急忙派兵追到黄河边，却已不见人影了。民间传说泥马渡康王，大意鼓吹高宗的皇帝神迹，但是也可见赵构早年真是吃够了逃亡之苦。

高宗居留瓯江口期间，侍从、官僚陆续汇集，处理国事，发布诏令。廿八日下诏：“听说一些士大夫南下福建避难，所到关隘被当地人以搜检名义，扣押行李，甚至起争执闹出人命，只好回到温、台，但是被拒绝入城，老幼流离，进退无所。可饬告各州长官约束关卡人员，如辨验身份来历分明的，不得阻拦。”二月一日下诏：“沿途巡幸之中，由御营使司^③严格察看，官员、将兵、差役，强占民间屋舍，掠夺商旅船只，买东西不付钱以及各种骚扰民间的事项；若有草拟文书拘捕犯人打官司，未经三省、枢密院下达行文，州县不得擅自答复，亦不得擅自处置；三省六曹^④不得批白条子勾唤差役，必须经过官长签字盖章才能施行。如有违例，官员停职，差役处分，而且出榜告示。

初二，御舟停驻温州江心寺。枢密院亟需台谏^⑤人材，御史中丞赵鼎推荐了当地人吴表臣和林季仲。因对答得体，皇帝任命吴表臣为监察御史、林季仲为御史台长官。温州名士薛弼拜见宰相吕颐浩，认为岛屿萧条，建议皇帝上岸移居郡官署，同时拍卖官产缓解中央财政困难。永嘉知县霍蠡上言，核算温州下辖四县绝户^⑥以及各种抵押没收的田产，估价之后交付市场竞价拍卖。高宗采纳了。原尚书右丞许景衡，因为支持宗泽留守东京，奏请高宗建都建康，数次得罪权臣黄潜善，被构陷罢职而死。遗孀胡氏租借的官屋十五间，也在本次回收拍卖之列。参知政事王綯说：“景衡生前正直孤忠，不依附谁，被他人围攻免职。现在人去世了，他的话才应验了。”高宗听了，

不免伤感，诏赐官屋给许家。

二月十七日，高宗从江心寺移蹕温州城，三月十八日北上越州。绍兴二年（1132）正月迁到临安，六年后定都于此。

宋高宗驻蹕温州 54 天，颇有本地学者梳理介绍，所述内容大体相同，而以胡珠生为详。^⑦胡从地方的视野评估高宗驻蹕温州的影响：温州行政地位上升为“次辅郡”；大批温州人才参与国政；大批王室、外戚和文武官员此后定居温州，形成南宋温州第一次移民高潮，带来温州的经济文化发展。宋高宗驻足江心屿期间，亲笔题写榜书“清辉”“浴光”。正如胡先生指出，江心寺不仅一跃成为佛教名刹，而且具有祖国复兴根据地的特殊意义，如王十朋赋诗句云“北斗城池增王气，东瓯山水发清辉”，赞叹宋高宗御驾江心屿给温州带来的荣耀。

从王朝视野来看，南宋建政之初，作为刚刚组建的权力系统，运作尚未通畅，马上就要不断地整体搬迁，整个体系随时可能由于信息失联而瓦解，实在是一件风险很大的事情。正史记载高宗慷慨镇定，能够挽弓一石五斗，但是后人认为，赵构的性格特征好清静无事和因循守旧，行动畏缩退让，以隐忍求和为主，加上政权腐朽，军政涣散，武将地位壮大，社会矛盾突出，统治力量分散，担心钦宗回归等等主客观原因，促成高宗长期对金退避妥协的政策表现。^⑧

虽然绍兴元年之后金国对宋战事大多失利，以及绍兴五年金熙宗改变了强硬策略，但是从南逃到定都临安，南宋统治机构经历了巨大的颠簸，高宗只能在逃亡间隙里维持时断时续地处理政务，如上发布的诏令可见北方官僚机构和人口仓促南迁，南方也没有做充分的应急预案；因为逃亡导致官僚系统运作不稳定等等现象。

高宗驻蹕温州期间，祖先牌位和肖像、后宫女眷也暂寄于温州。绍兴四年（1184）后宫女眷从海路迁到泉州，绍兴五年奉送太庙神主于温州，绍兴十三年（1143）累朝神御从温州迁出，可知温州作为临时战略后方的意义。

注 释:

- ①参考:陈振《宋史》,列入“中国断代史系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425-435.
- ②福圣寺原名水陆寺,民间俗称“龙口寺”,坐落于瑶溪街道原金岙村(寺山头)黄石山西麓,坐东朝西,始建于宋开宝三年(970)。
- ③御营使司,官署名。南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置,总领军政。
- ④三省指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六部指尚书省下属的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
- ⑤台谏,台官与谏官合称。台官掌纠弹,谏官掌规谏。
- ⑥宋代以无子女人口(绝户)的遗产收归国有。
- ⑦参见:张镇中《温州地方史稿》,见《鹿城文史资料》第七辑(内部资料),1993年,117-120页;徐定水《宋高宗赵构驻蹕温州》,见潘善庚主编《历史人物与温州》,1998年,72-74页;胡珠生《温州古代史》,中国文史出版社,2020年,262-267页。
- ⑧李克武. 败求和,胜亦求和——宋高宗屈膝求和心理分析[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2, (1): 66-70, 83. 任仲书. 试论南宋初年高宗对金退避妥协的原因[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 (2): 89-92. 邱少平. 宋高宗对金屈辱求和动机探析[J]. 益阳师专学报, 1991, (1): 102-106.

王十朋曾在江心备考

王超俊

今年高考人数再创新高，6.09 万名温州考生迎来人生又一场大考。在古代，科举考试的竞争激烈程度不亚于当下高考，甚至更难。乐清人王十朋足足考了 17 年，六赴太学，终于金榜题名，成为南宋温州第一位文状元。

四面是江河，不闻喧嚣；身处伽蓝地，灵台清明。据说王十朋曾在江心屿备考过一段时间，岛上有他读过书的遗迹，民间还流传着他在江心屿的故事。王十朋为什么要选择在江心屿备考？他在江心屿哪一处住所读书？现一起来聊聊王十朋与江心的状元往事。

王十朋（1112—1171），出生在乐清四都梅溪。他的父亲王辅（字安民），尊崇儒学，常在闲暇时读书吟诗，作诗唱和，自得悠闲。王十朋小时候受到熏陶，两三岁开始背诵唐诗。到了五六岁时，便能日诵数千言，乡人皆以为奇。

王辅见儿子聪明伶俐，便送他到乡塾蒙馆读书，王辅还经常给儿子讲述历代名臣和乡贤的故事。受到良好教育的王十朋，少年立志，奋发读书。15 岁会作诗文，在雁荡龙湫寺院读书时已名扬四方。

靖康二年（1127），金人攻陷汴京，携徽钦二帝北去，十五岁的王十朋，即写下了《伤时感怀》诗两首，表达自己的愤慨之情。其第二首云：

帝乡五载乱离中，亿万苍生陷犬戎。
二圣远征沙漠北，六龙遥渡浙江东。
斩奸盍请朱云剑，射虏宜弯李广弓。
借问秦廷谁恸哭，草茅无路献孤忠。

建炎四年（1130），宋高宗因金人进逼南渡到温州江心屿；三月中旬，高宗北返经绍兴转临安京都。正在鹿城的王十朋，循着明庆寺宗觉法师原韵，赋了七律《驾幸温州次僧宗觉韵》，时年，王十朋 19 岁。

圣主南巡驻六飞，邦人咫尺见天威。
间关高帝尚鞍马，谨厚汉光犹絳衣。
北斗城池增王气，东瓯山水发清辉。
伫看天仗还京阙，无复旄头慧紫微。

然而，满腹文材的王十朋，在科举路上走得并不轻松。

绍兴十年（1140），王十朋赴试落第，这次落榜对他的打击很大，他在《述怀》一诗中写道：

吾年三十百无堪，世事如麻总未谙。
杨子家贫那嗜酒，卢仝丁白更添男。
回头场屋心几折，混迹泥涂分固甘。
赖有东皋遗业在，剩栽桑柘教妻蚕。

绍兴二十七年（1157），屡试屡挫但又坚韧不拔的王十朋，终于在 46 岁那年金榜题名。十七年间六赴太学，其中之磨砺与艰辛，非常人所知。

王十朋为什么从乐清来到江心屿读书？“离尘不离世”的江心屿自然是读书人向往的净土，除此之外，还可能因为王十朋是个“关系户”。

王十朋的舅公严阁梨是乐清明庆寺著名诗僧，天台宗大师，早年还与苏东坡诗词交往甚密。叔父宝印也是明庆寺大师，为严阁梨的学生，也许正是他推荐王十朋到江心寺攻经读史。

和叔父宝印同在明庆寺的高僧宗觉禅师，戒律甚严，尤善诗文，著有《萧峰集》，曾名响一方。或许是因为叔父的关系，王十朋与宗觉禅师相识，二人一释一儒，属忘年之交。1130年，王十朋循着宗觉禅师原韵赋《驾幸温州次僧宗觉韵》。他还曾有一诗《寄僧觉无象》，道尽了师徒之情。

论诗出古律，有唱无不酬。
篇章溢缣素，锦绣烂然浮。
此老岂易得，当于前辈求。
吾生恨太晚，见师已白头。
儒释道不同，相从苦无由。

南宋绍兴七年（1137），清了禅师奉诏住持孤屿上的龙翔兴庆禅寺（即今江心寺），后于绍兴十五年（1145）离开温州前往杭州住持径山寺。清了禅师在江心屿就任整整八年，很可能与在岛上攻读经书的王十朋相识。

江心寺山门的云朝圣联，据说便出自王十朋之手。他利用汉字一字多音多义的特点，写下了这副意境深远、含义深刻的千古奇联：

云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散，
潮长长长长长长长消。

王十朋在江心屿借了一方栖身之地，在幽静之处潜心钻研经史，那么具体地址到底在哪儿呢？

陈舜咨编纂的《孤屿志》中，收录了清代温州分巡陈圣治撰写的《孤屿明大宗伯瑞屏顾公祠记》，该文提到：“东瓯为王梅溪先生故里，其书

屋旧址在孤屿江心寺之右，游览者必造。”说明陈圣治在任期间（1653—1656）王十朋读书处旧址可能尚存。

陈圣治只说书屋旧址在江心寺之右，那么古人的“右”，到底指的是“东边”还是“西边”呢？《孤屿志》中记录了一些与建筑“左右”方向相关的内容。

明代王恩任所作《游孤屿记》记录了江心寺与文天祥祠、卓公祠的左右位置关系：“（江心寺）之左为文丞相祠……（江心寺）右为卓侍郎祠……。”

明代王光蕴所作的《孤屿赋》中也记录了卓公祠与江心寺的左右位置关系：“于沙门之右构卓公祠”。

卓公祠始建于明代，一直坐落于江心屿西侧。古人频频于文中指出卓祠位于“寺右”，或许说明古人在描述孤屿建筑时，习惯将自己代入面朝瓯江南岸的方向，因此孤屿之右，可能就是指孤屿之西。照此，王十朋在江心屿的书屋旧址就可能在江心屿西侧。

近代高僧木鱼法师所著《孤屿明灯录》研究说“状元王梅溪（十朋）未仕时，正在净信讲寺攻经读史，与清了禅师为方外交。（当时全愚堂东轩，即是王梅溪读书处）。”木鱼法师又在《通榛大师传》说，“通榛大师，字茂霞，别号全愚……自建全愚堂于兴庆寺，作为退隐静修之所”。

陈圣治分巡在温州任职时间为1653—1656年，而通榛建全愚堂在1796年，二者相距近140年，陈圣治虽未表述王十朋读书处的具体位置，但很有可能是后来通榛建全愚堂的位置，因为全愚堂正巧位于江心屿西侧。

据传，王十朋还经常在东塔院江边读书。他在东塔院下常年读书的地



对联上的楷书字体，为书法篆刻名家方介堪墨宝



江心寺 蔡榆摄

方，被后人称为读书台。

温州各处都有关于王十朋的民间故事，江心屿上更曾有读书屋、读书台之类的“景区打卡点”，供游人赏玩。可见这位“南宋无双士，东都第一臣”在温州人心中始终占有独特的地位。

端午前后，有“子鲚”洄游至江心屿附近瓯江水域产卵，这种鱼学名凤鲚，因尾部分叉、形如凤凰尾羽，又称“凤尾鱼”。江心屿凤尾鱼与王十朋之间也有美丽的传说。

王十朋在江心屿读书时，他的勤奋好学感动了东海龙王，特地把东海里的凤尾鱼送到了江心寺前的瓯江水域，为备考的王十朋补补身子。清代温州司马郭钟岳曾评价说，“江心屿处鱼味最佳，他处都不及。”

据传，王十朋在江边吟诗作赋时，引来荧光闪烁、成群结队的凤尾鱼停留聆听，它们一动不动，像是听痴了。王十朋见之稀奇，拿出剪刀，捞起一条鱼剪它的尾巴，可鱼儿过于迷醉诗声，被剪开了尾巴也全然不觉。

唐代贺知章有“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的诗句，而在江心屿的传说中，凤尾鱼之尾由王才子裁出。

王十朋高中状元6年后，也曾在江心屿读书的木待问状元及第，这片小岛成了读书人心中的福地，寄托了无数赶考士子的美好梦想。

参考文献：

《王十朋故事与传说》 林霞主编

《王梅溪诗文及年谱》 吴鹭山编著

《王十朋传》 王雪丽 王祝光著

《孤屿明灯录》 释木鱼著

《温州状元》 温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江心志》 清·释元奇編集

《江心诗词选》 陈瑞赞 金丹霞 洪之渊编著

“南亭”引发的旧事

郑小良

在今市区第一桥与解放南路交叉口，谢池巷的斜对面新建一亭，名曰“南亭”，97岁林曦明先生题写亭名。亭的西侧新砌“瑞安门”城墙，亭的南两柱由张索题宋杨蟠句：水如棋局分街陌，山似屏帟绕画楼。北两柱由张森题夏承焘联：若能杯水如名淡，应信村茶比酒香。横额为：双桂联芳。

南亭——历史与现实的交汇

万历《温州府志》卷之三载：“南亭，在城南。”谢灵运曾到此一游并赋诗《游南亭》：

时竟夕澄霁，云归日西驰。
密林含余清，远峰隐半规。
久痾昏垫苦，旅馆眺郊歧。
泽兰渐被径，芙蓉始发迟。
未厌青春好，已睹朱明移。
戚戚感物叹，星星白发垂。

乐饵情所止，衰疾忽在斯。
逝将候秋水，息景堰旧崖。
我志谁与亮？赏心惟良知。

景平元年（423）夏天，诗人感景物变换，忧思催老，决计待秋水到来时乘舟归隐。游经“南亭”时触景生情，于是写了这首诗。

清代的时候南亭遗迹尚在。清朝朱彝尊有《南亭》诗：

薄云雨初霁，返照南亭夕。
如逢秋水生，我亦西归客。

《太平寰宇记》卷九九：“南亭去州一里。”现选址地，为古城南市所在，南北大街的南大街，旧时还有南门（瑞安门）。

据说在北宋绍圣年间，温州纱帽河、柴桥巷一带住有王氏公辅、公彦两兄弟，兄弟俩聪明好学，双双进士登科，古人称登科为“折桂”，于是当时的知州在巷口立名“双桂坊”。清时改为纱帽河，因巷内有一条小河，中间方正宽阔，两端狭长，状似古时乌纱帽而得名。解放后河填无踪，而巷名一直沿用。文革时，因大众电影院后门在此，故一度更名为大众巷。1982年恢复原名。柴桥巷，清时名“寨桥头”，民国时谐音改称“柴桥头”，解放后填河拆桥更名“柴桥巷”。这一带并属双桂坊。

北宋年间，温州瑞安门（大南门）附近住有戴述、戴迅两兄弟，因孝敬上辈，兄弟和睦而闻名。温州知州杨蟠在此定坊名时，便称其为“孝睦坊”。孝睦坊位于今天的大南门附近，由于老城水网密布，出入孝睦坊时要通过一座桥，此桥位于古瑞安门内，是从城外进入城内经过的第一座桥，故被称作第一桥。到明代，“第一桥”已被叫响，孝睦坊渐渐被人遗忘，于是政府做了个顺水人情，把孝睦坊改成第一桥。上世纪六十年代，第一桥曾称“团结巷”。宋元时期，温州漆器号称全国第一，第一桥就有知名作坊。2005年信河街周宅祠巷工地出土南宋六花瓣式平底漆碟、七花

瓣式朱漆碟等二十余件漆器，铭文上记“辛未温州第一桥金家上牢”等。第一桥还设有钱业公所、纸业公所等。1923年，怡大棉布号经理曹桂生邀集叶孟平、翁来科等人合伙在第一桥下林祠堂创办鹿城布厂，后改为鹿城棉织厂股份有限公司，后迁至蛟翔巷。1939年改为富华染织股份有限公司，王纯侯任经理，股东有翁来科、金三益绸布号和国货公司等，是当时温州棉织业规模最大的一家。1951年成为浙江省内首家公私合营的企业。1957年改为国营温州棉织一厂。

谢池巷——不寻常的巷

张又新《谢池》诗云：

郡郭东南积谷山，谢公曾是此跻攀。
今来惟有灵池月，犹是婵娟一水间。

清光绪《永嘉县志》记载：“谢康乐守郡，爱永嘉有东山之胜，且山水优美于会稽，乃创第凿池于积谷山下。”此池便为“谢池”，也叫灵池。谢公及后人曾在此居住过，所以谢池所在地称作“谢村”。北宋温州知州杨蟠规划三十六坊，将这里改为“谢池坊”。元代曾改为“亲民坊”，明代改为“云衢坊”，清代改为“谢池巷”延用至今。相传谢村红叶四时不谢，又有“四季红叶村”的美名。唐代诗人司空图《寄崔道融旅寓永嘉》诗中，曾有“碧云萧诗雾，红叶谢村秋”之句，描写的就是谢村景致。北宋大观三年（1109），被称为“元丰九先生”之一的周行己，因曾师事程颐而遭新党参劾，罢职回温，在谢池坊古宅创建“浮沚书院”，传习洛关（程颐、张载）之学，“邦人方知有伊洛之学（程颢、程颐）”。使洛学在温州盛行，奠定了永嘉学派的基础。清道光五年，时任湖南粮储道的张瑞溥（字百泉、举人）辞官还乡，在谢池旧址购买十多亩地营造“如园”，临池建楼三间，

承袭“池上楼”原名，以纪念谢灵运。如园又称“张宅花园”，北起府学巷，南至谢池巷，东与中山公园一墙之隔，西边包括现温医附一院（儿童医院）急诊楼。内建怀谢亭、春草轩、鹤舫、十二梅花书屋、飞霞山馆等建筑群。园内尽栽梅、兰、松菊、蕉、竹。站在池上楼，临窗而望，山光水色，赏心悦目。对面积谷山的“小赤壁”和月担桥，连同墙外树木苍隋、泉涌池绿，菡萏含苞；园内楼台亭阁，假山奇石，回廊曲榭，石径通幽，无不令人称奇，仿佛把苏州园林的隽秀、精巧移植至此。晚清封疆大吏、有中国楹联学开山祖之称的梁章钜笔下的“楼阁俯城隅，一角永嘉好；风流思太守，千秋康乐旧池塘。”正是如园的真实写照。周宅大屋，与如园一墙之隔的周宅花园，俗称周宅大屋，由清嘉庆年间（1796-1820）周雨生购屋并进行扩建，周宅南北有河，正门为谢池巷，后门是府学巷，纵深五进，后门对面是周宅宗祠（后为明德小学、府学巷小学，今为城南小学分校）。整座周宅大屋占地17亩多，内有厅堂正屋、厢房、边间、谷仓、供销柴间，有大小中堂36个、道坦（天井）72个，设友花吟馆、种莲池馆、小浮沚廊。园中有假山、水池、廊榭、花墙，种有桃、竹、梅、柳，四季如春，花樽、花盆无数，楠木、红木制的太师椅、八仙桌，太湖石的石墩多座放置园中。大屋为青砖门庭，门台上书“大夫第”横匾，大堂悬挂“周景善堂”巨匾，另有贴金匾额“竹孝松贞”，在当时甚至今日堪称浙江最高、大、上整体民宅。清温州府同知郭锺岳有《过周氏涉园看菊》一诗，描述涉园当时的盛景：“信步东山下，徘徊到涉园。闲庭问松菊，浮涉浸窗轩。秋色心清赏，寒香目笑存。远来谢车马，莫使俗气喧。”周家出有名流，如赴日留学、曾参加同盟会的周孟由，我国银行界元老周守良等。周宅后来成为矾矿驻温办事处、温化职工宿舍等。

城下寮庆福寺坐落在积谷山下（现中山公园内），大南门东城，坐西朝东，紧靠城墙，山门前一湾护城河，环境优美，闹中取静，有城市“山林之称”的庆福寺创建于清嘉靖和道光年间。寂山和尚住持时，与吴璧华、刘景晨、杨雨农、周群铮等地方士绅、社会名流交往甚多。周群铮的大哥

周孟由，与同在日本求学的李叔同（弘一法师）因志趣相投，成了莫逆之交。弘一法师早已慕名温州山水清秀，气候宜人，曾多次在庆福寺住过（离周家近，便于照顾），并拜寂山和尚为师。弘一法师留居温州长达十二年之久，占据了他24年修行生涯的一半。庆福寺成了他的第二“常住”，温州成了他的第二“故乡”。因此，庆福寺香火鼎盛。据老人回忆，谢池巷颇具江南民居特色——小桥、流水、人家。20世纪50年代以前，巷中间有一条小河穿过，河上架有几座石桥，其中有名的有“永宁桥”、“寿女桥”，两岸民居错落有致、鸡犬之声相闻。相隔二三十米有小埠头，既可以停靠小船，又可以供居民洗涤。河畔植



巷子 蔡榆摄

树成荫，河中清水荡漾，可见小鱼浮弋，常见有人垂钓。每逢盛夏，小河成了青少年戏水、游泳的场所。这条小河与城内纵横交错的小河相通，河水经茶院寺连接塘河，直达瑞安、瞿溪等地。近代以来，谢池巷走出了众多的名人。被誉为“一代词宗”的夏承焘，就出生在谢池巷一个普通布商家庭。上世纪三十年代，他搬住谢池巷原东山书院旁，以“谢邻”自号。其得意弟子琦君曾寄居此处。谢池巷168弄18号曾经是1919年由黄溯初、潘鉴宗、吴璧华等人创办瓯海医院（附一医老院）的教工宿舍，居住过杨玉生、林镜开、缪天荣等名医。

妙果寺千佛塔

张 晓

1951年3月7日，妙果寺千佛塔被拆毁！

时光荏苒，转眼已经整整七十一年了！

往事并不如烟，千佛塔至今令许多温州人魂牵梦萦，那是一座美轮美奂的古石塔——高十三层，塔身各面雕刻数目不等的佛像，石塔外形高细，远眺层次分明，高雅玲珑，而且是浙南唯一一座舍利塔。

千佛塔内供奉的是继忠大师的舍利，继忠大师与猪头钟的传说有关——宋神宗元丰年间，值继忠大师住持妙果寺。某日薄暮，有客僧来寺挂单，其貌若愚，而出言必符宗乘……让我们拨开历史的烟云，去探访一下这座千年古塔吧！

据史料记载，北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十一月，继忠大师住持妙果寺。在他手上，建成这座千佛石塔，谢师护、丁仁政及郭户弟子等人，为父母舍多宝佛、释迦佛于塔内供奉。将多宝佛与释迦佛一并供入塔中，其意代表诸佛为成就度化众生之大事而示现世间。这就是“千佛塔”之名的来历。

继忠大师，字法臣，为永嘉丘氏子，相传是螺溪义寂（字常照，姓胡氏，温州永嘉人）转世，北宋天台宗著名僧人，东南高僧。他八岁入开元寺，后赴四明延庆寺随广智（天台宗著名僧人）学法，曾住持温州地区多家寺院，如开元、妙果、惠安（也作慧安，又名净社）、江心及西湖法明寺（也

叫水心寺或水心院)。永嘉学派集大成者叶适曾在《题西湖法明寺疏》(又名《法明寺教藏》序)中提到过继忠大师:“寺昔讲师继忠居之。忠有行业,愿力强,果矢言以致道,故虽焚荡草莽,百年间冠盖常走一郡……”

北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调任杭州郡牧,时遇大旱,范公命僧人至吴山庙祈雨,众人推举继忠大师,继忠大师以忠孝仁义责难神灵旷职,雨随济。

继忠大师生前与知非子、铁面御史赵抃曾有来往。北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继忠大师曾请赵抃为知礼(天台宗著名僧人)撰写碑铭。赵抃也为千佛塔作《新建舍利塔铭》:

修身治心,得佛之深,清淨慈智,
乃佛之事。相好颀颀,金碧穹穹,虽曰
外饰,俾人内恭。斯庙有塔,是瞻是崇,
完坚勿隳,永为无穷。嘉祐二祀,素秋
之季,建成江氏,铭为之识。

继忠大师生前曾整理诸多天台祖师文献,有《扶宗集》五十卷、《观心二百问》《四明仁岳异说丛书》等,集山家山外二系辩论之文,且能做到二派兼顾,实属难得,他的著述流传至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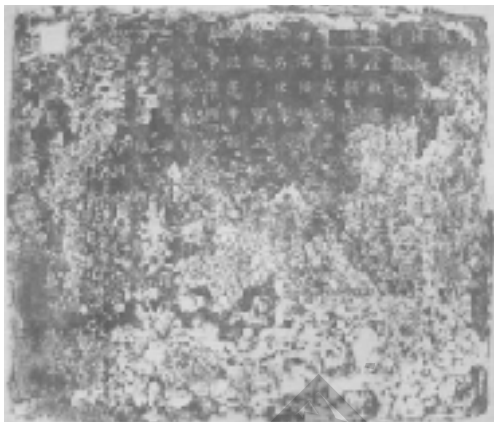
因著有《扶宗集》,继忠大师史称“扶宗论主”。忠字下一字泐,当为“法”字,忠法师即继忠。

北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继忠大师圆寂,葬于温州城外西峰瑞鹿山(据说在今瑞安高楼镇境内),他的舍利就供奉于千佛塔内。

北宋元祐戊辰年(1088),僧人洞真到妙果寺。因千佛塔年深日久,多有损坏。大观庚寅年(1110),比丘清惠将千佛塔累基筑级移建(由西移南),并于政和元年(1111)季春(农历三月)完工。同年九月,洞真刻《妙果院造塔题记》(妙果院即妙果寺,刻石现存温州博物馆),记述

了这件史事。

清惠移建千佛塔时，曾留下《比丘清惠发愿重修妙果院千佛塔刻石》（现存于温州博物馆），该碑刻是北宋时期所立碑刻，原封存于千佛塔内。碑文这样写道：稽首十方常住佛，圆满了义修多罗，三乘一切贤圣僧，惟愿慈悲赐明证，比丘清惠发诚恳，遍率缁俗深



妙果院造塔题记照片

信人，共输资贿命良工，斲石重修千佛塔，功德相好殊希有……

洞真在《妙果院造塔题记》中说：

“妙果院千佛石塔一十三层……自扶宗论主忠法师住持……清惠愿董兹事檀施辐……革旧成新，累基筑级移建……经始实大观庚寅……塔乃次年季春九日也……（因刻石表面磨损较严重，有些字迹难以辨别）”

这样看来，《比丘清惠发愿重修妙果院千佛塔刻石》中“比丘清惠发诚恳”和“斲石重修千佛塔”这两句与《妙果院造塔题记》中“清惠愿董兹事檀施辐”这一句两者相比照，相对应，皆提及了清惠主持重修千佛塔之事。

1951年3月7日，因城市规划需要修建丽温公路（现人民路前身），有关部门考虑到汽车行驶经过妙果寺千佛塔时引发的震动，可能导致该塔倒塌，就这样，经历千年风雨沧桑的千佛塔在一天之内被拆除了，多么令

人痛心啊！

千年古塔，只因修建公路，怎么说拆就拆了呢？这件事引起中央文物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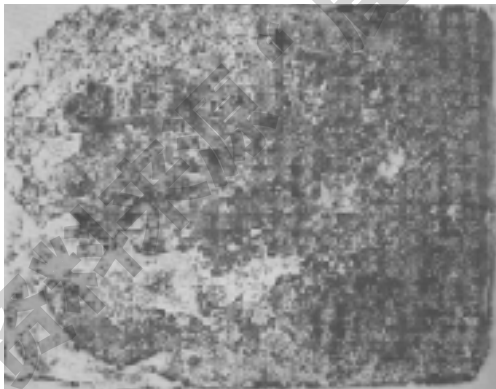
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致函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席谭震林过问此事，又给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今上海博物馆前身）发函，督促浙江省人民政府适当处理这起拆塔事件。谭震林两次命令温州市人民政府调查千佛塔拆塔的事实真相，并要求详细上报具体处理过程。

接到省府两次命令，温州市人民政府分两步处理：一是责令温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和温州市文教局将清理文物分批运省文教厅再转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二是责令与该案有关的部门单位温州市民政局和温州市公路局调查事实真相，作出检讨。

这就是震动京城的温州妙果寺古塔案。事件让人看到谭震林、郑振铎等老同志对文物保护工作是何等的重视和关心！

千佛塔出土的文物今何在呢？

当时，千佛塔出土的文物分三批予以处理。第一批送省文教厅转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第二批运省文教厅转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当时已装箱，然未起运，今藏于温州博物馆）；第三批留温州。第一批文物计 15 件；第二批文物计 102 件。



清惠重修千佛塔刻石照片

据今存温州档案馆资料显示，文物“曾于当时设五马中国国货公司二楼供众展览……塔中有铜质柜一只，内存继忠和尚舍利十数粒，另有银质鎏金佛像及小块青石碑一方，记有继忠和尚平生简略、并古钱等”。

2013 年 3 月，有关专家

致函上海博物馆，要求确认并查询第一批文物的下落。得到的回复是：未收藏；又电询浙江博物馆，得到的回复是：亦未收藏。第一批 15 件文物不知所踪，成了难解的谜。



千佛塔铜镜照片

这 15 件文物分别是：银质鎏金释迦佛一尊；银质鎏金多宝佛一尊；铜制韦陀佛像一尊（剥落）；观音像片一件；白色瓜式瓷盒一件；净瓶一件；舍利子五颗；小净瓶一件（内贮小舍利子三颗）；座饰（座锦）二件；佛座（宝盒）一件（残破）。

温州市图书馆馆长梅冷生在《梅冷生集》卷五《妙果寺宋塔介绍》一文中记录了当年拆塔的一些情况及出土文物清单。

据有关资料记载：二佛——银质鎏金释迦佛、多宝佛像并坐塔中，工艺精湛、庄严肃穆、栩栩如生。可惜，后人已无法一睹千年佛像的风采，只能从描述中想象佛像当年那惟妙惟肖的姿态与容颜。

千佛塔出土的第二批文物，均由温州博物馆收藏。有宋代碑刻、唐宋古钱币、铜镜、小石佛、铁钉、经箱、铜箱等等。笔者从有关资料得知：其中北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的铜镜非常精美，引人注目，它呈圆形，镜面平直，色泽明亮，上有“大中祥符六年二月杭州铸”和“官”等字，这说明该镜是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杭州官方铸造的铜镜。

歧海逸事三则

金恩海

信息时代，迅猛的城市化进程，许多事常使我们措手不及；转头之间，曾经的乡间里弄，竟悄然被大厦高楼所淹没。那一天，我站在沧河村的横塘桥上，忽然平添了一丝说不清、言不明的愁绪——似乎“横塘不映月”了。永宁山没人关注了；郡城华盖山脚下的旧祠堂，也没有了踪影；永嘉场的沙村、普门、黄石浦、龙湾荡，等等，曾经耳熟能详的老村落，很快也要消失在我们的视线。

卷帙滑过，浮光轻掠，其实并无多少深意；浅尝辄止，无非零星勾勒一些千百年的闾里乡间，不经意留下足迹、那些年流传过的乡邦往事。或许，他们并不显得多么大书特书，或许遗落在时间缝隙，甚至于微不足道、无所觅处。然而，海水盈盈的秋夜，孤帆浆影的梦里，瓯水潮涨起落，舟楫恍若仍然在摇曳。

朱耸遁隐瓯北岩洞

永宁山，隔江北靠，延绵逶迤。作为千年温州郡城的主山，历来题咏摩刻不少，古人的活动遗迹，更是自不待言。只是，我们现在不怎么提起了。

北宋永嘉人（此处指历史上的大永嘉。下同。）朱耸，字合甫。早年间，

在京城汴梁待过一阵子，深得饱学的朝中翰林侍读刘敞先生的器重。后来，朱耸又辗转来到陕州函谷关，据说这里曾是老子当年著《道德经》的地方，换成现代地图上坐标，大致在今天的河南省三门峡市一带，跟随一位号称“草堂居士”的魏仲先老夫子游学，吟诵唱和，交往也有一些时日。

归来后，朱耸在瓯北永宁山的合山双瀑流的东侧，大致或是现在的永嘉县瓯北麻山一带，就以岩洞做居所，并在半山腰修盖了一座隐清亭；然后，撰写了一篇数千言的《合山游》，自号“嘘愉子”。每日随身携带《周易》《老子》《庄子》等书籍，反复诵读，过着超脱凡尘的日子；野鹤闲云，怡然而自得乐趣。

北宋治平年间（1064-1067），温州郡守周少卿，为了延揽民间才智出众的贤明人士，特意邀请朱耸到郡府议事，朱耸居然闭门遁见。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温州郡守楼钥，又带着一班幕僚前往瓯北合山，踏访朱耸当年遗迹，深谷幽林、黄鹤不觅，不禁感叹：“右军访文君，遁迹入深竹。我来寻嘘愉，人亡但空谷。”

文君，指的是东晋时候永嘉郡名士张荐。大书法家王羲之，官封“右军将军”，任职永嘉郡守（彼时温州地区行政长官）时候，得知牧治下面的乐成县（属于今天乐清市），有个叫张荐的布衣百姓，谢客闭门而颐养心志；家里种植了数十顷苦竹，隐居其间，终日以竹林作屋。太守王羲之对他很感兴趣，于是便欣然前往寻访，没想到，张荐果真避而不见，遁于密竹深处，决意不出。人各有志，可见知州楼钥的感慨，当是有出处的。

宋隆兴年间（1163-1164）进士、永嘉人周去非，还专门写有《怀嘘愉子》诗：“白云近空山，清风动修竹。竹间何所有，曲涧深谷谷。山迥何可穷，万木来悬瀑。昔有君子庐，清标谢王屋。北山兹正高，邦君见良独。吾党讵敢忘，封植此佳木。”

时人还有《怀耸诗》说：“嘘愉处士谪仙才，欲泛沧洲驾鹤回。当日衣冠俄逝水，至今风韵尚琼瑰。一江两岸分南北，双桨孤帆易往来。试问合山何处是？故人岩室半苍苔。”

周感诊脉得妙句

明代永嘉三都沙村（今龙湾区海滨街道沙北村、龙湾国际机场西一带）人周感，字诚通。在姜准撰《歧海琐谈》中，多次闪现他游丝般飘浮的身影。

周感自幼聪敏好学，有匡世济时的大志；有“神童”之誉。少时，有人出联：“燕入虚檐，天外飞来三寸墨”，周对以“龙藏大海，胸前涌出万重金”；又出对：“雁横高塞，空中写出一行书”，格调与境界，似乎比前一句更胜。

十二岁时，周感和三都普门村张积，一同主持修建永嘉场沧河横塘桥——在当时，这座桥梁属于地方上的交通要道，是“下横路”通往“上横路”的必经之道。

及稍长，经举荐，补邑诸生。他善于著说立论，往往见解独到。赋诗填词，常常有佳句妙得；又旁通触类，尤擅医术。朋友乐清徐东山造访，稍觉身体不适，进门便招呼周感为他号脉诊断。周感居然用手掌连连击拍茶几，大声称好。徐东山大惑不解，急忙询问缘故，周感却慢条斯理地说，偶得“切脉草木长，秋山来故人”佳句，能不赞赏叹息一番吗？

二十七岁那年，周感忽觉“自古山林之士多寿，而寿生莫如炼精”，然而自己居住的沙村地方上，杂乱纷扰，并非清修、潜学的安静之所。于是，变卖妻子姜氏随嫁的妆奁，尽出积蓄，购得大罗山瑶溪垄东侧、青山村附近的东谷庵谷地；建造瓦屋，开辟秽田茶园，种植松竹榛栗千百株。

各项事宜经营完毕，周感撰文，改山谷名为“玄谷”，并自号“玄谷子”，遍搜各类古籍典藏于谷中，其中不乏有善本。隐居游息，读书求志，常对着门前的溪池，周感自诵道：“林壑有缘，则访山登水，独擅无穷之乐；庙堂有位，则经天纬地，树立不世之功。”

周感在玄谷读书潜隐，约有五年时间，嘉靖乙酉年秋（1525），举为乡荐。第二年春，北上京师参加春闱。其时，同乡普门村张璠（号罗峰）在朝廷参与主持“议大礼”，早年间就和周感相互熟稔，并深识其才学志向，

三次前往周感所住的客栈拜访。周感却因为“倚攀附和”的嫌疑，不考就直接回老家去了，《沙村周氏宗谱》载云：“裂卷不试，拂衣归矣。”

归乡后，周感撰写《再上张罗峰书》，条陈乡里，却不料因病而英年早逝。此前，曾撰写《上张罗峰书》，以张璠奏请修筑沙城（按：古瓯江口南岸海堤）“禹功既成”“敬为先生贺”。桑梓事功，溢于天鉴，留诗《秋月吟》云：“海水浮盈盈，海月悬空明。有人秋夜行，独怀无限情。”

时人感叹，说周感有范仲淹“先忧后乐”的抱负，老天爷却不给人寿，实是可惜！今天看来，应该属于体质羸弱，加之性情多感，往往思虑过竭，伤时害世所致。遗有诗句：“芭蕉摆月光不定，蟋蟀饮露声愈凉”，虽说不怎么听闻，似也可以窥探，周感不太擅识时趣，孤拔居僻而致世人冷落。后来，浙江提学副使万潮，感念伤悼周感的文章与德行，特意嘱咐温州知府丁瓚，购买大罗山天柱丘地，用文士礼归葬。

姜准拒修郡志写琐谈

世上本无古今事，大抵倒也听过有“古朴率真”的说法。其中某些矢志不渝地坚持自己、意欲抵挡江河日下的流俗时潮，往往无异于螳臂当车；甚至被玲珑圆滑的世人哂笑，或是迂腐，或是无用。自从有朝代以来，概莫能外。鹿城姜艮峰，在当时，大概就是属于此类不识时趣的怪人。

南宋绍定年间，自先祖从福建长溪赤岸（今福建中北部），迁徙至永嘉县，到明嘉靖万历时，姜氏在此已繁衍了七世。姜准，字平仲。或者，按照先天九宫八卦图的演算，其居所位于郡治九斗城华盖峰下，落在西北“艮”的方位，取卦象——“高山重立，渊深稳重，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而号“艮峰”；当时人多有称他为“艮峰先生”。

姜准自幼聪颖过人，读书常过目能诵，“未冠，为诸生试恒隼”。只是偏好阅读旧牒杂籍，尤其痴于对温州瓯海本郡掌故的探究。当时，朝廷应试大考的标准是八股策论，而掌故这一类杂乱闲书，作为生员举子参加

官方应试，基本上是没有用处的。因而，屡屡考试不中，便也很自然的了。

殊不知，愈是考不中，反而愈发不可收拾，到处搜罗、研读自己乐意的书籍。每每通宵达旦，青灯秉烛，横襟对卷；若是到了曙光微现时刻，仍倚靠在窗檐侧角，就着半明的晨光继续阅读。一生都是这样坚持。因而，“编摩上下数千年，图集纵横三万牍”，学问涉猎广泛，无所不窥及。以至于新学后生，但有疑问不懂的，无不是过来请教姜艮峰先生；往往如同饥肠求硕食，斩获丰盈而归。

姜准生活清贫，居住在温州郡城华盖山脚下的祠堂后。然而，诵读余暇，却不忘腾余出斋屋前面的方丈小地，栽菊艺竹，抱瓮浇灌，陶怡情志。精于书法，尤其擅于篆、隶，每在堂廊边摆开纸砚，无论贫贱潦困，但有求字的无不是欣然应允。不过，亦有例外，对求他写字却用心出售盈利的，则是断不答应的。姜准自己则身穿粗布大衣，只是粟米充饥；从来不清楚家中剩下多少余粮，可以隔天糊口填腹的。所居住的地方，临近繁华市坊，或是轻薄，或是喧嚣，但他从不为外象所撼动。

出门的时候，端方敦睦，从不轻易说话，但有开口，必是“礼义廉耻”等等。遇有时人翩翩谈论当下流行，姜准却又似乎不甚听得太懂。乡间里弄，有狡诈耍滑的恶徒，老远听闻艮峰先生的脚步临近，都是快步躲闪避开，害怕迎头撞见时遭致训斥，常常使他们慌乱得面红耳赤、大汗淋漓。

万历年间，温州府编修郡志，拟聘请姜准参与工作，他却退避不赴，时人多有评价他的清誉。对于古人，我们其实不必太求全责备，例如，今天所做的事情，无论现时评估多么正确，恐也难免若干年后，人们的重新审视与评判。毕竟，每个时代都有其特定脉搏以及社会的文化氛围；所谓，此一时彼一时，或这正是《孟子》所说的“知人论世”吧！这个辩证法，现在乃至将来，仍有着一定的普适性。

无独有偶，同时期有一位叫梅应期的老先生，原系磐石卫世袭勋职，“磐石卫”为海防军事机构，大抵负责瓯江口区域及周边的海防警备兼地方治安。梅氏却将这个当时不可谓不体面的公职，主动让于他人，自己则闭门

谢客、潜心著作。郡守听闻梅先生道德文章，欲邀他到州府做客，却一直没能有机会。某日，梅氏恰恰乘坐蓬船路过，郡守便草拟了一篇《朝闻道》，想要听听意见与建议。仍是没能促使他弃舟上岸来，不得已，嘱咐其兄弟强行登入舟蓬。梅氏挥洒自如，在舱中草就了数千言，用以作答郡守；随后击拍船舷，做歌而去，终是未能与郡守见面相叙。

就著述而言，姜准一生博综群籍，闭户著书，著作多达二十几种，可惜都已经遗失，仅存《歧海琐谈》（十六卷）传世。该著作专事记述宋、元、明时期温州地区掌故，涉及建置、胜迹、典章制度、名人逸事、风土物产、书法诗文、民谣联对、灾害异变、神仙鬼怪等诸多信息。书名“歧海”二字，所指即今天大温州区域，典出晋代训诂大家郭璞注《山海经·海内南经》之“瓯居海中”所云：“今临海永宁县即东瓯，在歧海中。”

清儒孙诒让在《温州经籍志》中按，批评姜氏“《琐谈》”喜谈“神怪”，中间还涉“猥俗”笔墨，“冗拙”也是其间一疵。同时却又评说，就温州一郡而言，当文献散缺之际，能够取此书“补亡校异”，有着无可替代的参考价值。姜准的生平事略，见刘康祉撰写的墓志铭，《永嘉县志》也有本传，据载，姜准七十五岁善终，在他们那个时代，应是绝对长寿了。

清末民初文士郑姜门

沈洪保

郑姜门（1883-1942），名猷，字姜门，以字行。温州城区三角门人。他出生于清光绪九年（1883），逝世于1942年，即抗日战争最艰难时期，享年59岁。

他是近现代温州报刊《民智报》《瓯海潮》创办人之一，是文学团体“慎社”“瓯社”的发起人之一。梅冷生撰《“慎社”与“瓯社”》中说：“1920年，我与郑猷、吴劲、林仲、沈翔、郑任重等友人，创办了《瓯海潮》周报，共办了15期，停刊。”

慎社成立于1920年5月30日。梅先生、郑姜门作为主要发起人，社员有夏承焘、陈仲陶、严琴隐等。1921年，梅冷生与王渡向瓯海道尹林鹑翔献策，建议再创立词社，取名为“瓯社”。林鹑翔任社长，社内有夏承焘、郑猷等共计20人。

民国初期，实行省、道、县官制，分一省为数道。瓯海道管辖温州、处州两地区。林鹑翔（1871～1940），字铁尊，号半樱，浙江吴兴人。清末民初政坛人物、词人，光绪二十八年举人，民国十年（1921）曾任瓯海道尹。

1921年，林鹑翔赏识郑姜门的才能与声誉，特聘他担任瓯海道尹秘书。林鹑翔是位风雅廉吏，郑姜门在公余与他常常谈诗论文，相处非常融洽。

后来，林鹑翔也加入“慎社”。林鹑翔是词学大家朱彊村的大弟子，工于填词。梅冷生、郑姜门等十余人就向林学词。1927年废除道制，随之社友星散，“瓯社”也退出历史舞台。

郑姜门与夏承焘、梅冷生诸先生在民初之时，好友结盟，诗文酬唱，文采风流，令人敬羨。在《慎社》《瓯社词钞》期刊中还保留很多他们互相赠答唱和的诗词。

郑姜门于1942年逝世，正值我国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时期。在那颠沛流离、兵荒马乱的环境当中，对于一位忧国忧民的文人，一定写过很多诗文。但，从其女婿曾昭文收集的《郑姜门先生诗文集》看，自1921年至1942年逝世，这二十年期间，竟无只字片纸留存，这是非常令人惋惜。可见他的作品散失一定很多很多。

先说说他的诗。他的诗题材还是广泛的。比如《庚申夏大雨水势陡涨因书一律次韵》：

健雨兼旬势未休，六街竟可棹扁舟。
江村夜进蛟争窟，海市朝开蜃结楼。
矫首长天思炼石，侧身大地惊横流。
已饥已溺群公志，一念哀鸿泽畔不？

写的是1920年（庚申）温州连日暴雨成灾，洪水泛滥的情景。

民国六年（1917），《瓯海潮》周刊发起《东嘉新竹枝词》征稿活动。“收到各卷甚夥，谱梦得元和之曲，成瓯江风土之记。”瑞安的花信楼主人”洪炳文、温州城区“姜门外史”郑猷等各家纷纷响应投稿。郑姜门写了二十首“竹枝词”，而且首首通俗而有情趣。如：

南门一路接城东，颗颗灯珠篆眼红。
但愿郎心如电火，触机无处不相通。

(原注：“普华电灯公司，自开办来推行颇速，大家闺阁中多有装点。”)

又如写温州新时代出现的新事物城市电灯、塘河小火轮：

南浦无须动别情，朝朝汽影复轮声。

门前好载儿夫去，往返塘河一日程。

(原注：“永瑞小河轮，早午开航两次，往返仅需一日，行人称便。”)

又，《黄柑词效古意》：

欢是黄柑瓢，依是黄柑皮。

将皮把瓢裹，终岁不相离。

欢是黄柑瓢，依是黄柑子。

瓢味一何甜，长裹欢心里。

这诗模仿南朝民歌，“欢”在古代民歌中男性“你”的代称，“依”是女性“我”的代称，写的是男女相爱、忠贞不渝的情感。

民国十九年(1930)，温州建造公园，以纪念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而名曰“中山公园”。郑姜门热情地给予赞美，曾写过《公园即景十首》一组诗，题咏当时中山公园的美景，分别是：《古洞飞霞》《留云晚眺》《好湾步月》《谢村红叶》《灵池拾梦》《枕流坐钓》《濠河泛月》《容成清磬》《龙头勺水》《大观归帆》。因为时间久远，这《公园即景十首》均已散逸不复见，幸好其友刘景晨作有《次和郑姜门公园即景七绝十首》，仿佛还能见到郑姜门《公园即景十首》的一抹影子。

他的词也写得颇有韵味。如《鹧鸪天·茶山桃花》：

“花树缤纷劫外春，扁舟疑在武陵津。溪南溪北飞红雨，山后山前烧绛云。闲品茗，席芳茵，大罗深处着吟身。流杯又报胡麻熟，一抹斜曛掩

洞门。”赞美温州郊外茶山漫山遍野桃花盛开时节的美好境界。

又如《画堂春·园中梨花盛放，逾宿已零落矣》：“雨丝风片殢人天，一帘春梦如烟。淡妆缟袂月中仙，影也娟娟。飞絮沾泥底恨，飘英堕溷堪怜。东皇诉与意缠绵，惜取韶年。”对梨花一夜零落的感叹，说司春之神东皇，也情意深长，不能放下，劝人们珍惜美好的时光。

他写过许多文章，如《馀园记》，写友人梅冷生的父亲秀芝先生“家旧有园，逼而仄，曩岁购其旁隙地，辟而广之曰‘馀园’。园之东有古樟婆娑，高逾墙数仞，数百年物。依树筑阁，峻拔如望榭。冷生登而喜之，署以‘劲风’……砌砖为坞，编竹为篱，杂蒔花卉，俊茂悦目。其木有山茶、海棠、佛桑、石榴、芙蓉。草则兰、菊、白莲、酴醾、萱花之属……故涉足不必宏丽而三径辟焉，遇目不必珍奇而四时备焉，抚景盘桓，会心不远，游其中者，泠然清，悠然远，几不知门外车尘十丈。噫，抑何深合乎清宁平夷之旨乎！”他对“馀园”作了细致描述，把那幽雅静谧、清新古朴的“馀园”多角度地赞美了一番。

还有记秦桧乱政，温之人胡衰，在自家堂前手植桧树六棵，题堂额曰“六桧堂”。“六”与“戮”谐音，“六桧”隐寓“杀戮秦桧”之意，以示对秦桧的刻骨仇恨（《六桧堂壁记》）。也有记述乾嘉期间温州诗人群体“市井七子”中代表人物《季碧山》等，这些文章都有史料的价值。

还写有时评社论：《中国前途之幸运》把当时的形势分析之后，得出结论：“我国现势由幼稚而趋入壮盛之时期也。”还有《欧战加入之研究》《劫运与进步》《南北争持之罪言》等文，均系书生忧国，敢于抨击时弊的慷慨陈词。

郑姜门与夏承焘的关系较为密切。夏承焘有《怀郑姜门》：

绛帷丝竹后堂陈，坐冷青毡不厌贫。

羨煞传经郑高密，门墙弟子半佳人。

郑高密，即东汉末年儒家学者、经学大师郑玄，字康成，北海郡高密县（今山东省高密市）人。郑玄曾入太学攻读，后来聚徒授课。家贫好学，终为大儒。夏承焘把郑姜门比作东汉大儒郑玄。

夏承焘在《天风阁诗集》前言中说：“其时同里梅冷生、郑姜门诸友筹组慎社、瓿社等诗会，予侧身其间，常得诸诗友切磋之益。至二十岁，积诗百余篇。”可见夏承焘年轻时学习诗词，是得到过郑姜门帮助的。

夏承焘1947年7月13日日记说，在窦妇桥张嘉仪家中，“见户外一中年妇人，向予问讯，讶不识其人，询之，则郑姜门令妹也。忆予年十八九，往来姜门家，时其妹才十四五，且一度与予议婚。今乱头粗服，子女皆已成人，似隔世相逢。”原来夏承焘年轻时“往来姜门家”并曾与“郑姜门令妹”“一度与予议婚”。可见两家关系曾经非常密切。

夏承焘1942年5月18日日记：“听止水谈乡事，惊悉刘次饶先生已于五月五日在平阳下世……郑姜门、黄一萍亦病卒。”可见夏承焘身在外地还是惦记郑姜门的。

郑姜门与梅冷生也是朋友。1917年梅冷生有《赠姜门》诗：

平生豪气见襟期，为困清贫事可知。
落魄不妨多借酒，穷愁还劝少工诗。
空思恨海填精卫，苦忆荒山叫子规。
一种骚怀抛未得，湘兰沅芷不同时。

郑姜门有《如此江山·送梅冷生之武林》：

桑弧蓬矢男儿志，壮游岂轻孤负。
仆射高阳，步兵广武，何况东南大藪。
杨帆击楫，好稳渡之江，莫重回首。

咫尺江山，歌离不唱渭城柳。
仓皇猿鹤劫后，剩临安半壁，独撑灵秀。
侠女亭边，冤臣墓畔，为我多浇杯酒。
休嗤邂逅，恐湖上风花，似人消瘦。
满贮奚囊，待湔尘浴丑。

郑姜门有一篇感念亡儿的词作《离亭燕》，梅冷生就“倚此奉题”填了一首《摸鱼儿》，也可见他们是亲密的朋友。

郑姜门书法也很好。在积谷山摩崖石刻中，有有“气如虹”三个大字，字径约60厘米，左署“郑猷书”。

郑姜门有四女一子，子不幸夭亡。大女婿是名中医南宗景，二女婿吴志远（其业不知），三女婿是从事财会的曾昭文，四女婿是上海金城银行工作的杨鼎坤。

刘瓌之的那些温籍门生

蔡 榆

他是山东诸城人。他在清朝嘉庆间三度主考乡试；
他是刘罗锅侄子。他的宦宦生涯两度与浙江交集；
他名瓌之号信芳。他算是温州地区多名士子座师……

近读苍南华文漪《潘虹桥同年自都中谕书为予抱伯道之戚并云刘信芳师垂问近况感赋》，知刘瓌之、潘虹桥与华氏之间的关系，方知刘座师在温的门生还有潘光鈞、潘鼎……读《温州经籍志》，内载潘虹桥《五梅一研斋集》，亦知远在杭州的同年拔贡胡书农（其子胡琨，与孙衣言等人同为道光丁酉年拔贡）曾为潘虹桥集子作序。

于是，这个“学霸圈”似乎离我们近了很多。本文辑录些许史料，尝试还原这一个文人圈以进一步了解他们的往事。

（一）刘瓌之：两主浙考，门生多人

刘瓌之（1762-1821），字佩循，号信芳（汪封渭《刘瓌之传》作“字信芳”）。清廷名臣刘统勋孙辈、刘墉（俗称“刘罗锅”）侄子。其父刘堪早逝，由刘墉抚养成人。登乾隆五十四年（1789）己酉科三甲进士第23名（此科，阮元为二甲进士第3名）。嘉庆四年（1799）刘瓌之以侍读学

士身份提督浙江学政。1800年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此后相继出任过户部、兵部、吏部之尚书等高级别职务，后加太子少保。卒后谥号“文恭”。《清史稿》录其个人传记。据其《传》载，道光帝对刘氏的辞世，很是痛心，称之“明白敢言，深为悼惜。”

他两度莅浙，一次是以“钦命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提督浙江全省学政。于嘉庆六年（1801）主持辛酉科浙江全省选拔。据嘉庆辛酉科浙江选拔贡卷，如“毛风纪”（严州府遂安县籍）、“罗耀”（杭州府新城县籍）二人的卷首，均有“钦命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提督浙江全省学政 刘”字样。

这一场全省选拔，温州地区永、乐、瑞、平、泰五县有永嘉潘宗耀、陈舜咨、郑之良；乐清汤日修；瑞安林佩金；平阳华文漪；泰顺董廷对等几名士子胜出。

另一次，则在1810年，刘瓛之以“经筵讲官、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的身份充“大主考”，与穆彰阿一道主持嘉庆十五年（1810）庚午科浙江乡试。温州府学廩膳生潘光鈞中式正榜第37名，来自泰顺县学廩膳生潘鼎中式副榜第五名。

这前后相隔九年的两场考试，为何将其并在一块说事呢？因为刘瓛之先后两度主持浙省的选拔与乡试，于是成为上述几名温籍士子的座师，于是与温州有一定的关联。

其实，刘瓛之曾涉足温州，登江心屿谒文丞相祠。留诗云：

长江千里涌金鳌，丞相祠依梵宇高。
色色败垣萦蔓草，秋声断听吼惊涛。
只将壮志酬炎午，徒使伤心有谢翱。
俯仰荒凉谁与语，惟闻渔唱弄风遥。

（二）潘虹桥：多才博学，七试不第

潘宗耀，号虹桥。少有俊目，长于言情，读书既富，其志斐然，不肯以侧辞自见。“多才博学，犹嗜吟咏”的他于嘉庆辛酉六年（1801）选拔贡，此后，七上春官而不第。丁丑廿二年（1817）大挑第一，以知县用，历任江南镇江、桃源、丹徒知县，“士民咸爱戴之”。

虽然尘俗殆甚，但潘氏于公之暇仍不废“码字”这档事。根据他自己的说法，“自筮仕南河后，检存旧作，得诗四五百首。”己卯（1819）岁，不幸遇邻居家失火，殃及“旧所钞录”“无一字存者。”

即使为任职奔走大江南北，但“二年所积，得诗二三百首”，附在旧稿中；加上还能记起的“四五十首并零联句，可续而成者，亦将及五十首”，综记得诗四百余首。因“先高祖于轩前植梅五本，因以五梅名轩。续先君子徙居城南，仅携先世一研自随”，出于“不忘旧事”之故，遂合并为五梅一研之斋，于是用此来命名集子。

市区大南门英济庙，俗呼白马庙。相传神为昭明太子，但历来既无旧碑可考，亦无有详其原委者。据《杨青集》载，庙中有潘宗耀楹帖，杨青认为“惟此联尚非俗笔，因附录之”。联云：

“白马溯光仪，彩仗霓旌，尚振英风昭睥睨 /
黄麋谈故事，仁浆义粟，长传闾泽济嗷鸿。”

文末“跋”云：英济庙神灵最著，里俗相传“梁昭明太子拯饥来此，时乘白马，故又称白马庙”云云。杨氏按称，郡志未载此事，前史亦无可征证。昭明何以来温拯饥，事属茫昧。

潘宗耀《五梅一研斋诗钞》，是其宦游江左之日手录成编。在丙戌（1826）冬疾革时，还让家人“扶坐强目握管书诗附之卷末”。丁亥（1827）夏，他弟弟潘宗澜（道光五年乙酉科拔贡，与马昱中、平阳谢青洲等人同年）

请青田端木国瑚删定，杭州胡书农作序。

某年，潘宗耀在京，与座师刘瓛之有过一场会晤，并给离京返乡十余年的华文漪写了一封信。遗憾的是，此信不复再见。只在华氏《逢原斋诗文钞》中，录有《潘虹桥同年自都中诒书为予抱伯道之戚并云刘信芳师垂问近况感赋》诗，后世的人们得以见识他们交往的些许细节。

（三）华文漪：穷乡伏处，溘落无成

华文漪，字菴园，平阳蒲门（今苍南蒲城）人。嘉庆辛酉拔贡。著有《逢原斋诗文钞》。

华氏诗文水平，在嘉道时平阳全境文学之士中，与叶笈林并称“为最”（刘绍宽语）。他的古文创作，上溯唐宋八大家，“简要有法，波澜纤折”（孙诒让语）；他的诗取法于清季宋琬、施闰章、王士禛等人，风格“清瘦不俗”（孙诒让语）。

道光初，华氏与侯官岁贡生黄汉章（自号紫云老人）、罗源嘉庆丁卯举人黄铨（字衡仲）、长乐谢淞、福鼎林滋秀、平阳鲍台等结兰社，时称“兰社六君子”，有酬和诗集《兰社诗略》行世。

他与福鼎林滋秀的交谊最称奇，“二十年兰社，第有神交；一百里蒲门，从无面晤。”（林滋秀《哭华菴园文》）华氏所居住的蒲壮所城，与福鼎也就百余里路，而二人素无谋面长达20来年，所有交往仅凭诗文鸿笺。晚年华文漪，删定文稿后托付林滋秀刊刻印行，而林滋秀甚至变卖家产玉成此事。遗憾的是集成而文漪已歿。

林滋秀称其诗“锻炼精纯”。时平阳训导、钱塘人吴承志如此评介华氏：菴园学无师授，少时流连光景，为风花雪月之词；中岁始求体格，集中有《寄友人》一书，言脱诸生籍后，稍疏帖括，乃克上下古今，溯流穷源，恍然得古作者门径，择善而从，颇自负所长。

矾山人谢青扬《愈愚斋集·赠华栋放歌行》云：

菘园自是后来豪，别裁伪体亲风骚。博涉诸家取以约，兼工众格臻其高。
持论精严致不苟，雅尚骨力遗皮毛。洗出元音息浮响，如听风管兼仙璈。

华氏当年赴京廷试，结果并不顺利。刘瓛之曾欲延揽门下，华氏以母老为由婉拒，返乡课徒为生。十年后，潘虹桥从都中给华氏来信，并转座师刘信芳垂问近况以及为华氏抱伯道之戚事，华氏为此赋诗三首，字里行间有着落寞与伤感：

怀旧三秋后，深交十载余。双萍难重合，独处正愁予。
寥阔云边雁，殷勤日下书。升沈（沉）原未卜，弱羽待吹嘘。

多病聊藏拙，微申奉母情。蹉跎年事长，寂寞壮心惊。
堂构将奚属，功名况未成。端居丛百虑，寸抱向谁倾？

忆昔居人下，迺遭滞此身。偶然逢拂拭，一旦拔沈沦。
小草留空谷，青云企后尘。羊公怜舞鹤，顾影自逡巡。

华文漪与同年瑞安林从炯有诗文往来，在华氏集子里，收录了与林氏相关的诗作二题：

《秋柳和林鱼亭》

荒凉驿路客摇鞭，几树依依带晚烟。
疏碧耐留霜月影，浓蓝待染杏花天。

时牵别恨阳关后，省识风情玉殿前。
莫向湖波写愁黛，春风披拂自年年。

《题鱼亭同年北上图》

遥指长安近日边，长途辛苦马蹄穿。
眼中风景犹堪忆，帽影鞭丝古驿前。

枣林深处鹁鸠啼，驴背忽忽夕阳微。
一路鞠尘风里过，柳花如雪扑征衣。

我亦摇鞭共旅程，雪泥鸿爪不分明。
输君写向丹青里，宛见春风入凤城。

（四）陈舜咨：岁膺拔萃，终老明经

陈舜咨，字咨牧，又字云树，号春堤，永嘉（今市区）人。“少负俊才，未冠籍于郡庠，名重一时”的陈舜咨，辛酉选拔贡后，却屡蹶于秋闱。

陈舜咨与华氏有交谊。福鼎林滋秀撰《快轩诗则》载：嘉庆甲子（九年/1804）岁，曾以一册寄示菴园（华文漪），菴园至今藏弄。予为搦其尤者于编，虽止一斑，亦可以见全豹也。

当时如阮芸台、刘信芳两宗师，秦小岷、朱沧湄、李石农观察，莫不叹赏潘诗文。特别是温处兵备道李銮宣对陈舜咨“知之尤深”“尤赏异之”，且评定陈舜咨不少诗稿。李銮宣后来擢升云南布政使时，聘陈舜咨掌文书。在云南三年，“主宾相视莫逆，虽牛奇章之于樊川，范石湖之于放翁，不是过也。”

归里后，陈舜咨杖履优游，为人乐易，生平嗜茶。及老病惟啖饼，故有“萧

闲长说饼，多病但看茶”之句。晚年手写茶话轩诗文定稿。林大椿父启亭，时年已八十五高龄且为之序。

优游家乡的陈氏，除了与二三老友徜徉松台华盖间，还渡江而北到乐清的梅溪、金鳌两书院讲学，还曾一度任金鳌书院山长。“东望雁荡，西揽玉虹，而箫台丹霞诸山，罗列几案，顾而乐之。有终焉之志。”他每天与门下士把酒赋诗，悠然自得。终老于明经的陈氏，“人或以抱才不遇惜之，坦如也。”

陈氏博学多能，沈酣古籍，撷其精英。平人怀人感人，牢骚不平之忱，皆于诗发之。诗赋外，尤工书画。自云诗第一，书次之，画又次之。尝谓东瓯诗存原选甚滥，手为删订，易其名曰《瓯雅》，惜乎书未成而先生遽归道山矣。尝增订《南雁山志》二卷，《茶话诗轩》文集。又采群书俊语，为《牛尾集》《蚕尾集》；纂辑《孤屿志》。

其婿董福畴校诗集，厘订为两卷，先付梓。林启亭对陈氏的才华与他一生不相匹配的境遇表示莫大的伤感，在序中感叹道，“余思，才如先生，又得知己如李公，为之延誉，宜可以翔步木天、和声以鸣国家之盛，而竟至终老牖下，仅留此数卷遗墨，掩闕篋中，倘无人焉。为之表章，更数十年蠹蚀鼠穿，烟销尘灭，将不可复问矣。”

嘉庆甲子（1804）夏，温处兵备道朱文翰为之作《陈春堤先生小传》。

《晚晴簃诗汇》录有嘉庆辛酉八名拔贡的诗，陈舜咨系温州地区唯一入选者，录诗《安平县》：

暝色满平坝，夕阳犹未沈。
云边双鸟度，城上一峰阴。
荒市静如野，人烟寒山林。
敝裘须检点，冷意坐相侵。

（五）林从炯：承聘修志 入幕三度

林从炯，原名佩金，号鱼亭，后字子朗，别号石笥。瑞安人。

清嘉庆三年（1798），李銮宣任温处兵备道时，试中山书院甄拔高才生，林从炯由此深受赏识。六年，与华文漪等人同选拔贡。十九年会试报罢，返程时路过天津，受到李銮宣的接待。嘉庆二十一年（1816）丙子科浙江乡试中副榜（洪振宁先生编著《宋元明清温州文化编年纪事》载“道光元年/1821中举人。”疑误。）。嘉庆二十四年（1819）顺天乡试挑取誊录。李銮宣赴任广东按察使时，招林从炯同至任，因此得以与阳湖恽敬等深相结识。林从炯与青田端木国瑚互相唱和。

李銮宣诗《赠林生石笥诗后》中，以“四灵”千秋积愁来赞赏林氏人之脱俗、诗之清醇：

林生后来秀，潇洒出风尘。锦段花间集，箫声鹤上人。
读骚能要眇，持律更清醇。遂令四灵叟，千秋愁积薪。

道光十年，林从炯受聘入直隶提督徐秋潭幕府，逢驻地古北口山洪暴发，“坏屋数千，淹兵民数百”，可各方大吏以圣上万寿节而不敢上报。但林从炯力促秋潭具奏，后得赈恤，让很多兵民得以活命。

林从炯还应热河兵备道海忠之聘，纂修《承德府志》。该志自道光六年始修，至八年时粗成。但因热河地处塞上，采访无人，分纂志稿多有缺漏。林从炯接任后加以旁搜远籍近取见闻，排除干扰亲自纂订，终于在十一年完成，共28卷。但海忠进呈时自称总纂，并虚列鉴定、协理、总校、采访等衔，淡化了林氏的编辑之劳，使他“无人称道”。

根据道光《承德府志》内文“承德府志衔名”，海忠把自己列为“总纂”，而林从炯是两名“分纂”之一。台湾成文出版社影印的该《志》（光绪十三年四月 知府廷杰 教授李世寅 重订），封面上则署名“海忠 修 /

林从炯等纂”，如此还是比较客观。

林从炯还曾一度任过林培厚幕府，与他以诗相唱和。林氏搜集卓敬遗著及名家悼念诗文，刻为《卓忠毅遗稿》3卷，由好友、曾任富阳知县的恽敬作序。林从炯诗文，辑为《玉甌山馆文钞·诗钞补遗》，共10卷。

华氏《逢原斋诗文钞》有二首与同年鱼亭相关的诗作（见前文）。杨淡风《杨青集》录有一首林氏诗作，题为《日呈方茶山太守》：

茶山太守卓有声，海内藉甚江州名。
天与贱子作客主，片风吹入浔阳城。
浔阳恰是诗人住，今日方干昔白傅。
春风烂漫琵琶亭，千载佳人此间遇。

我今远从南海游（原注：筐中无长物，惟扁舟中有李暮一枝笛），五指拂
拂蛟龙愁。

我公诗思最奇绝，胡不对客书数阙。
兴来迸作风鸾音，一声吹上沧江月。

林从炯与青田端木国瑚有深交，情谊至挚。林氏辞世时，端木国瑚曾撰挽联云：

气绝凌云，他日岂遗司马稿；
泪倾海水，此时先碎伯牙琴。

（六）董廷对：以慈抚字，不轻用刑

董廷对，字策三，嘉庆辛酉（1801）拔贡。泰顺平溪人。

董廷对曾入太学，精勤学业，考取文颖馆校录。嘉庆十三年戊辰（1808）顺天乡试中式举人，据《嘉庆戊辰顺天乡试齿录》记载，董廷对排名第30

名（第33名为浙江归安沈惇典，任温州府学教授），授直隶广平知县。检光绪《重修广平府志》，载董廷对于嘉庆20年任。

据同治《分疆录·董廷对传》载，广平县是一个民风淳厚的地方，董廷对上任后“以慈抚字，不轻（易）用刑”。时教匪初平，有以余党被讦者，经审，系协从，于是放他回去。至河南界被擒，加刑严讯，移查原籍。制军将以疲软劾之。廷对廉，知彼界内有贼目，漏网者曰：常来阳，不得已。遣役往擒之以为抵，实李文成，伪总兵也。被讦者既定大辟（谓死刑），罪及家属。廷对不同意，为该犯争取“留其幼子以过继”，并通知其族人将孩子领养，“□□大吏以功罪抵销”。

检《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董廷对40岁时由文颖馆膳录议叙知县，双月选用。掣签湖北黄州府黄安县知县。从他呈御览的奏文来看，时为嘉庆二十二年二月。

如果广平府志所载董氏任职的时间没错，那黄安应该是他第二任职地。不知有否赴任，检黄安县当地的旧方志，未见载。

（七）郑之良：有学有才，终于教谕

郑之良，永嘉人。

检光绪《永嘉县志·选举·拔贡》（卷12），“郑之良”列嘉庆朝拔贡一栏，不与同期的辛酉科永嘉拔贡“陈舜咨 潘宗耀”列一起，而是以县学生的身份，与“癸酉科 徐作砺”列在一起。

郑之良以拔贡出任庆元县学教谕。

据光绪《庆元县志·官师 治行》载，郑之良性姿磊落，书法雄劲，有学有才。训课之暇，士人有控争者，即招署理释。惜构疾而终。闾庠贖之归里。光绪《永嘉县志》基本沿用此传。

（八）汤日修：鲜见记载，生平不详

汤日修，乐清人。关于他的史料，可见不多。光绪《乐清县志》里，除了选拔的记载，包括新编《乐清县志》在内的多种本地资料均未见涉及。待补充。

（九）潘光鈞：乡试在榜，详情鲜少

潘光鈞，字廷珍，号蓝田。乾隆丁亥（1767）年五年出生，温州城区人，住郡城新河街。他以温州府学廩膳生的身份，中式嘉庆十五年（1810）由刘瓛之、穆彰阿主持的庚午科浙江乡试第37名。

从本科乡试《履历》来看，潘光鈞有一胞叔叫潘泗；另一叫潘海，进士，候选训导（检《清朝进士题名录》，未见载此“潘海”者，不知是否系“乡进士”，俟考）；再一个叫潘淮。有三个哥哥，老大叫“光鑑”，老二叫“光铨”，老三叫光。潘光鈞育有三子，分别叫潘天贵、潘天培、潘树槐。

此外，相关信息鲜少记载。

（十）潘鼎：直隶州判，未仕而卒

潘鼎（1775-1836），字彝长，号小崑，泰顺罗峰人。幼颖异，有神童之目，年十三入学，十五补弟子员。敏悟强识，博涉图籍，能诗古文，工笔札书法，集有晋唐六朝之长，自成一家，名家一时。水墨兰竹，得者宝贵。喜购书籍古帖名家笔砚图章，不问生产。晚游京师，名驰都下，授直隶州判，未仕而卒。这是同治《泰顺县志》中有关潘鼎的传记。

潘鼎在嘉庆十五年（1810）庚午科浙江乡试中，中式副榜第五名。所谓副榜，是指科举考试中除正式录取外，另取若干名，时用附加榜示，也叫“备榜”。此类被录取的，入国子监，由此称“副贡生”（同治《泰顺

县志》即载“副贡生”）。据新编《泰顺县志·潘鼎传》载，中副贡后，例授直隶州判，因丁父忧而未仕。

潘鼎与青田端木有谊。在同治《泰顺县志·艺文》（卷十二）录有潘鼎《送端木鹤田》诗：

乱红飞处有莺声，携手河桥问客程。
正是江南三月暮，绿波时节送君行。
江头斜日去帆低，翠靄苍烟一望迷。
惟胡离心似潮水，随君一宿上温溪。

潘鼎在自家屋后有一个读书处叫“一卷山房”。嘉庆二十四年，福鼎林滋秀主讲泰顺罗阳书院时，与潘鼎相友善。林氏曾为潘鼎的读书处撰有《一卷山房赋》，称：

绣壤衡从，门前廿亩五亩；螺烟出没，楼外两峰
三峰……憩宜六月，幔亭忘火伞之张；坐许三人，
斗室决茗瓿之战……修竹茂林，补兰亭作序，飞云
盘谷，增辋水成图。何多逊也，不亦宜乎？

赋中，林氏提及一些关于潘鼎的信息，小崑以辨稻殊姿，吟榭慧枝。双了正字，十五龄食饩而归；只眼观书，三千牒判铅而理。对自己与潘鼎的交往，如此描述：雅擅晁姜之癖，篆印摩挲；更饶徐庾（注：南朝陈徐陵和北周庾信的并称）之情，香奁绮靡。何期放鹤处士，遇此听莺山人（原注：小崑自号），欣萍水之乍逢，荆犹班伍，慕茗华之相著，榻即下陈。……是以才爱潘郎，代作闲居之赋；敢谓言同张老，希为来贺之宾。

潘鼎自己也为此佳境作诗，题为《一卷山房漫兴》：

结宇平林外，悠然隔市阡。帘垂春昼永，花落午庭间。
书惯贪多读，诗难割受删。课余仍寂坐，静对一卷山。

潘鼎与曾镛（1748—1821）有师生谊。曾镛亦名曾复斋，有“复斋先生”之称。泰顺罗阳人。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拔贡。入太学，每试皆名列前茅。历任汤溪、金华、孝丰、云和等县教谕。著有《五经解》《复斋文集》《复斋诗集》等。

县志录有潘鼎《再送曾复斋师》一诗：

夫子何为者，栖栖又出门。一官殊未热，吾道颇称尊。
旧业留书卷，离情伴酒樽。他年趋讲席，文字定重论。

结语：

刘氏的温籍门生，除了潘宗耀、董廷对、郑之良一度进入低阶官僚队伍，其余几人与仕途几属无缘。

时运不济之事，常有！就如左思在《咏史》中所言：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
世胄躐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
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不知当年的他们，可曾有“尚能饭否”之叹，“徒生髀肉”之叹，或者“拍遍栏干无人会登临意”之叹！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没有屈于命运的安排，而是在时空坐标里划出了一道闪亮的轨迹，用诗文为自己留下一份从容的人生答卷……

符丕盛教授的赤子之心

施菲菲

“黄埔军校”在风云跌宕的民国历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而“黄埔军人”则是有一定神秘感的特殊群体。耄耋之年的符丕盛先生，其身上“教授”和“黄埔”的标签，让人更有“特殊群体”中的特例之感。

符丕盛教授是黄埔军校第22期学员。作为温州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的他，在过去的20多年中，每天骑着自行车从信河街到黎明路上班。

符丕盛的经历，与他那些出生入死、历经血雨腥风的同学相比，实在算不上“坎坷”。1997年在北京参加全国黄埔军校第二次会员代表会议，与他分在同一个讨论组的北京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曾有民国时期将军军衔的李默庵说：“在我们黄埔同学中，你是幸运者，你是无意识地抓住了机遇，让“重在表现”的政策在你身上生效。为你庆幸哦！”

报考黄埔军校

1925年，符丕盛出生在辽宁盖州一个乡村。祖父是给地主家赶大车的。父亲成年后，在镇上的大石桥作搬运工。因为逃债，后来移居到海边的熊岳镇，靠挑担沿街叫卖海鲜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家境贫寒的符丕盛11岁才上小学，当时的东北被日本侵略者占领，学校把日文列为主课，他

们千方百计地对学生进行奴化教育。到了小学五年级时，家里再也没钱供他读书，便辍学到抚顺市一家药店当学徒。

从“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抗战胜利，日本人一直强占东北三省。那时的符丕盛虽然年纪小，但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怒火一直在他心中燃烧。当学徒的几年中，他坚持自学文化，还利用晚上时间上夜校，梦想有朝一日考上军校，成为一名像当时中那些英勇的中国军人一样，为抗日救国出力，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抗战胜利，符家家境稍有好转。凭着自学的文化底子，符丕盛考上沈阳国立第三高中。毕竟没读过初中，赶功课很吃力，很担心自己难以考上大学。再说日本投降，国军部队浩浩荡荡开进沈阳，接收东北各大城市。看到中国人自己的军队武器精良，战士服装整齐，英姿飒爽，那种浩气与威武，让差点当了亡国奴的东北人是多么地扬眉吐气。这种激动人心的场面定格在了符丕盛的脑海里，更坚定了他要当一名军人的念头。

1947年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在沈阳招生，符丕盛为了穿上那身威武的军装，成为一名保家卫国的军人，义无反顾地去报考，当时他并不知道此校就是赫赫有名的黄埔军校。

录取后，符丕盛在葫芦岛码头坐上军舰到达上海，从上海换船到成都。要在成都双流训练六个月，才能成为正式的军校学生。

黄埔军校分有步兵、骑兵、炮兵、辎重兵等科类。因为身材高大，熊腰虎背，符丕盛被分列在辎重兵科。

当时内战已开始，物资匮乏，军校生活很艰苦，训练却非常严格，不管怎么寒冷，军号一响就得起床训练。夜间，经常搞紧急集合，学生们扛着枪炮，穿着草鞋爬山涉水，宿草丛，吃干粮。因为国难当头，大家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

本来学制四年，因为局势变化，只学了两年，1949年上半年提前毕业了，符丕盛被分配到浙江衢州第六编练处。

当时家里来信说东北已经解放了，符丕盛很想家，急着回家，他不再

想当少年时梦寐以求的威武军人了。他与三位同学一起约定，离开了学校。到了柳州，符丕盛的行李箱丢了，里面放着所有的衣物和证件。同行的邓达同学，老家在江西进贤县，邓家暂时收留了他。

兵荒马乱，交通阻塞，没有路费，寄人篱下，那感觉是很纠结的，尽管邓家对他很客气。后来收到哥哥的来信，说北平已经和平解放，他在天津做生意。符丕盛决定北上找哥哥。

符丕盛一直庆幸自己当时的选择，庆幸自己离开军队，没有参加内战，成为一介平民。

从辅仁大学到北京师大

在哥哥支持下，符丕盛在北京报考大学。当时有两所学院录取了他。一是朝阳法学院，一是辅仁大学。符丕盛选择了辅仁大学教育专业。时在1949年。

入辅仁大学后，符丕盛给自己立下座右铭：少说话，多做事，把教育专业的功课学好。虽然是“黄埔军校毕业生”，但没上过战场，更没放过一枪，是一个清清白白的学生。他要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对新中国的热爱和忠诚，要为祖国的富强贡献青春。他相信政府“重在表现”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万物复兴，尤其是提高国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成为当务之急。一位比符丕盛高一年级的学长王振家（他是北平地下党，后来由于他的帮助，才使符丕盛顺利读上教育学研究生）找他商量，说他们在鼓楼办了一所工人夜校，很需要教师，问符丕盛能否参加工人文化补习班的工作，到那里兼课。有如此为工人老大哥服务的好机会，符丕盛当然一口答应下来。

在辅仁大学，符丕盛是所在班的班长，后来选为系学生会主席。于是他请来几位同学，每天带着他们到离学校很远的鼓楼夜校上课。他们风里来雨里去，坚持工作了半年。大学生们给工人上课，社会反响很好，工人

老大哥常常表扬他们，那位王姓同学更是满意得不得了。

不久，北京西城区教育局决定为失学儿童办补习学校，区领导了解了辅仁大学学生在鼓楼夜校上课的情况后，要符丕盛去筹办这个儿童补习学校并兼任校长。符丕盛又利用课余时间承担起这项艰难的社会工作并召集辅仁大学部分学生充当教员。补习学校有400多名在旧社会中失学的孩子，要根据这些孩子不同文化程度，给他们编班，因材施教，让他们在半年内学到他们这个年龄段应该具有的文化水平，然后送到全日制学校接受正规教育。

那段时间确实是“激情燃烧的岁月”，符丕盛和他的同学克服了重重困难，以极高的热情投入这项“提高国民文化水平”的活动中，辛苦的付出，出色的工作，得到各级领导的认可与赞赏。辅仁大学更是给符丕盛“群众教育”这门功课罕见的满分。

后来成为符丕盛夫人的刘好兰，也是在这段时间与他相恋的。他们是同班同学，在给夜校上课、给失学儿童补课的社会活动中走得更近而更相知。1954年，他们在天津结婚，哥哥将自己一间房子给他们作婚房，两人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1952年，实行“高等院校院系调整”，辅仁大学教育系并到北师大教育系，符丕盛和刘好兰都转到北师大继续学习。

符丕盛说：“1953年，本科毕业，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等待上级的分配。我生怕我的‘黄埔经历’会给我的分配蒙上阴影。当分配告示贴出来，我与刘好兰却找不到自己的名字。出乎意料的是学校决定我们俩人留校继续深造，就读刚刚筹办的‘研究生院’。我攻读心理学专业，刘好兰攻读教育学专业。”

当同学们以羡慕的眼光看着他们时，符丕盛心里明白，是因为“重在表现”的好政策惠及他们，积极的表现抵消了那“黄埔身份”带来的阴影。

1955年，符丕盛从北师大心理教育系研究生毕业，并获硕士学位。他和刘好兰又出乎意料地被分配到上海师院（大部份同学分配到东北、西北）。

临行时，北师大人事处干部找他谈话，说：“你在校学习成绩不错，政治表现也很好，对你的政历问题，组织上给你下的结论是‘一般政治问题’，你不必顾虑，党的政策是‘重在表现’。只要好好工作，你一定能干出成绩。”

在那么多的“黄埔人”之中，符丕盛算是一名幸运者，特别是后来当他听到他的诸多同学所经受的磨难！

在上海师院，学校分配给他们一套房子，符丕盛把东北的父母接过来一起生活。大女儿在北京出生，叫燕燕；二女儿在上海出生，叫申申。

任教温师院并评上教授

1958年，温州师专升级为“温师院”。符丕盛与刘好兰等9名同事，作为骨干教师调到温州支援“温师院”建设。此后一直在该校工作，整整工作40年。也是在温师院，他评上心理学教授。1998年，他从温师院退休。

刚到温州时，那时的温师专条件很艰苦。在上海师院，他的月工资是82元，到了温州，因为“地差”原因，只能领到72元。当时，他们一家六口住在学校大礼堂楼上西边的化妆间里，夏天蚊子嗡嗡，冬天北风呼呼。没有马桶，要到公共厕所解决内急……

在师院，符丕盛教心理学，刘好兰教教育学，他的讲课很受学生欢迎。

1964年，温师院撤消，改为“温州地区教育函授站”。没有了全日制上课的学生，符丕盛改做“教学调研工作”，到温州地区的农村、山区农业中学调研教学情况。他们常常背着行李，跋山涉水到偏远的山区去。没有车，没有公路，走田间小路、崎岖山路是家常便饭。

文化大革命中，学校调符丕盛到校办工厂，负责材料供应工作。不懂机械、不懂经营的他，只能服从安排。他东奔西走，常常自己掏钱买香烟、招待客户吃饭。那些紧缺的物资，如椴木、电解铜、铝锭等，都被他采购过来。由于符丕盛的成功运作，解决了校办厂的燃眉之急，厂长惊喜不已。

“经济大清查”时，厂里账目经过梳理，符丕盛一清二白。但是，在

文化大革命中也出现过几次“惊险”。比如，师院开运动会，因为符丕盛的嗓门大，安排他当“司令员”，喊起跑的口令。他说凡是单位的安排，都会服从，并且很认真地去完成，因此得到领导的表扬。有人便贴出大字报，说一个国民党的兵有什么权力来给工农兵学员“发号司令”。

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符丕盛和家人战战兢兢地过着日子，尤其妻子刘好兰，每当政治风云卷起时，她会日夜担忧，生怕哪天飞来横祸。

坚守会长岗位二十多年

1995年，温州黄埔军校同学会换届。由老会长卓力文先生推荐，符丕盛选为温州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2004年，又当选为浙江省第三届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

任职以来，每年几次的政策学习会，外地来温交流的接待事务，周年庆、传统节日的慰问工作以及给海内外黄埔军校同学发新年贺卡等等，符丕盛做得井井有条不留遗憾。他还担任过一届的温州市人大代表、一届浙江省政协委员，蝉联五届政协温州市委会常委。哪怕年逾九十，还依旧认真地为建言献策忙碌。

有人问他，都90多岁了，为什么每天还从信河街的寓所骑车到黎明路的同学会会所上班？他答，因为他心系祖国和平统一大业，要认真贯彻黄埔军校同学会“发扬黄埔精神，联系同学感情，促进祖国和平统一，致力振兴中华”的宗旨，为圆中国梦尽一片赤子之心。“在有生之年，不遗余力地把这些还需要我做的社会工作一样一样做好，不负重托。”

金学兰先生事略

林正华

金学兰，生于1924年5月2日，鹿城区藤桥镇垟岸村人。1941年秋，考取黄埔军校三分校（江西瑞金）。半年后正式进入18期17总队。接受两年半正规训练，于1944年夏毕业。

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国军88军新编21师浙江丽水碧湖军部作战参谋处。三个月后，到师部副官处从事运输、调度等后勤工作。

1944年深秋，日寇千余人从金华南下，妄图侵占温州。21师63团在丽水保卫战中被其击溃，团长阵亡。日寇长驱直入，经青田，过外垟山洲岭，到藤桥，翻过天长岭，于1944年9月9日侵占了温州。这是温州第三次沦陷。

国军21师的61团和62团原驻在永康县和缙云县郊区一带。21师师长罗军通奉命率两团南下追击日寇。师部路过藤桥时，正值金学兰到师部报到。次日，金学兰随师部进驻瞿溪潘鉴宗庄园。

当21师南下追击日寇，路过藤桥时，62团团部驻藤桥后垟村，某连连长因腿有恙，行走不便，要乡长周灵云派民夫用桥抬他，周没有照办，连长怨恨在心。后因周向某士兵私卖5粒子弹，被该连长发觉，他就以此为理由将周扣押。藤桥地方乡绅纷纷出面请求保释，连长不允所求。尔后，乡亲们知道金学兰在师部当差办事，要他去设法营救。乡情难却，金学兰即向师长求情释放，终得应允。

62团从藤桥开往瞿溪时抓了当地四五十个老百姓挑东西，到了瞿溪仍没有放他们回去。金学兰凭着在副官处工作之便，向副官处主任求情说项，批了一张条子，说这四五十名挑夫要再去藤桥挑运，沿途不得阻拦云云，因而使他们都能顺利地返回家中。

日寇侵占温州城的第二天，61团、62团师部直属部队已先后到达温州郊区，分驻双岭和三溪娄桥、任桥一带，师部也从瞿溪迁到娄桥河边一座旧庙中。上峰命令部队一定要收复温州，派了副司令陈沛到师部协作指挥。此时日寇占据西郊莲花心山头，师部从望远镜里看到日寇在莲花心只有一般的迫击炮，没有重炮，人数也不多。9月11日，部队向莲花心的日寇发起攻击，还派四架飞机轰炸日寇阵地，又用重炮轰击敌阵，但日寇躲在壕沟内，连续攻了六天，才攻破日寇占领的制高点，但当天夜间日寇又集中兵力进行反扑，又不得不放弃莲花心。这一战打得异常激烈，部队死伤427人。温州终未收复，21师撤回丽水、永康，缙云一带整训。

1945年初，金学兰被任命为61团三营七连三排排长，并担负教官任务，指导连队操演。整训搞了半年后，部队开到乐清，当时驻温州的日寇向乐清芙蓉镇转移，部队与日寇遭遇，打了一战，互有死伤。部队继续开拔到永嘉一带。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军队开始进城接收日军武器弹药等。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队就转向反共打内战的邪路上去了。金学兰这支部队结果在山东金乡县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靠空运物资度日。过了一段日子，解了围，部队又回到徐州。此时，金学兰看到国民党军队十分腐败，末日将要来临。一次，金学兰借口有病住进后方陆军22医院，一住就是两年多。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后，22医院溃逃撤离到广东韶关，准备退至台湾。不愿去台湾的可发遣散费回家。金学兰毅然选择了回家之路。

解放后，金学兰先生利用本地丰富的花岗石资源创办了“温州市藤桥

採石厂”（即现时的“温州市鹿藤花岗石厂”），并亲任供销员，后当选为厂长直至退休。其间他凭借个人能力从上海购来水泥、钢筋及电灯柱，帮助本村成功建造了水泥大桥、装起了电灯。

退休后，金学兰先生推选为村老人协会会长，他热衷于公益事业，发挥余热，继续牵头为村里建成老人亭、公墓、水泥路等。

金老先生于1910年2月因病逝世，享年八十晋六。



草鞋 蔡榆摄

资料来源“鹿城档案网”

塘河：诗之河

陈 俊

谢灵运，乘船经南塘到仙岩游山寻景，吟诗流芳……此后，多少墨客文人名流贤达，追寻谢公履痕屐印，沿塘河而下，听松看荷，观瀑问禅。

塘河，这川流不息的河，由此也成为了诗之河。

塘河因其便利的交通和优美的郊野环境，自唐代起就吸引了无数饱学之士和殷实之户在此定居，或在这里留下足迹——王羲之赏荷之旅，令塘河名声大噪；谢灵运以“泽兰渐被径，芙蓉始发池”之句，让今天的塘河畔白鹿洲公园拥有余光中先生题字的“山水诗发祥地温州”碑。

南宋“永嘉四灵”名闻诗坛，与永嘉学派一样，是温州留名历史长河的底气。永嘉四灵曾留下许多泛舟塘河的诗篇，其中与咏荷有关的就有徐照：莲枯收绣段，松静发琴声；徐玠：水乡菱藕熟，晴野稻苗新；翁卷：晚来渔唱起，处处藕花新；赵师秀：岩竹倒添秋水碧，渚莲平接夕阳红。四灵中写得最好的一首诗《约客》，就是赵师秀寓居南塘时的不朽之作：“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因雨而爽约的客人，也大概是常在塘河边聚会的诗友吧。

翻开温州古城地图，沿着塘河有一条古驿道，上有一条旧时南向出入温州府城的必经之路——山前街，这条路南起原茶院寺，向西转北至卖麻桥，并有川流不息的山前河相伴，留有大量的古先贤诗词的巽山就坐落在这条路上。

而在这条山河相伴出入府城的必经之路上，坐落着一家书院——南湖书院，号称“永嘉学派思想启蒙地”，永嘉学派前后三代领军人物薛季宣、陈傅良和叶适都曾集聚此地。因地处温州城南，在山前街茶院寺附近，又俗称南湖塾、城南茶院或城南讲院。南湖书院在历史上对温州文化崛起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正是因为受到薛季宣的教导和影响，才有了陈傅良仙岩悟学和叶适成为永嘉学派集大成者之可能。

叶适与陈傅良的成长经历很相似，同为瑞安人，父亲同是乡里塾师，家世皆穷苦，都靠着良好的天赋，通过努力奋斗，成为饱读之才。少年的叶适也与普通孩子一样喜欢嬉戏，十二三岁时随父迁居温州。除了外出游学应举做官，从结婚生子到奉祠终老，他大半生的活动踪迹在温州市区。叶适先生对温州塘河更是情有独钟。

嘉定元年（1208），他落职回乡居温州城区西南郊水心村。该村西倚西山，三面环会昌湖，风光优美。有诗云：

面对吴桥港，西山第一家。
有林皆橘树，无水不荷花。
竹下晴垂钓，松间雨试茶。
更瞻东桂彩，空翠杂朝霞。

栖息这片清静的河网湿地，叶适终于可以一心著述，完成 50 卷代表作《习学记言序目》，集永嘉学派之大成。写作之余，举目即景，“十里

沧浪绝岸遥，幽人行处有谁招。幸无车马妨来往，买断寒蔬取意挑”（《建会昌桥》）。而不远处，会湖畔著名的思远楼一直是钟爱的雅集地点，令他诗兴屡发，写下《端午行》《后端午行》《永嘉端午行》《端午思远楼小集》《雪后思远楼晓望》。



可以想象，诗人乘坐在小船里，船老大悠闲地一桨一桨划过去，船儿在塘河里慢悠悠地前进着。推开船上的竹篷，好像在屋里推窗，舒目远望塘河两岸山色风景。小小的船儿，仿佛在两旁清翠的座座山峰间缓缓行驶。

二

我们随着那一叶小舟，来到城外塘河水乡的南湖村。那里有一座味道公祠，纪念南宋叶味道。

明嘉靖《永嘉县志》：乡贤祠在庙门外，右祀叶适、叶味道等 56 位乡贤。清光绪十一年（1885）翰林院侍讲孙衣言撰《朝议大夫叶君墓志铭》，称：“龙泉叶氏，自宋时来居吾州者，有两族。曰吏部侍郎文定公适，为水心族；曰秘书著作佐郎文修公味道，为南湖族。”叶味道也是塘河人，长叶适一辈。

叶味道是南宋著名理学家、政论家，人称溪山先生，是一代理学宗师朱熹晚年主要弟子，也是程朱理学的重要传播者之一。叶味道少年时喜研读经解史论。淳熙八年（1181）奉父命，师事朱熹，定居建阳莒口后山，在后山建溪山书院讲学。他做过朝廷官员，当过皇帝讲师，撰有很多著作。

对于南湖村的叶氏族人来说，叶味道就是他们的先祖。他们曾为探寻先祖资料，多次深入市图查阅方志，并到松阳、龙泉、丽水、青田等地寻

找资料，搜集之难，实出常人之想象。村民说，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在南湖村，都很习惯说自己是叶味道的后裔。虽然现在村子没了，但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不能丢。2018年，由于南湖新城的建设，味道公祠被拆了，村民们四处奔走以求保护，但重建的事至今还是没有下文。

叶味道的著作论述、学识见解和人格魅力，是留给后代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东瓯诗存》（卷七）录有一首七言绝句：

照胆台

一水磨铜镜面寒，人心蔽锢可谁观。
诸君顾影清潭里，私曲分明见肺肝。

南宋时温州有“三叶”：叶味道、叶任道、叶采，一家三人都是名儒。不仅是塘河人的光荣，也是温州人的骄傲，在温州文化上有一席之地，应该有供子孙后代祭祀的祠堂。

三

南白象霞坊村。塘河边有一座小山，名叫嶂屿山，山上有座庙，庙前石室，相传宋乾道二年，温州大水，惠民王神功灵著。平后，土人抔沙作塑以祀之。洞门刊有“仙源曾玩喜舍重建”八字。所称“仙源”，系塘河东一带南仙垌地名。门前“嶂屿钟灵”四擘窠书，今重整如昨。

霞坊村的叶氏祠堂就在嶂屿山下，面朝温瑞塘河，门前两颗繁盛的榕树，后面是个水塘。祠堂前还有一排旗杆石，上面写着“同治癸酉科举人”，这里说的举人就是叶芝寿，字萼仙，号鹤仙，霞坊村人。同治四年举人（编注：此二处年份有误。据光绪《永嘉县志》，为同治元年补行辛酉壬戌科举人），有《鹤仙遗稿》藏温州市图书馆古籍部。名列光绪《永嘉县志》“分司采访”

一栏，官至户部湖广司员外郎。其中一首：嶂山纪事绝句四则并引（光绪二年丙子清明前五日作）云：

名山石室迹犹存，故老传闻宋纪元。

洞府劫灰都化黑，人间何处是仙源？

霞坊叶氏，他们和邻近的西象村叶氏和茶山叶氏都是宗亲。西象村整个村早就拆了，霞坊村也已拆得差不多了，祠堂的去留至今悬而未决。

四

听说城南横渎村有叶适祠，遂前往寻找，却荡然无存，只有一片高楼大厦。

瑞安的叶氏宗亲并未忘怀这位迁走的先祖，不但设立叶文定祠，还建起叶适纪念馆，以示其根在瑞安。叶文定祠临河而筑，叶适纪念馆跨河而建，整体为单层四合院式，朱门金字匾，小腿高的红色铁门槛，两进五开间，静谧整洁，保存尚好。门口河畔，郁郁葱葱生长着一株267岁的“风水树”——无柄小叶榕，枝繁叶茂，2004年被台风连根拔起，打倒在地，经热心民众抢救，竟奇迹般挺立重生。

百年古木，百年祠堂，千年塘河边相依共存。

南塘百年“番人馆”

徐贤林

坐落市区南塘的番人馆，曾经是那里的地标性建筑群，老一辈市民对这些西洋建筑都耳熟能详。我与番人馆的老住民梅觉民先生一起探访了这个有点传奇色彩的西洋建筑群——

番人馆被高层新建筑物挡住了视野，在市区锦绣路上发现它还真有点困难。我们拐入茶院寺路，透过一堵简陋的围墙隐隐看到了番人馆的真容。围墙上设了两扇铁门，闪着，敲了一下门，房里有应声，一中年妇女出来为我们开门，并询问我们是不是这个地块的业主，因为近段时间经常有人上门看番人馆，仿佛这里还有什么西洋景似的。中年妇女放我们进去后就回房顾自干活了，我们在番人馆里自由地转悠。

三幢美式楼房坐北朝南纵向建造，除了中间一幢被后人搭建了一些建筑物外，整体布局还很完整。楼房的主体是三层结构，砖是中华最传统的秦砖，目前房顶盖的瓦也是最传统的汉瓦，西式的圆拱窗和非常独特的壁炉烟囱凸显出这些建筑物的个性。楼房几成正方形，卧砌青砖，窗台石是凿工精细的条石，外墙不加粉饰，显现出一种朴素美，窗户设置非常讲究，在采光上可谓达到极致，这三幢楼房各自独立为微形城堡，历经百年风雨岿然不动。近距离视野里，楼房并不雄伟却有特色。该是原先这里地标性建筑物吧？

我们绕着番人馆走了数圈。我推测，番人馆的布局原先应该是个相对独立的环境，以三幢建筑物为核心将周边的空地围起来，植上有特色的美国植物，设置有美国特色的游玩设施，当夕阳西下时，懂得享受生活的美国人在花园般的环境里怡然地散步交谈。这一猜测从古稀老人梅觉民处得到印证：这些空地上原先确实栽植着许许多多美国植物。三株高大的樟树，形成一个三角阵形。如今，其中一棵被列为古树名木，树根部立着一块石碑。

番人馆的北首紧邻龟湖，龟湖在这里明显变得宽敞了，在湖中凸出的市少艺校无形之中成为参照物：在龟湖原状的时候，此处湖段应该是非常漂亮的。番人馆的西侧也是湖道，设了一个陡门闸，也许是龟湖连接南塘河的节点。

我们走进番人馆建筑内部。南首这幢房子的楼梯已被改装过，是条简易铁制梯子，楼上的房间被隔成格子房，从散落在楼板上的杂物可以看出，这里曾是工人的宿舍，壁炉烟囱早已成为摆设，有几处楼板已被人为撬掉，我看到密密麻麻码放的楼札条，感叹前人在建筑时的严谨态度，二楼到三楼是木质楼梯，楼梯做工精细，踩在其上，依旧能感受到一种扎实与可靠。

站在临河的阳台上，透过葱茏的树木是隐隐绰绰的建筑物和车流人流，俯视已经变黑变臭的河道，我在想：百年前的这个位置上，一位美国小伙子或者姑娘，他（她）看到的到底是什么样的风景？是一只进城的小舢板？还是提着竹篮在田埂上穿行的姑娘？

中间的这幢楼相对完整一点，只是一楼被严重熏黑。北首的这幢楼房的楼梯已被拆移，大门上贴着一家电子仪器厂的封条。

梅觉民深情地说，南塘番人馆定格了他的全部童年。梅觉民对南塘番人馆有着极深的情结，说起往事激动不已。

温州解放后，梅觉民一家便搬进番人馆居住，他当时还只有7岁，他们一家住在南首的楼房里，其他两幢由另外两家人居住。当时的番人馆就是花园式别墅，园内绿化优美，整幢楼房被一种叫做“爬山虎”的藤蔓覆盖着，走进番人馆恍若走进童话世界里。梅觉民的童年悄然在这里度过。

大他4岁的大哥梅坤平放学后就领着他们在花园里玩耍捉迷藏，诱捕小动物……

当年，这里栽植几十种梅觉民从没见过的植物，父亲告诉他这些植物是从美国本土引过来的，种在温州的土地上倒也适应。月季是美国月季，核桃是美国核桃，柠檬是美国柠檬。有些植物挂果以后，便每天牵扯着梅觉民和小伙伴们的心，希望这些果实快快成熟。秋风起了，树叶泛黄了，一些果实也终于在他们期盼中成熟了。打核桃是番人馆里最为热闹的日子，大人爬上高高的核桃树，手持长长的竹竿敲打挂在枝头的核桃，孩子们则在树下雀跃着拾核桃，他们将核桃盛在一只箩筐里，事后三户人家均分。他为什么对采摘核桃记忆如此深刻？因为这是一种特别的核桃，国产的核桃是圆形的，而番人馆里的核桃却是长形的。如果番人馆里的植物被完好保存下来，简直就可以当成一个异域植物博物院。花园里还栽培着多种奇花异草，不过因为他当时年幼已记不得具体的名字。

对梅觉民来说，番人馆里有太多神秘的东西，每幢楼房都修建了一个配套的沼气池和一个蓄水池。沼气池消化生活垃圾，而蓄水池提供生活用水。蓄水池较大较深，以便于接收雨水，手工水泵令梅觉民至今难忘，将地上蓄水池里的水压上楼顶的蓄水塔就通过这台古朴简易的手工水泵。梅觉民望着大人们每天压水甚感有趣，私下里与伙伴们试着压水，却无法压上水。这需要力气的。梅觉民说，美国佬当时就想到建沼气池消化生活垃圾其环保意识令人敬佩。

番人馆的室内设置考虑得极为周到。梅觉民特别难忘玻璃房，在房子的西面修了一座玻璃房，玻璃房设有躺椅和秋千架，每到冬天，他就在玻璃房里享受暖暖的阳光，荡几回秋千，那可是非常惬意的生活啊。楼房的窗门设置成三重，外面是百叶窗，可以调节光线，中间层是纱窗，阻挡蚊蝇，最里边是玻璃窗。小船般的足有2米长的浴缸、乌黑锃亮的壁炉、铁制烤炉等等，这些老物件无不一一烙进梅觉民的记忆深处。

番人馆三面环水，南面置一对铁皮门，门一拉开便是繁华的南塘街，

门一闭上便将番人馆与外界隔绝开来。梅觉民有说不完的有关水的故事。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温州，是一座货真价实的水城，城内河汉遍布，小桥随处可见，水上交通非常发达，在城南小学就读的梅觉民，经常乘坐小船上学。如今废弃了的河道，令他颇多感慨。龟湖里涨虾蚬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梅觉民说，涨虾蚬是细慢活，小船拖着足有两丈长的网眼细密的虾蚬网缓缓行进，渔民边驾船边悠然唱着优美动听的渔歌。然而这一切的一切均成为昨日风景了。梅觉民说自己聊起这些与番人馆无关的事物只想说明一点，有些东西一旦消失就永远也无法复原了，包括这三幢番人馆。

梅觉民的大哥梅坤平后来考上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任美术师，担任《海港》《鹿鼎记》等多部电影的美工。梅坤平说，童年借居在南塘番人馆的经历，奠定了他美术取景意向，多部反映水乡生活的场景中无不留下南塘番人馆的印记，撇开番人馆的异域情调，这里就是江南水乡纯美庄园的缩影。梅坤平将自己在南塘番人馆居住记忆写进学术论文，情真意切。

1956年，梅觉民一家和另外两户人家搬出番人馆。此后番人馆多次易主。

梅觉民一有空闲便会骑车来到番人馆寻找儿时旧梦。后来，围栏不见了，那些从美国远道而来的植物不见了，再后来有人在番人馆楼房上加建了一层，将菱形的瓦片置换成现在的传统圆弧瓦片，蓄水池、小船般的浴缸、沼气池以及手工水泵均不见了……值得庆幸的是番人馆的主体建筑并没有伤筋动骨。

南塘番人馆没有被列入“文保”范畴。但其保护价值较大，因为目前温州市保存完整的民初具有美国风格的古建筑仅此一处，这也是美国建筑物在温州的标本，富有研究价值。

自1876年签订屈辱的《烟台条约》后，温州被增辟为口岸城市，于是各怀目的的外国人纷纷来到温州，他们带来西方文化的同时也给温州留下一些有浓郁异域特色的建筑，目前保存比较完整的有江心屿的领事馆等西洋建筑物。

在保护这些较特殊的古建筑方面，温州做得不够，只有列入“文保”范畴才予以重视，而上海等城市则不然，上海殖民文化痕迹明显，西洋古建筑群达数千处，市政府也无力将每处古建筑都列为“文保”，于是出台了一个叫做“历史古建筑”的名词，在这些古建筑的显眼处标上“历史古建筑”以引起人们的注意，因此上海古建筑保护方面很有成效。

据资料显示，南塘番人馆占地6.8亩，建于1919年，供教会神职人员居住，距今逾百年历史，历经战火和自然灾难以及多次易主，主体建筑顽强保存下来，其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应该加强保护。



南塘夜色 蔡榆摄

朱自清在温州

包连续



这座五开间二进合院民居，砖木结构，且有浓郁的晚清民国时期风格。现代散文家、诗人、清华大学教授朱自清先生在温州中学任教时的住所，据说就在这里。推开古朴清幽的大门，就可以看到近 2 米高的朱自清先生的塑像。一张棱角分明清晰俊朗的脸，高高的鼻梁架着一副老式近视镜衬着一丝不苟的头发，很有一种正气凛然且清新脱俗的感觉。小学时代课本里的《绿》，让我第一次认识了朱自清先生，那飘逸且明快的文字一直伴

随着我的成长，于是他在我的心目中就该是我眼前所看到的样子。

朱自清先生祖籍浙江绍兴，1898年出生于江苏连云港。18岁开始就读于北京大学，期间开始发表诗歌、参与“五四”运动，而后陆续发表诸多散文，1932年始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此后，先生完成了由诗人、散文家到学者的蜕变。而我要说的是先生与温州所发生的一些缘分与情怀。

那是在1923年春，大学毕业不久的朱自清，由北京转辗台州，而后经大学同窗、温籍周予同介绍，第一次来到温州，受聘于温州浙江省立第十中学任教（今温州中学前身），于是开始了他与温州的结缘。

时年25岁的朱自清，满怀希望来到温州，他在语文教学和文学创作上都十分的投入。在这期间《月朦胧，鸟朦胧，帘卷海棠红》《白水漈》《生命的价格——七毛钱》还有包括前面我提到的《绿》，合编为《温州的踪迹》问诸于世。

那个时候的朱自清正值青春年少，工作之余当然会与同事好友结伴出游。有文字记载：“1923年秋天，朱自清和马公愚及另外两个朋友一起游仙岩……朱自清坐在亭子上观赏飞花碎玉的瀑布……俯下身察看潭水。马公愚立即制止，对他说这太危险了，便领他攀着乱石，俯身穿过一道石穹门，来到汪汪一碧的潭边。朱自清风趣地说：‘这潭水太好了！我这几年看过不少好山水，哪儿也没有这潭水绿的这么静，这么有活力……掉进去也是痛快的事’。”先生闲暇时一次仙岩梅雨潭之行，给我们留下了美妙绝伦的一篇美文——《绿》。

上个世纪20年代初，正是新旧文化交锋激烈的时刻。朱自清的这一如诗般沁人心脾的现代白话散文，在当时的文坛激起了别样的浪花。

我们不妨一起来领略一下文辞之美。先生笔下梅雨亭“踞在突出的一角的岩石上，上下部空空儿的；仿佛一只苍鹰展着翼翅浮在天宇中一般”一个“踞”字，气势尽出；一个“浮”字，神态毕现：一“踞”一“浮”，化静为动，把凌空而立、翼然石上的梅雨亭写得惟妙惟肖、神采飞扬绘画美。再如先生在描写山间瀑布时，“镶在两条湿湿的黑边儿里的，一带白

而发亮的水便呈现于眼前了。”以一个“镶”字描绘瀑布处在山间的状态，既准确恰切，又形象逼真，使瀑布富于立体感音乐美，《绿》的语言有着鲜明的节奏感和明朗、和谐的旋律，读起来朗朗上口，娓娓动听，能使我们陶醉在美妙的音乐之中，产生“既能悦耳，又可赏心”的审美效果。

这当中，当然还得好好说说那《月朦胧，鸟朦胧，帘卷海棠红》，事情源于先生与温籍国画大师马公愚马孟容昆仲的结缘。当时马孟容也执教省立第十中学，与当时为躲避兵乱来温工作的朱自清先生交情甚笃。马孟容先生精心制作一幅尺多宽的《月夜八哥海棠图》赠送朱自清先生。先生爱不释手，细细品味，整整看了两天，并回赠这《月朦胧、鸟朦胧、帘卷海棠红》散文，恭敬地说：“以文换画，自是文雅之事，只是你的画是传神妙品，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我写的仅得其万一，贻笑大方了。”一时成为文界艺坛的美谈。

您若不忙，可以用心与我一起读读：“试想在圆月朦胧之夜，海棠是这样的妩媚而嫣润；枝头的好鸟为什么却双栖而各梦呢？在这夜深人静的当儿，那高踞着的一只八哥儿，又为何尽撑着眼皮儿不肯睡去呢？他到底等什么来着？”国画的传神，在这里以美妙的文字呈现，这一连串的设问更让你遐想连篇！“舍不得那淡淡的月儿么？舍不得那疏疏的帘儿么？不，不，不，您得到帘下去找，您得向帘中去找找您该找着那卷帘人了？”接下来的一系列反问，问读者？问自己？其实，这问什么答什么，只有朱先生与马先生最清楚了。于是才会有接下来的句子：“他的情韵风怀，原是这样这样的哟！朦胧的岂独月呢；岂独鸟呢？但是，咫尺天涯，教我如何耐得？我拼着千呼万唤；你能够出来么？”哈哈，你看这朱马二位在彼此赞许的同时也不忘相互打趣。

先生在温州朋友不少，如周予同、郑振铎，还有张桐、金蝶轩、陈叔平等，而关系最为密切的应该就是马氏昆仲了。那是1924年九月初，为一家生计，先生独自前往宁波，不久浙江出现军阀混战的局面，温州全城人心惶惶。先生妻小五口全是妇孺，在她们举目无亲身无分文一筹莫展

时，正是马公愚施以援手，邀她们到自己老家永嘉枫林避难。先生得以安全接妻儿离开温州后，特地给仍在永嘉枫林的马公愚写信以示感激之情：“先生于慌乱之际，肯兼顾舍间老少，为之擘画不遗余力，真为今日不可多得



之友生！大德不敢言谢，谨当永志弗谖耳！”

先生此后没有再回温州，但他对温州一往情深，特别是对学生和同事更是情谊绵长。1925年5月，他给马公愚信中写道：“温州之山清水秀，人物隽永，均为弟所心系。”1925年10月，他在清华大学任教后不久，写了一首《我的南方》：“我的南方，我的南方，那儿是山乡水乡！那儿是醉乡梦乡！五年来的彷徨，羽毛般的飞扬！”这当中也可以看出他对南方，当然也包括温州在内的留恋热爱，和那几年思想上的困扰与生活上的窘迫。

作为有血有肉、文笔清新的年轻中学教师，在温州工作的这一年时间，学生们是怎样评价他的呢？

学生朱维之说：“上课时大家都洗耳恭听，又是为他那急促的、怕羞的样子发愁。他常在讲台上红脸，擦汗，我也好像随着他红脸出汗；生怕有些差错，致使那些年岁较大而爱好旧文学的同班生吐露不满之辞。他虽然没有雄辩家的口才，然而始终没有人忍心说他的坏话，因为他的认真、诚恳，感动了全体学生”。

学生陈天伦说：“朱先生来教国文，矮矮的，胖胖的，浓眉平额，白净的四方脸。经常提一个黑皮包，装满了书，不迟到，不早退。管教严，分

数紧，课外还另有作业不能误期，不能敷衍。”天哪，“矮矮的，胖胖的，浓眉平额，白净的四方脸”这颠覆了我从小以来的印象！那“棱角分明清晰俊朗的脸”呢！哪儿去了？其实，您若有心，回想一下先生在《背影》当中他父亲爬上月台的一段描写，你就释然了！文中是这样写的：“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我想啊，体型和相貌应该是可以遗传的！

学生余之介说：“朱先生教课时，课堂气氛非常轻松愉快，如沐春风，他的普通话那么流畅自然，娓娓动听。朱先生批改作业改的甚少，评语都一针见血，恰到好处。”

当然还有马星野、金溟若等学生对朱自清的敬佩和爱戴的诸多评价，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温良恭谦让的气质使先生在学校师生间相处融洽，成了当时学校里的一股新风。

先生在温州工作生活的时间并不长，也就一年稍稍多一点的樣子，热爱生活的朱自清却在不少的地方留下了足迹。近的如带学生去妙果寺看猪头钟，到江心屿看古塔古井，渡江去瓯江北岸游白水漈，坐河轮探访头陀寺，稍远的也就走过永嘉瑞安一些地方。在这连飘叶也多情的瓯江畔，先生还作了小诗《细雨》：“东风里，掠过我脸边，星呀星的细雨，是春天的绒毛呢。”

作别温州后的朱自清，先生很快就转辗到清华大学任中文系教授，乃至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其间《荷塘月色》问世，那淡淡的忧伤，那缕缕清香，还有这隽永的文字伴随着一代又一代清华人的成长。当然，这也让我们这些清华园外的学子一直景仰！

作别先生在温州的旧居。这短短几十分钟的瞻仰，却有了近一个世纪的时空跨越。然，先生已经故去，而先生飘逸俊朗的文字却将隽永人间！

蒲扇，摇有清风消酷暑

王勤福

烈日下的知了，叫得声嘶力竭，似乎哑了喉咙，浓密的绿荫挡不住太阳光的穿透，直抵那薄薄的蝉翼，近乎烤焦的程度。我想，是不是只要它稍微一抖动翅膀，就会有碎了的可能。

赤日炎炎似火烧，公子王孙把扇摇。岂止是公子王孙，农耕时代，用蒲扇生凉驱暑，是人们的首选。那时，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一把蒲扇，轻轻摇动，就可扇走整个夏天的暑热。

母亲一生节俭，只要旧蒲扇还能用，就会被收藏起来。惜物，这是一种美德。记得每年的入伏前后，母亲就会把存放在家里的蒲扇找出来，用清水洗净后，放在阳光下晾晒，晒干之后才让我们使用。有的蒲扇用久了，扇柄处光滑可鉴，色泽深灰，古朴得像古董；有的破损了，母亲就修修补补接着使用；有的扇面破碎了的，用碎布缝补好；有的扇柄断了，就找两根拇指粗的扁枝条，将扇面夹在中间，然后用细绳捆好。有的实在没法修补了，就去买几把新的，新买回的蒲扇视同宝贝，用布条镶边，好看，耐用，又不扎手。

我们一家生活在一间二层的瓦房，屋内如火炉。吃了晚饭后，我与父亲及两个弟弟逃命似的冲出房子，用冰凉的井水先冲洗一下道坦，拿出家里的篾席，摊开，再用井水擦洗一遍。过去乡村的蚊子挺多，挺凶，挺猛，

被叮上一口，就是一个“馒头”，又红又痒。用旧脸盆或破钵盛来秕谷或半干的青草，让其阴燃，隐约闪现着星星点点的暗红光点。浓烟弥漫氤氲在乡村的上空。虽能驱赶蚊子，但也挺呛人的。可蚊子还是防不胜防，不断袭扰，给人一种无比的愤怒。于是，蒲扇拍得噼里啪啦，响成一片。蚊子没打着，自己也许被自己扇疼了。

躺在凉丝丝的篾席上，一边摇着蒲扇，一边仰望天空。只见皓月当空，撒下一地银光，几丝浮云，几颗星星，一颗比一颗璀璨夺目。不远处稻田里的蛙声，与蚩蚩的欢唱声交汇成一曲交响乐，在乡村静谧迷人的夜空久久回响。不时还有萤火虫从眼前飞过，一会儿上一会儿下，一会儿东一会儿西，翩翩起舞，活泼可爱，转眼间就消失在黑魇魇的夜幕之中。

邻居们陆续搬出竹椅、竹床或凳子等，三五成群围在一起，开始夏夜的乘凉。每个人的手里几乎都有一把或新或旧、或大或小的蒲扇。聚拢在一起的男女老少，躺地躺，坐地坐，边摇蒲扇，边谈笑风生。或高谈阔论，或慢声细语，漫无边际地侃着，内容宽泛庞杂：天南地北，古往今来，家长里短，奇闻逸事，神仙鬼怪，唱词戏曲……应有尽有，无所不包。人堆中不时传出阵阵欢声笑语。夏夜的道坦成为乡亲们交流情感、传递信息的场所，处处透着和谐温馨的气氛。

母亲理完家务，也加入乘凉队伍。我们小孩总是偷懒。蒲扇摇久了，手臂酸软，就想不劳而获。倚靠在母亲打扇的迎风面，吹着舒适的风，一会儿就瞌睡迷兮了。母亲顾不上自己打扇凉快，给我们扇着风，还不时猛摇几扇，以此驱赶讨厌的蚊子。多少次半夜醒来，睡眠惺忪中看见母亲还在给我们摇着扇子，轻轻摇着，丝丝凉风在我们脸上轻轻抚摸，像一双温柔的手。我们在清凉的风里渐渐睡去，再次醒来已是明媚的早晨。那时觉得夏天的炎热也是一种温馨，因为有蒲扇的风，会在岁月中的每个夏天，摇动清凉馨香的风。这风里有着浓浓的母爱。

母亲手里的蒲扇，摇过了一个酷夏，摇睡了榕树上的鸣蝉，摇湿了清晨田野上的草尖，摇出了男子汉的责任担当和感恩之情怀。母亲却摇老了。

至今每当遇到挫折或困难时，总是想起母亲摇着蒲扇的温暖臂弯，多想回到那幸福而又无忧无虑的童年。有时候幸福很简单，它与财富物质无关，只要有爱，身处何时何地，都倍感快乐。

“蒲扇”这两个温情的字在华夏的词典里摇曳多姿，芬芳暗涌，巷陌人家的物件，饱含着人间烟火。它带着草木的清香，摇来天地的灵气，分享着自然的恩泽，传承着人间的真挚关爱，继承着上一辈人惜物的美德。

呆惯了空调房，还有谁记得蒲扇呢？蒲扇，是一代人无法忘却的记忆，无法忘怀的经典。

资料来源“鹿城档案地方志网”

鹿城党史著作及资料简介

李岳松

（一）公开出版

《中国共产党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组织史资料（1924.12—1987.12）》

夏必忠主编，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2年12月版，306千字，20×26.8cm。

本书收录了1924年12月至1987年12月间相关组织及沿革、历史事件等以及组织、机构负责人名录。

《中共温州独立支部与国民革命运动（1924—1927）》

张旭主编，中共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温州市鹿城区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6月第1版，344页，330千字，14.2×20cm，18.00元。

本书收录有关中共温州独立支部的历史文献、参考资料、回忆录、人物简介及大事记，系统地反映浙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国民革命运动的历史全貌。

《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在温州城区》

范小微主编，董明副主编，中共温州市鹿城区委党史研究室编，当

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419页，270千字，14.2×20cm，定价：22.00元。

本书记述了解放战争时期在温州城区以城市学生为主要力量的爱国民主运动，涉及反侵略、除内奸、反饥饿、闹米风潮、驱张（宝琛）、反对美军暴行斗争等。较全面地反映第二条战线斗争在温州城区的情况。本书选编了瑞安、平阳、乐清、玉环等地有关史料。

《胡景城文集》

范小微主编，中共温州市鹿城区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1月第2版，341页，231千字，14.2×21cm，定价：28.00元。

本书辑录胡景城同志从1935年至1950年间从事革命活动所撰的作品、报告、宣言、工作总结以及离休后的回忆录和年谱。

《浙南游击队员日记》（杨漠日记、林素菊日记）

杨漠、林素菊著，中共温州市鹿城区委党史研究室编，京华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355页，284千字，14.2×20cm，25.00元。

本书收录杨漠、林素菊两位同志1947年至1949年间在中共浙南特区委员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浙南游击纵队工作时所写日记。

《中共温州市鹿城历史大事记（1983—2003）》

范小微主编，中共温州市鹿城区委党史研究室、鹿城区档案局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247页、146千字，14.4×21cm，定价：20.00元。

该书较全面辑录了1983年至2003年中共温州市鹿城区委、区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军事、外事等方面的重大活动、重大事件。

《泽临风云——藤桥片区游击根据地革命斗争》

李岳松主编，中共温州市鹿城区委党史研究室、中共鹿城区藤桥镇委员会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317页，302千字，17.2×24cm，定价：43.00元。

该书记述了革命先烈于1929年2月至1949年5月在藤桥片区钟山（纸山）——泽临游击革命根据地开展革命斗争的历程。

《日军入侵鹿城暴行纪实》（精装和简装）

李岳松主编、李长飙副主编，中共温州市鹿城区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483页，413千字，17×24.7cm，定价：58.00元。

该书是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抗战损失课题调研成果丛书，B·浙—30。全书是在该课题调研成果经整理建立29卷档案、计305.8万余字的基础上编撰而成，分图片、调研报告、专题调研、档案资料、报刊资料、文献资料、口述资料、大事记和附录。本书全面真实地记录了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军国主义对温州城区犯下的滔天罪行。

《鹿城革命遗址图志》

李岳松著，中共温州市鹿城区委党史研究室，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13年2月第1版，225页，285千字，22×29.3cm，定价：198.00元。

本书为精装。系“十一五”国家重点科研课题——“鹿城区革命遗址普查”工作成果（李岳松主持）。收录本辖区范围内23处革命遗址和11处其它遗址（除个别被拆除外，其余均有纪念建筑物）。时间跨度从1924年中国共产党温州独立支部诞生至2011年。本书分“党的创立与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综合纪念馆园”“副编”“附录”文字简洁精炼，插图精美。

《中共温州市鹿城区委文件选编》·第一辑（1983.9—1986.12）

李岳松主编，中共鹿城区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8月第1版，276页，272千字，17×24cm，定价：45.00元。

本书辑录1983年建立城区批复至1986年12月间中共温州市鹿城区委请示报告、批复、汇报、决定、意见等文件，区委负责人讲话及部分区政府文件。

《鹿城风雨春秋》

李岳松著，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2013年10月第1版，468页，363千字，16.2×23cm，定价：50.00元。有精装和简装两种。

该书为“党史研究人才工程”项目成果。收录自2005年至2012年作

者关于鹿城地方党史研究的部分成果。分“烽火岁月”“莫忘国耻”“党史胜迹”“寻觅先贤”“笔耕思索”等五编和附录。是第一本全面记述鹿城地方党史的精义和地方党委负责人事迹的专著。

浙江大学历史系原主任、博士生导师杨树标作序。

《鹿城建区 30 年纪事 (1984-2014)》

鹿城区档案局(馆)编,主编王剑峰。2014年11月,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390千字。

本书采取编年体、条目式的简略记述,亦间作连贯性的叙述。内容主要包括1984年至2014年间辖区政治、经济、文化、民生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大事、要事、新事,突出区域特色,注重体现“走在前列、争创一流”的成效。

《鹿城革命烈士集》

李岳松主编,中共温州市鹿城区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411页,469千字,17.2×24.6cm,定价:45.00元。分精装和简装两种。

全书比较全面记述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至2014年90余年间,鹿城和全国各地在温州鹿城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英勇拼搏、浴血奋斗的烈士们的主要经历及其不朽事迹。前三篇为123名革命烈士传略,后三篇收录467名烈士简介。

《历程——鹿城建区 30 周年》

张靖主编,李岳松副主编,中共温州市鹿城区委党史研究室编,台海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20千字。

本书采用图文并茂的形式,真实地记录了1984至2014年间鹿城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领域的发展变化,比较全面地展现了鹿城建区30年来改革开放取得的丰硕成果。

《鹿城革命烈士集》(修订本)

李岳松主编,中共温州市鹿城区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12月第2次印刷,424页,482千字,17.2×24.6cm,定价:45.00元。

该书为精装，在原同名书的基础上，新增了林心平等4名烈士；第一版中录入的3名因公牺牲和病故军人，因未被批准为烈士及9名与鹿城无涉的烈士名录予以删去；对个别烈士的出生年月等进行订正、对8名烈士按照本书体例进行调整。修订后的全书沿旧例设六篇，前三篇为125名革命烈士传略。后三篇共收录459名烈士简介。为了便于查阅，分别在第四至第六篇前列出烈士名录；在第362页尾注有参考材料出处；书末有人名索引。

《田塘头风情》

李岳松主编，中共温州市鹿城区委党史研究室编，线装书局，2016年12月第1版，286页，261千字，14×20.7cm，定价：28.00元。

该书为《鹿城党史文化丛书》（第一辑）。收录了近年来部分老同志撰写的与田塘头、白脚坳革命老区村相关的党史、文史、民俗、传统文化等研究文章。分“社区概况”“红色印记”“红色纪念”“革命英烈”“风光揽胜”“民间故事”“农耕文化”“民间习俗”“大事纪要”等专题。是一部集乡村党史、地域文化等多方面内容的综合性文献资料。

《求索——李岳松论文选》

李岳松著，中共温州市鹿城区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年1月第1版，2017年8月第2次印刷，544页，546千字，16.5×23.8cm，定价：118.00元。该书为精装本。

本书为《鹿城党史文化丛书》（第二辑），收录作者自1998年以来在国家、省级刊物发表的党史学术论文42篇，分“党指正道”“党建创新”“经济求实”“文化亮采”“民艺撷珍”等五卷及附录。

全国著名党史专家、全国政协委员、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为本书作序。

《戍浦文存：走进温州藤桥》

李岳松著，沈阳出版社，2020年12月第1版，444页，446千字，16×23cm，定价：89.00元。

该书所录，遴选自作者参加藤桥镇政府工作以来发表的近千篇文章中

与藤桥有关的部分文章，编为七卷，分“人文遗存”“峥嵘岁月”“革命遗址”“藤桥今昔”“风光叠翠”“民俗文化”“人物风采”，书末附索引。较全面记述了藤桥古今人文历史文化，是一部适用于青少年开展爱国爱乡教育的乡土教材。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副巡视员朱健为本书作序，文史学者章方松撰《生命需要多层次的美识》对该书给予较高评价。

《瓯江浪潮——改革开放新时期鹿城党史专题集（一）》

李岳松 主编，中共温州市鹿城区委党史研究室 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20年10月第1版，367页，340千字，17.5×24cm，定价：59.00元。

本集收录中共鹿城区委、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及有关部门单位涉及全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各类文献共计35个专题，比较全面地记述鹿城建区以来的重大改革举措以及带来的发展结果。旨在厘清发展进程，探求发展规律，总结研究历史经验教训，为鹿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二）内部资料

《瓯越英才曾绍文（1917.9—1968.8）》

中共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温州市鹿城区委党史研究室、中共青田县委党史研究室合编，浙内图准字（97）第184号，204千字，1997年11月版，369页，14×20cm。。

本书辑录曾绍文同志从事革命活动以来撰写的文章、讲话、报告以及纪念文章。

《中共温州市鹿城区党史大事记（1919—1949）》

范小微主编，董明执笔，中共温州市鹿城区委党史研究室（编），浙内图准字（2002）第078号，2002年5月，103页，90千字，14.2×20.5cm。

本书记录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永嘉县（主要在城区）党、政、军、群组织的重要活动，以及红十三军、浙江省委和浙南特委在温州城区的主要

活动和重大历史事件。

《中国共产党温州市鹿城区历次代表大会文件选编》·第一辑 (1984.6—2006.12)

范小微主编，李岳松副主编，中共温州市鹿城区委党史研究室编，2007年4月；浙内图准字[2009]温2号，2009年3月。457页，343千字，14×20.5cm。

本书选编了中国共产党温州市鹿城区第一次至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文件资料。主要内容有：代表大会开幕词，区委和区纪委的工作报告，区委和区纪委委员、候补委员、常委、书记、副书记名单；出席温州市党代会代表、候补代表名单；大会主席团成员名单、代表名单等。

《鹿城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论文集》

李岳松主编，中共温州市鹿城区委党史研究室（编），（浙内图准字[2009]温1号），2008年12月编，2009年3月印，244页，274千字，17×24.4cm。

本书分“论文选辑”和“附录”两部分。“论文选辑”部分，收录中共温州市鹿城区委党史研究室和鹿城区文联举办的“鹿城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征文”入选论文28篇。“附录”部分收录有关论文征文函、征文选题、征文评审结果通报等文件资料。

《践行与思索——鹿城纪念建党90周年党史学术论文集》

郑坚、李岳松主编，中共温州市鹿城区委党史研究室，浙内图准字[2011]第137号，2011年9月，292页，267千字，17×24cm。

本书收录为纪念建党90周年而向社会公开征集并获奖的论文30余篇。这些论文比较全面地论述了温州及鹿城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党建、廉政、企业和社会等各个方面工作的经验教训、创业历程、工作探讨等。

《回顾探索廿五年·1987至2012鹿城党史研究》

李岳松主编，中共温州市鹿城区委党史研究室（编），浙内图准字[2012]12号，2013年3月，202页，234千字，17.1×24.2cm。

本书分“综述”“党史宣传教育活动”“党史征编研究成果”“革命

遗址普查与抗战损失调研”“党史档案图书集征与管理”“大事记”纪念文选等专题和附录，全面地再现了区委党史研究室成立25年来的发展历程。书前收录离休干部等题词篆刻13幅、党史工作活动图片45幅。书中“编研成果”体现于：编辑出版14部党史研究成果文集；编发《鹿城党史通讯》《鹿城党史》期刊36期，20多篇论文获得国家、省、市奖。

《中共温州市鹿城区委文件选编》·第二辑（1987.1—1989.12）

李岳松主编，中共温州市鹿城区委党史研究室（编），浙内图准字[2013]第88号，2013年12月，322页，361.22千字，16.8×24cm。

本辑收录1987年1月至1989年12月中共温州市鹿城区委的报告、请示、规定、意见、方案、纪要等文件；并辑录部分区政府文件为附编一；辑录部分区领导单独印发的报告、讲话等附编二。

《中共温州市鹿城区委文件选编》·第三辑（1990.1—1992.12）

李岳松主编，中共温州市鹿城区委党史研究室（编），2014年12月，273页，289千字，17.2×24cm。

本辑收录1990年1月至1992年12月间中共温州市鹿城区委、区政府的决定、报告、规划、规定、意见、讲话、总结、通报、纪要等文件。并以部分区政府文件为附编一，以部分区委领导的讲话等为附编二，共45件。

《中共温州市鹿城区委文件选编》·第四辑（1993.1—1997.12）

李岳松主编，中共温州市鹿城区委党史研究室（编），浙新广局许可准字[2015]第362号，2015年11月，382页，425.4千字，17.6×24.3cm。

本辑收录1993年1月至1997年12月中共温州市鹿城区委的报告、通报、意见、方案等文件和区委负责人讲话稿；另有部分区政府文件。全书共计文献52篇。

《中共温州市鹿城区委文件选编》·第五辑（1998.1—2002.12）

李岳松主编，中共温州市鹿城区委党史研究室、温州市鹿城区档案馆（编），准印证号（浙）1505496，2016年12月，595页，646.6千字，

17.5×24.2cm。

本辑收录1998年1月至2002年12月中温州市鹿城区委、区政府报告、通报、规划、纲要、意见、方案等文件和区委、区政府负责人讲话稿共72篇。

《温州市鹿城区委区政府文件选编》·第六辑（2003.1—2006.10）

李岳松主编，温州市鹿城区档案馆、中共温州市鹿城区委党史研究室（编），准印证号（浙）2509515，2019年10月，429页，441千字，17.1×24cm。

本辑收录2003年1月至2006年10月，中共温州市鹿城区委、区政府报告、请示、批示、规划、实施意见、实施方案等文件和区委、区政府负责人讲话稿共58篇。

《温州市鹿城区委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七辑（2007.3—2011.12）

李岳松主编，温州市鹿城区档案馆、中共温州市鹿城区委党史研究室，浙内图准字【2020】第C006号，2021年5月，361页，353千字，17×24cm。

本辑收录自2007年3月至2011年12月期间的区委、区政府部分重要文件。区委部分主要有实施意见，实施方案，报告，通报，通知，讲话摘要等；区政府部主要部分有工作规则，讲话摘要，讲话要点等。

《温州市鹿城区大事记（1984—1993）》

夏必忠主编，中共温州市鹿城区委党史研究室（编），1994年1月，100千字。

本书采用编年体，主要记述1984年至1993年鹿城区各级党委、政府，各部门单位及群众组织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事件、重大活动。

《温州市鹿城区党建研究成果选编（1984—2019）》上下册

张靖主编、王剑峰副主编、李岳松、徐孝平等执行编辑，温州市鹿城区档案馆、中共温州市鹿城区委党史研究室（编），2019年11月，上册302页、下册322页，539千字，17×24cm。

本书收录自1984年鹿城区成立以来至2019年间发表的一批富有思想

性、建设性与指导性的鹿城党建（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党风廉政建设）文章，与党员教育等有关的领导讲话，学术论文、调研报告等重要文献。上下册各 34 篇。这些文献是研究中国共产党鹿城历史具有较高参考价值的史料。

《温州市鹿城区委区政府文件选编》·第八辑（2011.12—2015.8）

朱如明主编，王剑峰副主编，李岳松特邀编辑，温州市鹿城区档案馆、中共温州市鹿城区委党史研究室，2021 年 10 月，434 页，445 千字，17×24cm。

本辑收录鹿城区第六次党代会期间（自 2011 年 12 月至 2015 年 8 月）的区委、区政府部分重要文件。区委部分主要有决定、议事规则、实施意见、工作方案、报告、通知、领导讲话摘要等，区政府部主要部分有规划、报告、领导讲话要点等。

鹿之鸣（原《鹿城党史资料通讯》《鹿城党史》）中共温州市鹿城区委党史研究室编，内部交流，不定期刊，历任主编：范小微、郑坚、李岳松等，1999 年 4 月总第 1 期至 2020 年 5 月总第 49.50 期。

《鹿城党史通讯》2004 年第 2 期（总第 21 期）

中共鹿城区委党史研究室编，主编范小微，2004 年 12 月第 2 期（总第 21 期），35 页，18.5×25.5cm。

本期设“专题”“诗词选登”“回忆与题”“英烈传”“文明鹿城”“史海钩沉”“党史动态”等 7 个栏目。刊发徐贤辅《回忆粉碎“四人帮”前后在温州》，林存球《亲身经历二十一军与浙南游击纵队会师》、洪水平《轶史随录》等文章 9 篇，诗 6 首，简讯 2 则。

《鹿城党史通讯》2005 年第 1 期（总第 22 期）

中共鹿城区委党史研究室编，主编范小微，2005 年 5 月第 1 期（总第 22 期），55 页，18.5×25.5cm。

本期“设重要讲话”“历史回眸”“专题与回忆”“殷殷战友情”“党史人物”“诗词园地”“文明鹿城”“史海钩沉等”8 个栏目。刊发侯桂芳、方宁《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历次整党整风的回顾》，文楚《秦城，预审张春桥》，

徐贤辅《80年代初期温州打击走私和整顿社会治安》，林素菊《深切怀念郑笃行和戈华同志》等文章13篇，诗1首。

《鹿城党史通讯：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专辑》2005年第2期（总第23期）

中共鹿城区委党史研究室编，主编范小微，责任编辑李岳松，2005年8月出版，2005年第2期（总第23期），66页，18.5×25.5cm。

本期设“回忆与专题”“专题史话”“史鉴论坛”“诗词园地”“大事记”等8个栏目。刊发邱清华《慷慨揭竿起 抗日保家乡》、安邦《浙南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历程》、何生《温州抗日救亡运动往事回眸》、洪水平《温州三次沦陷敌方的背景资料》等回忆性文章12篇，诗1首。

《鹿城党史》2006年第1期（总第24期）

中共温州市鹿城区委党史研究室编，主编范小微、编辑李岳松，2006年3月出版，2006年第1期（总第24期）。本期始，改名为《鹿城党史》，39页，18.5×25.5cm。

本期分设“回忆与专题”“党史人物”“史海钩沉”“红色之旅”“党史工作”等5个栏目。刊发朱国荣《“弹簧楼”——浙南游击生活的回忆》，高寅生《浙南游击根据地中共浙南地委第三期青训班》，冯增荣、蒋文钦《一生平实 十载辉煌——回忆金品芳》等文章10篇，通知2份。

《鹿城党史》2006年第2期（总第25期）

中共温州市鹿城区委党史研究室编，主编范小微、编辑李岳松，2006年7月出版，2006年第2期（总第25期），42页，18.5×25.5cm。

本期分设“卷首语”“纪念建党85周年论文”“工作探讨”“回忆与专题”“党史人物”“诗歌园地”“史海钩沉”“为政小议”等7个栏目。刊发李岳松《温籍先进分子对中共在温州建党和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地位与作用》、叶文超《略论洞头列岛解放战斗的指挥艺术》、林素菊《以史为鉴 认真落实“三农”政策（续载）》等文章11篇。

《鹿城党史》2006年第3期（总第26期）

中共温州市鹿城区委党史研究室编，主编范小微、编辑李岳松，2006

年11月出版，2006年第3期（总第26期），47页，18.5×25.5cm。

本期设“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回忆与专题”“史实考证”“诗歌园地”“党史人物”“史事经纬”等7个栏目。选刊了龙跃《忆红军挺进师的前身——北上抗日先遣队》、李岳松《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的原因与教训》、郑华《田塘头战斗对我的考验》等文章13篇。

《鹿城党史》2007年（总第27期）

中共温州市鹿城区委党史研究室编，主编郑坚、副主编李岳松，2007年12月，总第27期，46页，18.5×25.5cm。

本期设“领导要论”“专题”“抗战课题”“回忆与专题”“史海钩沉”“历史经济论坛”“诗歌园地”“党史人物”“红色旅游”“党史信息”等10个栏目。刊发雅颂《鹿城区认真学习贯彻省委党史工作会议精神》、李岳松整理《苍糠桥惨案》、陆志竟《记温州市战时政治工作队二三事》、章英杰《温州城市合作经济的历史地位》等文章17篇，诗词7首，简讯4则。

《鹿城党史》（总第28期）

中共温州市鹿城区委党史研究室编，主编郑坚、责任主编李岳松，2008年12月10日，总第28期（改版后第1期），112页，17.7×24cm。

本期设“抗损调研”“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回忆与专题”“红色石垟”“专题研究”“东瓯综艺”“诗歌园地”“人物春秋”“鹿城英烈”“报刊选萃”“党史简讯”等11个栏目。刊发李岳松等执笔《抗战时期鹿城区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报告》，金维口述、李岳松整理《温州人成为日军细菌试验品》，陈继源《共和国三次哲学大争论的历史和实践》等文章25篇，简讯4则。

《鹿城党史》（总第29期）

中共温州市鹿城区委党史研究室编，责任主编郑坚、主编李岳松，2009年7月30日，2009年第1期（总第29期），124页，17.7×24cm。

本期设“纪念温州解放60周年”“瓯越论坛”“纪念《鹿城党史》创刊十周年”“抗损调研”“红色石垟”“东瓯综艺”“诗歌园地”“人物春秋”“鹿城英烈”“党史胜迹”“报刊选萃”“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党

史动态”等 13 个栏目。刊发何生、王毅《粟裕在浙南的三年》，洪水平《记温州和平解放谈判》，李岳松《温州人经济在中国改革进程中的作用和影响》，高醒华《古琴艺术历史性的光辉文献》等文章 31 篇，信息 2 则。

《鹿城党史（总第 30 期）（专刊）·卅载鹿鸣——鹿城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

中共温州市鹿城区委党史研究编，主编李岳松，浙内图准字 [2009] 温 1 号，鹿城党史（专刊）2009 年第 2 期（总第 30 期），2009 年 10 月，185 页，262 千字，17.4×24cm。

本书前插入 41 幅雅颂、半岛（岳松笔名）拍的摄影和 19 幅旧的摄影图片作为鹿城城市发展对比。书前有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30 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区委书记余梅生在鹿城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代序）。全书分论文选辑：收录杨一敏、李岳松、郑秀康等 12 篇获奖论文。十大创业人物：曾荷绿等 6 位记者分别写叶建林、陈国荣、陈时升等鹿城 10 大创业人物业绩。附录：征文函、征文参考题、征文评审结果通报、十大创业人物等推选活动通知、候选人名单和命名表彰决定。

《鹿之鸣》（总第 31、32 期）

中共温州市鹿城区委党史研究室编，责任主编郑坚、主编李岳松，浙内图准字（2010）温 12 号，2010 年 11 月 20 日，总第 31、32 期，250 页，17.7×24cm。

从本期始，《鹿城党史》改名为《鹿之鸣》并二期合刊（县级刊物未经批准不让办，而党史类刊物，市级新闻出版部门无权审批，故改）。

本期设“特稿转载”“院士风采”“纪念抗战胜利 65 周年”“工作探讨”“瓯越论坛”“回首往事”“专题研究”“走进老区”“党史胜迹”“缅怀英烈”“人物春秋”“浙南轶事”“天下温州人”“书刊品读”“话说鹿城”“东瓯综艺”“诗歌园地”“报刊选粹”“党史动态”“目录索引”等 20 个栏目。刊发李斌、顾瑞珍《温籍科学家谷超豪获最高科技奖》，李岳松、李长飙《日军入侵鹿城暴行专题调研》，山丘《永嘉战时青年服务团的创办与发展》，

李岳松《追忆首肯温州模式理论的引领人——纪念费孝通诞辰 100 周年》，叶大兵《忆温州市解放初期的文艺活动》等文章 51 篇，党史简讯 11 篇及《鹿城党史》第 1 至 30 期目录。

《鹿之鸣》（总第 33、34 期）

中共温州市鹿城区委党史研究室编，主编郑坚、李岳松，2011 年 12 月，总第 33、34 期，250 页，17.7×24cm。

本期设“特稿转载”“纪念建党 90 周年论文征文选”“纪念建党 90 周年主题征文选”“回首往事”“红色故事”“抗战调研”“专题研究”“瓯越论坛”“党史胜迹”“缅怀英烈”“人物春秋”“书刊品读”“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鹿城古迹”“诗歌园地”“艺术党课”“红色旅游”“报刊选载”“党史动态”等 19 个栏目。刊发李岳松《温州新型城市化道路探索》、李棟《追寻畚的红色足迹》、林存球《追忆老领导胡景城同志》、林沂《莫忘耻辱史 奋发兴中华——读〈日军入侵鹿城暴行纪实〉》、洪振宁《群星闪烁的时代》等 59 篇文章，简讯 6 则。

《鹿之鸣》（总第 35、36 期）

中共温州市鹿城区委党史研究室编，主编李岳松，浙内图准字（2012）温 11 号，2012 年 12 月，总第 35、36 期，275 页，17.7×24cm。

本期设“特稿转载”“纪念（龙跃）专辑”“资政参考”“回首往事”“专题研究”“东瓯论坛”“抗战调研”“缅怀英烈”“人物春秋”“党史胜迹”“微型党课”“序跋选载”“书刊品读”“东瓯综艺”“红色旅游”“诗歌园地”“党史动态”“报刊选载”等 18 个栏目。刊发黄荣波《丰碑伫立祖国大地人民心中——纪念龙跃同志百年诞辰》、李岳松《试述浙南革命根据地党史文化建设》（入选全国首届党史文化研讨会）、李晓松《心灵深处的怀念——忆雷锋式的好妈妈王凤素》等文章 67 篇，简讯 12 则。

《鹿之鸣》（总第 37、38 期）

中共温州市鹿城区委党史研究室编，主编李岳松，2013 年 12 月，总第 37、38 期，281 页，17.7×24cm。

本期“设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纪念毛泽东诞辰 120 周年”“资

政参考”“会记录”“党史党建”“回首往事”“历史影集”“专题研究”“抗战调研”“东瓯论坛”“缅怀英烈”“人物春秋”“鹿城人文”“书刊品读”“序跋选载”“红色旅游”“诗歌园地”“党史动态”“报刊选载”等19个栏目。刊发朱健《关于党史宣传教育的若干问题》、李岳松《红船起航 驶向中国梦的彼岸》、何生《抗日战争时期温州中学党的建设和学生运动》、半岛《战绩卓著的红十三军领导人雷高升》等文章60篇，简讯14则。

《鹿之鸣》（总第39、40期）

中共温州市鹿城区委党史研究室编，主编李岳松，2015年2月，总第39、40期，310页，17.7×24cm。

本期设“重要文献”“特稿转载”“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纪念温独支成立90周年”“纪念建区30周年”“资政参考”“回首往事”“抗战调研”“历史影集”“专题研究”“东瓯论坛”“缅怀英烈”“人物春秋”“鹿城人文”“书刊品读”“序跋选载”“编通往来”“红色旅游”“诗歌园地”“党史动态”“报刊选载”等21个栏目。选刊了李岳松 李培怡《邓小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温州实践的启示》、鹤松《中共创建时期温籍留苏先进分子代表人物档案研究》（入选全国学术研讨会）、山丘《温独支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杨树标 杨菁《枫叶早逝红未了 清泉莫怨出山迟——郑文俊与〈译报周刊〉》、金城《看越南忘恩负义 背信弃义的丑恶行径》等文章65篇，简讯9则。

《鹿之鸣》（总第41、42期）

中共温州市鹿城区委党史研究室编，主编李岳松，2016年2月，总第41、42期，302页，17.7×24cm。

本期设“特稿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抗战遗址”“回首往事”“资政参考”“人物春秋”“缅怀英烈”“专题研究”“鹿城人文”“序跋选刊”“书刊品读”“诗歌园地”“党史动态”“报刊选载”等14个栏目。选刊了李岳松《试述浙江抗战文化及其影响》（入选省学述研讨会）、半岛等《新四军驻温州三个办事机构工作始终末》、胡显钦口述 吴树敬记录《为温州解放筹运军民粮》、李艺 陈晨《李铁锋：亲历中日战俘交换

事件》等文章 60 篇，简讯 19 则。

《鹿之鸣》（总第 43、44 期）

中共温州市鹿城区委党史研究室编，主编李岳松，2017 年 2 月，总第 43、44 期，312 页，17.7×24cm。

本期设“特稿”“纪念建党 95 周年和长征胜利 80 周年”“回首往事”“抗损调研”“专题研究”“党史专题”“资政参考”“缅怀英烈”“人物春秋”“红色旅游”“鹿城人文”“传统文化”“书刊品读”“序跋选刊”“东瓯艺谭”“诗歌园地”“党史动态”“报刊选载”等 18 个栏目。刊发李岳松、李培怡《日军侵温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改革开放新时期鹿城党史专题编写探讨》，李晓松《烽火岁月时，军民鱼水情》，戴文龙《一个耄耋老人的回忆》，冯强生《巴拿马博览会获奖百年祭——打造朱子常黄杨木雕金名片》等文章 59 篇，简讯 15 则。

《鹿之鸣》（总第 45、46 期）

中共温州市鹿城区委党史研究室编，主编李岳松，2017 年 12 月，总第 45、46 期，235 页，17.7×24cm。

本期设“特稿”“纪念建军 90 周年 新四军成立 80 周年”“回首往事”“专题研究”“资政参考”“缅怀英烈”“人物春秋”“红色旅游”“鹿城人文”“传统文化”“序跋选刊”“书刊品读”“诗歌园地”“党史动态”“报刊选载”等 15 个栏目。刊发李岳松《浅谈藤桥民兵在歼灭国民党交警总队战斗的作用和意义影响》《温州马氏家族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影响》、安邦《深切缅怀胡景城同志》、柯永波《挖掘岁月尘封的历史——对林骅同志遗作的初步查证》、李哲《硬骨头学者刘景晨 刘节父子》等文章 45 篇，简讯 6 则。

《鹿之鸣》（总第 47、48 期）

中共温州市鹿城区委党史研究室编，主编李岳松，2019 年 10 月，总第 47、48 期，147 页，17.7×24cm。

本期设“特稿”“庆祝新中国建立 70 周年”“回首往事”“缅怀英烈”“人物春秋”“鹿城话旧”“艺文园地”“党史动态”等 8 个栏目。刊发张靖《关于鹿城区招商引资项目的问题研究》、李岳松《试述温州人精神的成因及

特征》、半岛《中共早期革命活动家浙南党组织的缔造者谢文锦》、冯强生《墓地怀旧》等文章 35 篇，简讯 8 则。

《鹿之鸣》（总第 49.50 期）

李岳松主编，温州市鹿城区档案馆、中共温州市鹿城区委党史研究室编，2020 年 10 月，262 页，17.5×24cm。

本期设 11 个栏目，“回首往事”：安邦《开辟第二条战线》，洪水平《浙南——一个奇迹》，鹿吏、培怡《泽西红色足迹》，山丘《人民路改造》等 9 篇。“专题研究”：周生辉《红十三军败因研究》，李岳松《温州打火机胜诉欧盟反倾销入世第一案思考》《交通建设助推温州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 7 篇。“人物春秋”：吴军《视文艺如生命者永生》等 4 篇。“东瓯论坛”：郑颀峰《党章制订和修改的创新》等 2 篇。“鹿城人文”栏 2 篇。“微型党课”：周芝芝《透过胡杨学担当》和郭扬旸、胡宁宁等 9 篇。“书刊品读”：章志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等 6 篇。还有“红色之旅”“域外风情”“艺文园地”等栏目；“党史动态”发了工作简讯 15 则。

资料来源“鹿城档案地方志网”

资料来源“鹿城档案地方志网”